开端与终结

方珊 译


Лев Шестов

НАЧАЛА И КОНЦЫ

舍斯托夫文集 第5卷

张冰 主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1897

http://www.cp.com.cn





舍斯托夫文集 第5卷

张冰 主编

НАЧАЛА И КОНЦЫ

Лев Шестов

开端与终结

方珊 译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舍斯托夫文集.第5卷,开端与终结/(俄罗斯)列夫·舍斯托夫著;方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ISBN 978-7-100-16625-6

Ⅰ.①舍… Ⅱ.①列… ②方… Ⅲ.①舍斯托夫—文集 ②哲学思想—俄罗斯—现代 Ⅳ.①B512.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15222号

舍斯托夫文集
第5卷
开端与终结
方珊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7-100-16625-6

2019年6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201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4½
定价:29.00元

Лев Шестов

НАЧАЛА И КОНЦЫ

本书根据斯塔修列维奇出版社 1908 年版译出



《舍斯托夫文集》总序

列夫·舍斯托夫(Лев Исаакович Шестов, 1866—1938),原名耶古达·莱布·施瓦尔茨曼(Иегуда Лейб Шварцман),是伟大的俄国哲学家,存在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和奠基者,白银时代俄国文化杰出代表之一。

20 世纪俄国哲学被誉为给世界思想界的"一件礼物",而列夫·舍斯托夫是 20 世纪俄国哲学的"头把交椅"或"第一小提琴手"。在追溯俄国白银时代宗教哲学思想经由欧洲各国首都等侨居地城市向欧洲思想界渗透、逐渐被吸纳并与之产生深刻共鸣的全过程时,如果缺少了对于列夫·舍斯托夫思想的研究,那将是残缺不全的。列夫·舍斯托夫被称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俄国哲学家",对于世界哲学文学界产生了持续而又深远的影响。在欧洲,他是名副其实的"存在主义之父",同时早在生前就被公认为俄国文坛从象征主义问世以来所有俄国现代派的"祖师爷"和"思想前驱"。

1866 年 1 月 31 日(俄历 2 月 12 日),舍斯托夫出生于基辅一个商人家庭,父亲伊萨克·莫伊谢耶维奇·施瓦尔茨曼(1832—1914)系大工厂主兼一级商人,母亲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娘家姓什列伊别尔,1845—1934)系其父第二个妻子。其父所经营的

“伊萨克·施瓦尔茨曼布料公司”坐落于波多尔，以经营高质量的英国布料著称。该公司由施瓦尔茨曼夫妇创立于1865年。从1884年起，公司拥有该城最大的商店，从1892年起，公司在克列缅丘格(乌克兰城市)拥有分公司。

舍斯托夫的父亲系古犹太语文献专家、自由思想者，观点进步，视野开阔，思维开放。他想让孩子继承自己的家业，但在这个问题上也并不强求。列夫有两个弟弟、四个妹妹。列夫就学于基辅第三古典中学，但很快就被迫转学莫斯科，在莫斯科大学数学系学习，后转入基辅大学法律系。1889年以副博士学位从该校毕业。学位论文《论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被严禁发表，并被莫斯科审查委员会销毁。为此而未能获得博士学位。

毕业后列夫在其父在基辅的公司里工作了几年，同时高强度地研究文学与哲学。但把商业和哲学结合起来并非易事。1895年他患了严重的神经紊乱症，翌年出国治病。此后其父的家族企业对这位思想家成了一种家族的诅咒：此后他还将不止一次中断心爱的工作，抛开家庭和孩子，回到基辅整顿被其父放任自流，又因两个弟弟缺乏规矩而变得松松垮垮的公司的秩序。

1896年列夫在罗马娶了正在该地学习医学的安娜·叶丽阿扎洛芙娜·别列佐夫斯卡娅为妻。两年后二人移居波恩。1898年回到俄国。

1898年舍斯托夫的处女作《莎士比亚及其批评者勃兰兑斯》出版。该书所勾勒出的问题后来成为贯穿这位哲学家全部创作的主题：对于人在世上的“定向”而言，科学认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一般理念、体系和世界观也会遮蔽我们直观美丽而又多样、

丰富而又真实的现实生活的眼睛；把具体感性的人类生活及其悲剧性放在前景中加以考察；不接受“规范标准”的、徒具形式的、强制执行的道德和普遍“永恒”的道德律令。

此书问世后，舍斯托夫紧接着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和文章，分析俄罗斯作家——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尼·托尔斯泰、安·帕·契诃夫、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费·索洛古勃——创作中的哲学内蕴。舍斯托夫在这些著作中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他在其处女作中提出的问题。在此期间，舍斯托夫结识了俄国著名的文化赞助人佳吉列夫，后者是他在《艺术世界》杂志的同仁。

1905年舍斯托夫出版《无根据颂——非教条主义思维的一次尝试》，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知识界引起异常尖锐激烈的争论，争论中出现的观点针锋相对，从欢呼雀跃到坚决否定，不一而足。这本书实际上是舍斯托夫的哲学宣言。按照舍斯托夫自己的说法，“……我的全部任务恰好在于要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种类的、被形形色色的、伟大和并不伟大的哲学体系的奠基人以如此莫名其妙的顽强精神所强加在我们头上的开端与终结”。

1915年舍斯托夫婚前所生儿子谢尔盖·利斯托帕多夫战死。1917年二月革命，舍斯托夫并不感到喜悦，尽管他永远都是专制政权的敌人。1920年舍斯托夫携家离开苏维埃俄国，在瑞士逗留了不长时间后，于1921年定居法国直到逝世。

此时他在哲学上关心的课题是巴门尼德和普罗提诺、马丁·路德、中世纪德国神秘主义者、布莱兹·帕斯卡尔和巴鲁赫·斯宾诺莎、索伦·克尔凯郭尔，以及同时代哲学家埃德蒙·胡塞尔。舍斯托夫由此进入那个时代西方哲学界的核心精英圈，而和埃德

蒙·胡塞尔、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马克斯·舍勒、马丁·海德格尔、乔治·巴塔耶等有密切交往。他还在索邦大学举办讲座和开设课程，内容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以及整个俄罗斯哲学思想。舍斯托夫还对《路标》杂志(巴黎，1926—1928)的编辑出版提供了帮助，1925 年该刊第 1 期刊载了他的哲学论文《发狂的演说——关于普罗提诺的神魂颠倒》。

1938 年 11 月 19 日，舍斯托夫于巴黎的布瓦洛诊所溘然长逝。

舍斯托夫通常被人称为"反哲学家"：其主要追求是挣脱意识的束缚，因为意识——由公式和模式等理性抽象物构成的意识——既构成了世界的基础，也遮蔽了真正的现实。自明性即死亡和痛苦的自明性，是世界强加在人身上的。对人而言，这种自明性是在理性主义和人文道德中得以体现的。舍斯托夫没有沿着主流经典哲学家开辟的思辨大道前行，而是剑走偏锋，走了一条"灵魂中的漫游"式的哲学之路，为此他选择格言警句体和评论注释体进行写作。对于舍斯托夫来说，最重要的任务是从普遍必然判断这种幻觉的俘虏下挣脱出来，走向上帝。因此他为自己的哲学研究选择的对象是面对上帝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帕斯卡尔、尼采、克尔凯郭尔——的经验(体验)。舍斯托夫完全被圣经的魅力所吸引，尤其是圣经中那些先知们以及使徒保罗。正是圣经以其向世界发出的挑战，以及上帝对这种挑战的回答证明，自明性是一种可怕的幻觉和骗局。"理性导向必然性，信仰导向自由"——这句话完全适合舍斯托夫自己的命题。

迄今为止，舍斯托夫的著作在俄罗斯国内外以各种欧洲语言

出版了有数十种之多。其中，俄罗斯出版的文集从上个世纪初至今，便有所选篇目多寡不等的数十种文集（多数为两卷本）。国际上出现最早的是法文版文集、德文版文集等。

在我国新时期以来的外国文学界哲学界，自从列夫·舍斯托夫的《在约伯的天平上》（我校董友先生译）、《开端与终结》、《旷野的呼告》（方珊译）问世以来，在读书界产生了持续、持久、恒常的影响，包括上述译著在内的舍斯托夫的著作，在数十年间，持续不断地由多家出版社再版，成为读书界“学术类书籍的常销书”，也成为学术低迷、拜金至上时代的一个“思想的奇迹”。有鉴于此，对于舍斯托夫思想在20世纪俄罗斯和世界思想史中的意义与地位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编纂一部信实可靠的列夫·舍斯托夫文集，就成为当今学人对于我国外国文学和外国哲学研究界应该承担的一种责任和义务。

舍斯托夫著作在我国的翻译介绍，可以从以下简表中见一端倪。《在约伯的天平上——灵魂中漫游》（董友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1版）；《旷野的呼告》（方珊、李勤译，华夏出版社，1991年第1版；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开端与终结》（方珊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舍斯托夫集》（方珊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初版；2004年第2版）；《以头撞墙》（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版）；《双头鹰文库》（方珊、张冰主编，共6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舍斯托夫文集5卷本》（方珊主编，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卷《钥匙的统治》，第2卷《在约伯的天平上》，第3卷《雅典与耶路撒冷》，第4卷《旷野呼告·无根据颂》，第

5 卷《思辨与启示》)；《雅典与耶路撒冷》(张冰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钥匙的统治》(张冰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旷野呼告·无根据颂》(方珊、张冰等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

我们这个即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舍斯托夫文集》，除以上已经翻译过的著作外，增补了最新发现的舍斯托夫著作 4 部:《莎士比亚及其批评者勃兰兑斯》《希腊哲学史讲演录》《伟大的前夜》和《唯凭信仰》。这几本书本人在 2015 年在莫斯科大学访学时全部购齐。目前，拟议中的《舍斯托夫文集》分为 13 卷。第 1 卷:《莎士比亚及其批评者勃兰兑斯》；第 2 卷:《托尔斯泰与尼采学说中的善》；第 3 卷:《悲剧哲学》；第 4 卷:《无根据颂》；第 5 卷:《开端与终结》(文集)；第 6 卷:《伟大的前夜》；第 7 卷:《钥匙的统治》；第 8 卷:《在约伯的天平上》；第 9 卷:《旷野呼告》；第 10 卷:《雅典与耶路撒冷》；第 11 卷:《思辨与启示》(文集)；第 12 卷:《唯凭信仰》；第 13 卷:《希腊哲学史讲演录》。

舍斯托夫的著作在读书界享有广泛而又良好的声誉，这次中文版《舍斯托夫文集》的问世，必将引起广大读者的热情关注，欢迎广大读者对本文集的编纂和翻译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今后修订。相信经由我们的努力，一定能使舍斯托夫和中国读者之间的“心桥”更加畅通无阻。

谨以此为序。

张冰

2018 年 6 月

本卷说明

1904 年，在完成《无根据颂》以后，舍斯托夫写了一篇论述契诃夫的长文：《从虚无中创造——论安·帕·契诃夫》（《生活问题》，1905 年 3 月）。对于舍斯托夫的契诃夫评论，伊·布宁评价道："关于契诃夫最好的一篇文章出之于舍斯托夫之手笔，他称契诃夫是一个'最不留情面的天才'。"

《开端与终结（文集）》（圣彼得堡，斯塔休列维奇出版社）初版于 1908 年。是作者本人编辑的一部文集，包含四部分内容：从虚无中创造（安·帕·契诃夫）；预言的才华；愚蠢赞；就要说完的最后一句话。第三部分愚蠢赞，实际上是反驳尼·别尔嘉耶夫在《悲剧与日常性》中对《无根据颂》的批评的。别尔嘉耶夫在其文章中，说舍斯托夫虽然口口声声反对任何教条主义，但他的"无根据性反倒成了一种教条"，对此，舍斯托夫在其《愚蠢赞》中做了出色的嘲讽。此文发表于《火炬》文集（第 2 辑，1907 年），嗣后被收入《开端与终结》。1907 年 4 月，《俄罗斯思想》发表了舍斯托夫的文章《就要说完的最后一句话》。这是舍斯托夫在《俄罗斯思想》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此文后来也被收入《开端与终结》。上述两篇文章和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北极星》，1906 年 1 月 27 日）和上文提到过的论述契诃夫的文章（《生活问题》，1905 年 3 月），汇编

为一个文集，题目就是《开端与终结》

拉·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在其著作《论生活的意义》(圣彼得堡，1908年9月)的一章(题目为《列夫·舍斯托夫》)中，对舍斯托夫的全部创作做了评述。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写道：

"舍斯托夫创作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思维的凝练，善于言简意赅，删繁就简，同时又以最等值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使得列夫·舍斯托夫成为我国最出色的文体家之一，正是有鉴于此，我们称舍斯托夫的作品为哲学-艺术作品。阅读列夫·舍斯托夫的著作时，一种审美愉悦感几乎总是伴随着思维的进程，配得上这一描述的我国当代作家并不是很多。然而，我们要大家予以关注的，并非列夫·舍斯托夫创作的这样一种外在形式而已，对于我们来说，舍斯托夫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他是一个痛苦地探索生活意义问题之答案的一个作家，一个探索恶在世上的意义问题之答案的作家。一个探索我们生活道路之目的何在问题之答案的作家，对于我们来说，列夫·舍斯托夫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他是一个具有最广泛意义的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他本人在其著作之一中就托尔斯泰说过的话，放在他本人身上完全适合：'……他的全部创作活动都是由理解生活的需求召唤而来的，而也正是这种需求，引发了哲学本身的存在。'"

1966年在美国出版了两种英文版《开端与终结》之一。第一种版本是：*Chekhov and other essay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第二种版本是：*Penultimate words and other essays* (Books for library Press, New York, Freeport)。有趣的是，正是后一本书在美英两国引起了最大的兴趣。此书英文第1版1916

年出版于英伦，后来，如上文所述，于 1966 年在美国再版，继而又在俄亥俄大学出版社于 1977 年出了第 3 版。

在美国 1978 年此书继 70 年前彼得堡的第 1 版后又出了第 2 版。《开端与终结》是舍斯托夫第一部被译成外文的著作。

目　录

前　言

畏惧真理是人最典型的特征。这一点无论初看起来怎样怪诞不经，但是却不容置疑。从人学会思考的时候起，总是疑心重重地对待真理，一些人是隐蔽的，另一些人是公开的。通常那些口头上热情捍卫真理的人，实际上最畏惧真理。看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有那些斥责真理的人，才敢于在某种程度上接近真理。不过，我再重复一遍，人认为真理是可怕的，应尽力避开它，这样一个牢固的信念从古代起就已根深蒂固了。人们把它比作被蛇缠绕的墨杜莎的头，据说所有瞧它一眼的人都会变成石头。或者把它比作太阳，总是盯着它就意味着冒失明的危险。这也许可以解释早已形成的难以理喻甚至神秘莫测的看法：人们不自愿去寻找真理，只是俯首听命于必然性或者不可抗拒的绝对命令，所以他们不想欺骗自己，决心去正视真理。“你不应当撒谎”，博学多识者时时刻刻都在这样自言自语，然而他并不能战胜自己本能的畏惧，仍在撒谎、撒谎、撒谎。这不是从微不足道的个人利益的思考中得到的，就像“生活第一，哲学第二”(primum vivere deinde philosophari)——这种情况在这里也丝毫不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博学多识者说是遵循最高的观点，受自己良心的指使，这是在撒谎。他以为，一旦他道出真理，一旦真理变成人人皆知的东西，那么人世生活就将是完全

不可能的。你们可以从各种各样世界观的代表那里，从那些不可能就任何个别问题进行商榷的人们那里，听到这种论断。

一方面，尼采和奥斯卡·王尔德赞颂谎言，另一方面，康德之后兴起的无数认识论的所有代表则提出，不要各种类型的真理，而要人所共遵的判断，以做真理的代用品，亦即仍是谎言。一方面是奥斯卡·王尔德和尼采，另一方面是当代的新康德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全部敌人，甚至实证论者也不例外），他们都以某种形式，隐蔽地或公开地鼓吹谎言。按他们的看法，如果没有谎言，生活就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比较认真地观察一下当代信仰宗教的人们，那我们就会相信，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也都畏惧真理和逃避真理，并因此而信教。因此人们通常相信从童年起就教给他们的、他们已或多或少习以为常的那些东西。诞生于天主教的人，如果他要信教，那他一定会相信唯一神圣的天主教会；而诞生于耶稣新教的人，只会承认路德解释的耶稣教；出身系伊斯兰教的人，必将坚持不懈地维护伊斯兰教的上帝和穆罕默德。虔诚态度只存在于野蛮人之中。受过教育的人们知道，没有信念是可怕的，因此“无论如何”（quand-même）要寻找信念，他们认为委身于信念比找到宗教真理更为重要。这就自然提出了一个问题：人们的这一信念果真是如此可怕而又有害的吗？人们的上述信念虽经广泛流传，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证明它的真实性。须知任何偏见都曾广泛流传！

但是，我绝不想要去争辩谎言的好处和实际作用。王尔德、尼采和德国的认识论派自有道理：谎言有益，甚至非常有益。然而我认为绝无必要提出二者择一的问题：要么是谎言，要么是真理。让谎言去甚嚣尘上吧！让认识论派把谎言当作唯一的、最出色的、最

深奥的真理去赞颂吧——难道这能变为对真正真理的否定不成?!人们似乎以为,如果放出真理,它就会立刻吞噬谎言,就像《圣经》上所讲的瘦弱的母牛吞食肥牛一样。所以我认为自己有义务在此声明:这些忧虑有些过甚其词,同样毫无任何根据。尽管世上到处是真理,然而,明显的谎言仍继续横行霸道,坐享其福,并带来人们如此渴望从它那里得到的全部“好处”。真理根本不具有那种能根绝谎言的力量,也许,真理完全不与谎言为敌,也许,就是它给人间带来了谎言?这后一个推测不像乍看起来那样不可思议……

然而,问题的实质并不在这里。主要的是,唯心主义者无可担忧:他们与谎言结成的牢固联盟保障了缔约双方可能的、长久的——“永久无穷的”(in saecula saeculorum)——利益。因此,即使真理有时决定来到光天化日之下,也不会有大灾大难的。确实,真理不预示着直接的利益。但是我可以说,真理的探索者远非像目光短浅的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幼稚和无私,这些探索者在自己的追求里绝非只遵循“纯净”的思想。如果他们把自己的脑袋放在挨揍的地位上——我们不妨提一下,以本文集里谈到的作家契诃夫为例——那么,他们也绝不是出于对傻瓜的忠实和虔诚。我曾经指出过,被打碎的脑袋常常是天才发展史上的第一页。当然,我的看法当时没人相信——最不相信的是唯心主义者,他们认定(唯心主义者往往是深识广知的):破裂的头颅只是破裂的头颅,仅此而已。为了证实我的看法,我可以引证著名心理学家詹姆斯的著作《宗教经验种种》《*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不过,前言应当简明扼要。有兴趣者可亲自去拜读此书,这是一部从许多方面看都很精妙的作品。詹姆斯是美国人,他是注重实际

并有清醒看法的人。然而该书几乎是通篇赞颂愚蠢。当不学无术和无知之人与愚蠢结成联盟时，人们对此会不足为怪。但是当非常聪明而又博学多识的人公开地在愚蠢那里甚至也在狂妄那里寻找真理时——这种状况便很发人深省了。

应该结束了。关于标题，我再说两句。《开端与终结》，换言之，什么都谈，就是不谈中间。中间之所以不需要，并不是因为它本身没有什么用场。一般来说，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用处。但是，中间是骗人的，因为它既有自己的开端，又有自己的终结，它与一切都相似。而在这个它心甘情愿接受的、形形色色笃信宗教的人们（上面谈到的人们当中）苦心谋求的名称中，——它已经不可能强求得到承认。形形色色的冒名顶替，甚至像此时在它固有的滑稽因素情况下，都引起了反对和痛恨。中间不是一切，也不是一切的大部分：无论德国人著述了多少认识论——我们却不相信它们。我们将走向开端，也将走向终点，——虽然我们大略地懂得：既不能达到开端，又不能抵达终点。但我们要肯定地说，真理归根到底定要比最出色的谎言更为人需要，虽然确切地说，我们并不知道并且永远也无法知道终极真理。但只要认识这一点也就够了，即人们所臆想的一切真理的代用品——绝不是真理！……

天上和人间有着许多就连最博学多识者也不可设想的事物……

列·舍

萨尔嫩

1908年8月21日

一　创造源自虚无

——安·契诃夫

“忍耐吧，我的心，
愿你沉睡不醒。”
——夏·波德莱尔

1

契诃夫已经死了，因此现在能够自由地谈论他了。因为谈论艺术家——意味着去揭示、发现隐藏在其作品中的“倾向”，而在活着的人身上施行这种手术，远非易事。要知道，他之隐匿是有一定原因的，并且是极为重要的原因。我认为，许多人都感受到了这一点，而这恰又成为我们至今未能真正评价契诃夫的部分原因。评论家研究他的作品，迄今为止，还是局限于老生常谈。他们当然明白，这是不好的；不过，总比刺探活人的实情要好得多。唯有 H. K. 米哈伊洛夫斯基[①]曾试图揭示契诃夫的创作源泉，大家知道，结果是他惊恐万状地甚至厌恶地放手作罢了。其实，在这里，这位已

① H. K. 米哈伊洛夫斯基(1842—1904)，俄国社会活动家、政论家、文学评论家、民粹派，《祖国纪事》《祖国财富》杂志的编辑。——译者注

故的评论家可以再一次相信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理论的幻想。每一个艺术家都有自己一定的使命，有自己奉献全部力量的生平事业。如果倾向谋划以自己取代才干，掩盖束手无策和内容贫乏的窘态，如果倾向是为了信念而从盛行一时的思想储存库里借用来的，那么倾向就是可笑的。“我在捍卫理想，所以大家应当同情我”，在文学里这种奢望已司空见惯。有关自由艺术的争论声噪一时，显然它起源于争论双方对“倾向”的不同理解。一些人会想，高尚的倾向会挽救作家，另一些人却畏惧倾向会使他们服从于异己的使命。显而易见，双方的冲动都是徒劳的：任何时候现成的思想都不会增添平庸之辈的才干，相反，富有独创精神的作家无论如何都要给自己提出特殊的使命。契诃夫就有自己的事业，尽管某些批评家说他是纯艺术的侍从，甚至把他比成悠闲自在的飞鸟。如果要简单地确定他的倾向，那么我要说，契诃夫是绝望的歌唱家。契诃夫在自己差不多 25 年的文学生涯当中百折不挠、乏味单调地仅仅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不惜用任何方式去扼杀人类的希望。我认为，他的创作的实质就在这里。关于这一点，迄今为止还很少有人谈到——原因是很明显的，因为契诃夫所做的，用日常语言来说可名之曰罪行，必须受到严惩。不过，怎能惩罚有才干的人呢？甚至一生都不曾宽恕任何人的米哈伊洛夫斯基也并未指责契诃夫。他警告读者，指出了他在契诃夫眼里发现的“仇恨的火花”，但他并未迈出比这更远的一步：契诃夫的伟大才干使过于严厉的批评家产生了好感。不过，也许是契诃夫在文学界中的地位对米哈伊洛夫斯基做出的相对轻缓的判决不无重要作用。30 年来许多青年一代

听从他,他的话已成了法律。不过,后来大家再也不能忍受一味地重复:阿里斯提得斯[①]是正义的,阿里斯提得斯是正确的。年轻一代想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和说话,终于使老师遭到贝壳放逐[②]。在文学里也有类似火地岛的居民习俗的记载: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杀害和吃掉老一辈。米哈伊洛夫斯基竭尽全力地抵御着,不过他已经感觉不到产生于权利意识的坚定信念了。他内心似乎感到:青年是正确的,当然这不是说他们懂得了真理,经济唯物主义者懂得什么真理!而是说他们年轻,他们的生活在前面。初升的太阳总比下落的太阳更明亮,老人应当乐于把自己奉献给年轻一代。我再重复一遍,米哈伊洛夫斯基感觉到了这一点,这也许消磨了他从前对判断事物的坚定信念。诚然,这犹如歌德笔下甘泪卿[③]的母亲,像以前一样,在未同忏悔牧师商量之前,不接受偶然赐给他的财富。他终究把契诃夫的才干交给了牧师,显然,他在那里也遭到了拒绝和怀疑——不过,米哈伊洛夫斯基反对社会舆论已经没有胆量了。年轻一代重视契诃夫的才干,巨大的才干,这是一清二楚的,他们不会背弃它。留给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是什么呢?他试图发出警告。然而,谁也不听从他,契诃夫则成了最受敬爱的俄罗斯作家之一。

然而,正义的阿里斯提得斯这一次是正确的,正如他过去警告

---

① 阿里斯提得斯(Aristides,公元前约540—前467),雅典统帅,泰米斯托克利的政敌,提洛同盟的组织者之一。——译者注

② 古希腊时期,对于人民所厌恶的人,由公众投票决定流放于国外,投票时把被流放者的姓名写在陶器片上,由此而名。——译者注

③ 甘泪卿,为《浮士德》中玛嘉丽特的爱称。——译者注

提防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是正确的一样：现在契诃夫已经不在世了，所以有可能谈谈这一点。拿契诃夫的小说来说吧，在每一篇单独的小说中，或最好在全部小说中都看到他在工作。他总是坐在隐蔽的地方，窥视着人类的希望。您放心好了：他不会漏掉任何一个希望，任何一个希望都逃脱不了自己的命运。艺术、科学、爱、灵感、理想、未来——现在和过去的人类用以慰藉或开心的一切语词，一旦契诃夫触摸了它们，它们便刹那间凋谢、衰败和死亡。而契诃夫本人也在我们眼里凋谢、衰败和死亡了——但是他那惊人的艺术却永不泯灭，即便是用轻微的触摸，甚至用呼吸或用目光，使人们借以为生和引以为荣的一切感到破灭。并且，他使这一艺术不断完善，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是欧洲文学中他的任何一个竞争者所望尘莫及的。我毫不犹豫地把他远远地放在莫泊桑之前。莫泊桑常常手忙脚乱地试图挽回自己的牺牲品。莫泊桑笔下的牺牲品尽管不计其数且残缺不全，但仍一息尚存，而在契诃夫手中一切都已死去了。

2

尽管大家都已知道，但我还是要提醒一下，早期作品中的契诃夫与我们所习惯的晚年契诃夫极不相似。青年契诃夫高兴快活、无忧无虑，就像飞来飞去的小鸟。他在幽默杂志上发表自己的作品。然而在1888—1889年，即当他才二十七八岁时，就发表了两部作品：小说《没有意思的故事》和剧本《伊凡诺夫》，给新的创作奠定了开端。显然，这里发生了出其不意和突然巨大的转折，它充分反映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还没有契诃夫的详细传记，大概将来也

不会有，因为世界上不存在什么详细的传记，至少我本人还未见过这样的传记。通常，传记会向我们叙述除了应知道的重要事情以外的一切。或许，它可以很详细地告诉我们，有一位裁缝给契诃夫缝制了衣服，但是我们大概永远不会知道，在他的小说《草原》完成和第一部剧本产生之间所消逝的期间里，契诃夫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如果我们想要知道，就应当依赖于他的作品和我们自己去领悟。

在我看来，《伊凡诺夫》和《没有意思的故事》是最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它们之中几乎每一行字都在哀号——难以置信的是，一个只注视别人不幸的人，竟然也会如此哀号。显然，这是一种新的、意料之外的、几乎是自天而降的不幸。它存在着并将永远存在，而奈之如何，则无人知晓。

在《伊凡诺夫》里，主人公把自己与受伤的工人相对比。我想，我们如果把这一对比加在剧本的作者身上也会相差无几。契诃夫也受到了创伤，这是十分明显的。他的创伤不是由于艰难、繁重的工作，也不是力不从心的功绩压垮了他，而是出于很无聊的、无足轻重的原因：他跌倒了、绊倒了、滑倒了。正是出于这种无所谓的、简单的、不起眼的原因，过去那个快活的、兴高采烈的契诃夫就隐没不见了，《闹钟》的滑稽可笑的故事也消失了，而有的只是一个无精打采、愁眉不展的人，一个用言语去恐吓阅历丰富、久经世故的人们的“罪犯”。

只要愿意，就可轻易地摆脱契诃夫及其创作。在我们的语言里有两个有魔力的词：“病态”和它的同类“反常”。既然契诃夫受到了创伤，我们就有充分合理的、科学和一切传统所尊崇的不重视

他的权利，尤其是，既然他已逝世，就不可能怨恨我们的鄙夷。这是说，你如果愿意，就可摆脱契诃夫。但是如果因为某种原因没有这种愿望，那么“病态”和“反常”这两个词对于你们也就不会产生任何作用了。或许，你们继续下去，并试图在契诃夫的体验里找到真理的牢靠标准和我们认识的前提。第三条出路是没有的：不是摒弃契诃夫，便是他的志同道合者。

《没有意思的故事》的主角是一位老教授，《伊凡诺夫》的主角是年轻的地主。但是这两部作品是同一个主题。教授受到了创伤，断绝了自己同过去生活的联系，不再积极参与人类利益的活动了；伊凡诺夫也受到了创伤，成了一个多余的、没用的人。如果生活是如此安排就绪的，也就是说，死亡与健康、力量和能力的丧失是一起到来的，那么老教授和青年伊凡诺夫就片刻难存。瞎子也会十分清楚知道：他们两个人都垮了，对于生活毫无用处。但是，根据我们所不明了的原因，贤明的大自然还没有照顾到这种巧合：当人完全丧失了从生活中获取我们习惯于称之为它的本质和思想的能力之后，还能照常生活下去。令人惊异的是，垮了的人通常除了认识和感受自己状态的能力之外被剥夺了一切。可以说，这种情况下的思维能力大半变得细致入微，更加敏感，发展到极大的规模。普普通通的平凡之人，只要陷入伊凡诺夫或老教授的绝无仅有的地位，也会变得面目全非。在他身上出现了天赋、才干、甚至天才的标志。尼采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驴子能有悲剧吗？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却没有回答，但是在他以后，托尔斯泰伯爵在《伊凡·伊里奇之死》里做了回答。伊凡·伊里奇，正如从托尔斯泰为他写的传记中看到的，是一个平凡的、普通的真人，是回避一切困

难和问题而走自己的路，只关心尘世生活宁谧和惬意的人。只要他稍微感到悲剧的寒气袭来——他就完全变了样。伊凡·伊里奇及其末日使我们心迷神往不亚于苏格拉底或者帕斯卡尔[①]的传闻。

我顺便指出——我认为这特别重要——契诃夫的创作受托尔斯泰影响，尤其是托尔斯泰晚期作品的影响。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契诃夫的部分"罪过"就这样落在俄罗斯大地的伟大作家身上了。我觉得，假如没有《伊凡·伊里奇之死》，就不会有什么《没有意思的故事》、《伊凡诺夫》，更不会有契诃夫的许多其他精彩作品。但这绝不意味着契诃夫从自己伟大先驱者那里袭用了什么词。契诃夫自己有足够的素材，在这方面他绝不需要帮助。然而，青年作家未必胆敢因为自己恐惧在人们面前暴露构成《没有意思的故事》内容的思想。托尔斯泰在写《伊凡·伊里奇之死》时，已经写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牢靠地树立了第一流艺术家的声誉。他可以信手拈来一切。而契诃夫还是羽翼未丰的青年人，他的全部文学家当仅仅是十几篇短篇小说，而且又都发表在鲜为人知、影响不大的定期刊物上。假如托尔斯泰没有开辟一条路，假如托尔斯泰没有以自己为例表明，文学允许说实话，允许说你想要说的东西，也许，契诃夫就不得不长期与自己搏斗，然后才当众忏悔，尽管是通过小说的形式。而在托尔斯泰之后，契诃夫已不必同社会舆论进行可怕的斗争了！"那他为什么还要写自己的可怕

---

① 帕斯卡尔(1623—1662)，17 世纪最卓越的数理科学家之一，法国著名思想家。以《思想录》《致外省人信札》《真空论》为代表作。——译者注

小说和戏剧呢?”大家都在扪心自问。“他为什么总是给自己的主人公选择这种没有并且绝对不可能有任何出路的处境呢?在回答老教授及其女学生卡嘉的无穷无尽的诉怨时,能对他们说些什么呢?”言外之意是告诉你:文学在很早以前就已产生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一般思想和世界观,有唯心主义的、实证论的。只要人过分苛刻、冲动的声音一传来,老师们就搬来这些思想和世界观。但正因为如此,身为作家和有教养的契诃夫,才预先就否弃了形而上学和实证论的各种慰藉。托尔斯泰虽然也不特别重视哲学体系,但是他对各种世界观和思想的厌恶也不如契诃夫强烈。他清楚地明白,世界观应该受到尊重和敬仰,自己不能拜倒在有教养的人们认为是圣物的东西面前,他认为这是自己的缺陷,应当全力以赴与之斗争。他虽然竭尽全力与之斗争,但是毫无成效。斗争不仅毫无结果,而且相反,契诃夫活得越长,支配他的深奥语言的权力——不顾个人理性和自觉意志——就削弱得越多,最后他完全摆脱了各种思想,甚至失去了生活大事联系的观念。他创作上的最大和独创的特点就在这里。我这里先提一下他的喜剧《海鸥》,这个剧本违背一切文学原则,剧情的基础不是情感的逻辑发展,不是前一场和后一场之间的必然联系,而是赤裸裸的、故意毫无掩饰的表演情节。看了剧本,有时会觉得,摆在你面前的是一期由不着边际的各种事件(faits divers)胡乱堆砌、没有周密安排的报纸。尽管到处都充满专制景象,契诃夫这次却大胆地向一切世界观挑战。我认为,契诃夫的最大独创性精神和他的痛苦体验的源泉就在这里。他不想要独创性精神,他做了非人的努力,以便像大家一样,然而并未能逃避命运!有多少人,特别是作家中有多少人,竭尽全

力想要成为与众不同的人，然而终究不能摆脱陈规套矩，但契诃夫却不由自主地成了与众不同的人！显然，与众不同的条件不是准备坚决表达未得到公认的判断。最新和最大胆的思想可能而且往往是庸俗的和枯燥乏味的。为要成为有独创性精神的人，需要的不是捏造思想，而是实现艰难困苦的事业。因为人们逃避劳动和苦难，所以真正的新事物通常就在违背自己意志的人中诞生。

3

“容忍既成事实是不可能的，不容忍也是不可能的，而第三条路又是没有的”。在这种情况下，“行动”是不可能的，因此，依然是“倒在地板上，哭喊着，并以头撞地板”。契诃夫关于自己的一个主人公就是这样说的，而且关于一切人他都能毫无例外地这样说。作者故意使他们陷于这种境地，即只给他们一条出路：倒在地板上，并以头撞墙。他们以难以想象的坚韧不拔的精神摒弃了所有可通行的拯救方式。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这个老教授（《没有意思的故事》）可能试图以回忆往事来解闷或慰藉。但是，回忆只是使他生气，他是一位名闻遐迩的学者，可是现在他已无力应付工作了。他可以一连讲两小时的课，扣住听众的心弦，现在连一刻钟他也力不从心了。他有朋友和同事，他喜欢自己的学生和助手，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可现在他对谁都不感兴趣了。如果人们能唤起他的某种情感，那么只能是憎恨、愤怒和忌妒心而已。他自己应当真诚地承认这一点，而这种真诚也不知为什么和从哪儿来到他这儿的，替代了过去的、为一切理智的人和正常的人固有的看和说的

巧妙艺术，只是看到和说出能促进善良的人类关系和健康的内在情绪的东西。他现在所想的一切，他所看见的一切，都只是使他和别人感到可以用来美化人的生活的小小的不愉快。他清楚地感到（这是他在自己过去理论探索最好的日子里也从未有过的），他成了一个没犯罪的罪犯。他过去所做的一切都是很好的、必要的、有益的。他讲述着自己的过去，你们可以看见，他一贯正确，他可以允许自己的最严厉评论者在一天的任何时刻到他这里来——不仅检验他的事业，而且检验其心念。可现在不仅局外人斥责他，就连他本人也斥责自己。他公开坦承这一切都是由忌妒心和憎恨组成的。他说："皇帝最好的神圣的权利，是原谅别人。我向来认为自己是皇帝，是宽容的，乐意宽恕左右的一切人……可是，现在我已经不是皇帝了。我起了点只有奴隶才配有的变化：恶毒的思想一天到晚在我脑子里徘徊。我从前没有过的感情却在灵魂里滋生起来。我仇恨、轻蔑、愤慨、厌烦、害怕。我变得过分严厉、苛求、爱生气、不体恤、多疑……这是怎么回事？如果这些新思想和新感情是由信仰的转变产生的，那么，这转变又是从何而来？难道这世界变坏了，我变好了，或者说我过去是个瞎子，冷漠的人？如果这变化是我的体力和智力的共同衰退的结果（不是吗，我本来就病魔缠身，体重每天都在日趋减轻），那我的情况就未免太可怜了：就是说，我的新思想是反常的、病态的，我应当为它们羞愧，把它们看作是毫无价值的东西"……

这个问题是濒死的老教授提出的，也是契诃夫提出的。怎样更好些呢？是当皇帝好呢？还是成为像他另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年老的、忌妒的、恶毒的"癞蛤蟆"？问题很独特，毋须争辩。在上面

引用的一段话里你们可以看到，契诃夫对他的独创性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在他的“新”观点被阐明时，他是多么欣喜欲狂地准备为那最普通、最平凡的善意努力而贡献出自己的全部独创性思想。他是毫不犹豫的，他的思想方式是可怜的、令人嫌弃的、羞愧的。他的情绪如此令人恶心，就像他在下述一段话里对自己的外貌所进行的描述：“我是一个 62 岁的人，光秃秃的头，一口假牙，得了一种无法医治的肌肉痉挛症。我的名声光彩照人，而我的模样却不堪入目。我的手和头衰弱得发抖，我的脖子，就跟屠格涅夫的一个女主人公那样，像是大提琴的柄，我的胸脯凹陷，肩膀窄小。我一张嘴说话或者朗读，嘴角就歪向一边，我一笑，脸上就堆满衰老不堪、死气沉沉的皱纹。”体态优雅吗？心境好吗？只要瞧上一眼这个丑八怪，即便是最善良、最富同情心的人都不免会产生一个残忍的想法：赶快毁灭这个毫无价值的和丑恶的败类；或者囿于现有法律而不能诉之于这种果断措施的话，——那么至少也要把他隐藏起来别叫人看见，姑且藏到监狱、医院，或者是去疯人院：这也就是说，至少应采取一些不仅为立法所允许的，而且，也为一种永恒道德所允许的斗争措施。不过，你们会在这里遇到一种特殊的抗拒。老教授已经没有与狱吏、刽子手、医院护工和道德家进行斗争的体力了：就连小孩都能把他摔倒在地。他知道，信念和呼求对他无能为力了。他开始采取绝望的手段：用骇人听闻的、粗野的、撕裂灵魂的喊声对全世界呼喊自己的权利。“我想不用自己的声音喊叫：我，一个名闻遐迩的学者，居然被命运处了死刑，不出六个月这里的讲堂就将另换一个主人了。我要大声呼喊：我受毒害了；以前我从来不知道的一些新思想毒害了我一生的残余岁月，现在像蚊子

似的不断螯咬我的大脑。在这种时候，我觉得我的处境是那样可怕，我想我的听众都吓得要命，从座位上跳起来陷入丧魂落魄的恐惧，绝望地喊着，直奔出口而去才好。”教授的理由未必会对任何人发生作用，况且，我也不知道，上面引用的那些话是否就是理由。但这确是骇人听闻的、非人的呻吟！想象这样一幅情景吧：秃顶的丑陋老头儿，一双颤颤发抖的手，歪嘴、枯槁的长脖，惊慌失措的眼睛，像地上的猛兽一样翻滚，哀号、哀号、哀号！……他需要什么?!他曾长期过着有意义的生活，而现在只求能美好地结束它，尽可能寂静无声，安宁地、庄重地与尘世生活告别。然而他却怒气冲冲，好像是让整个宇宙出庭受审而忙乱不迭地紧紧抓住他的末日不放。契诃夫呢？契诃夫在干什么？他并未漠不关心地走过去，而是站在奇特的丑八怪一边，用数十页篇幅详尽描写他的“灵魂体验”，并渐渐地使读者不去产生自然而合理的气愤情感，而是使他们对解体的和腐朽的现实萌生不必要的，甚至是危险的好感。要知道，帮助教授是不行的——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如果说帮助不行的话，那么就应当置诸脑后，这是人所共知的真理。那么，这种对必然导致死亡的无望挣扎所进行的冗长描写（照托尔斯泰伯爵说来就是赘述），其意义何在？

假如教授的“新”思想和情感散发出美、崇高、自我牺牲的绚丽光辉，那也就该另当别论了，因为读者可以从中得到某种教益。但是，契诃夫在小说里向人们展示的是，所有这些品质都归属于主人公的旧思想。现在，由于开始生病，他对一切都产生了不可抑制的厌恶，不管它与高尚的情感如何相似乃尔。他的学生卡嘉请教他

该怎么办；而他，一个名闻遐迩的学者、毕罗果夫[①]、卡维林[②]和涅克拉索夫[③]的朋友，教育年轻一代的师长，却不知道应该对她说些什么才好。他在自己的记忆里毫无意义地搜寻着许多美好漂亮的字眼——然而对于他，这些字眼都失去了意义。怎样回答她？他扪心自问："工作或者把自己的财产分给穷人，或者了解一下你自己，这谈何容易，正因为谈何容易，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卡嘉，这个还很年轻、健康、漂亮的女性，由于契诃夫的努力，如同老教授一样陷入了人力不可挣脱的圈套。从她认识到毫无希望时起，她就获得了作者的好感。当一个人有事可做时，当一个人多少还有点前途时，契诃夫对他就完全漠不关心。如果说也描绘他，那通常也是一掠而过，并且使用漫不经心的讽刺语调。只有当一个人弄得稀里糊涂之时，而且是糊涂到了用任何方式也不能使之清醒过来的地步，那时契诃夫才会开始活跃起来。只有那时他才有了色彩、能量、创作力的高涨和灵感。也许，他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秘密就在于此。尽管契诃夫对未来美好的蓝图持怀疑态度，但他也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对社会改革和科学显然还抱有一线希望。不管社会问题如何艰难，它总可以解决。或许，地球上总有一天人们会注定生活得很美好，生死无忧，人类不可能超越这一理想；说不定，那些大谈特谈进步的作者们的的确确有所领悟、有所预见呢。然而正是因为这样，他们的事业才与契诃夫背道而驰。契诃

① 毕果罗夫(1810—1881)，俄国教授，外科医术专家。——译者注

② 卡维林(1818—1885)，俄国教授，法学家、历史学家。——译者注

③ 涅克拉索夫(1821—1877)，俄国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者。——译者注

夫起初本能地、然后自觉地喜好起那些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没有意思的故事》里所描写的便是这一类问题；摆在面前的现实是无能为力、残缺不全，未来是不可逃避的死亡，而对现状想做稍许改变也是毫无希望的。这种嗜好，无论是本能的或自觉的，都与健全理性和道德意志的要求明显相悖。但是，从契诃夫那里，从一个身体受到摧残的人那里不可能指望得到别的任何东西。大家都懂得或听说过绝望这个词。我们耳闻目睹骇人听闻、无法忍受的悲剧发生，如果每一个濒临死亡的人，都像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那样，为自己的死而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的话，那么生活就会变为噩梦一般的地狱，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应该做的不是向全世界呼喊自己的艰难困苦，而是尽可能少去惊扰他人。契诃夫应当在这一可敬的事业里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世上枯燥乏味的故事还少吗？多得无以计数，真是数也数不清！特别是契诃夫讲述的这种故事，应该想方设法地使它们尽可能地避开人的视线。要知道我们这里说的是动物机体的解体。有的人反对埋葬尸体，主张从坟墓里挖出腐朽的尸体，尽管他有理由说，确切地说是借口，这是他亲人的、甚至杰出的、赫赫有名的天才人物的尸体，对于这样的人能说什么呢?！这种事情在道德上，在健全的灵魂中除了厌恶和恐惧以外，不可能产生别的什么东西。在古代，魔法家、巫术师、星相家根据民间迷信说法，能与死人交往，并从中得到某种满足，甚或是真正的心满意足。不过，他们通常避开人们而藏匿到森林和山洞里去，走到沙漠和山岭里去，以便在那里独自沉溺于自己的反常意向。如果偶然地得以发现他们的事情，健康人则报以火刑、绞刑架、拷问。称之为恶的东西、最坏的恶，通常以对尸体的兴趣为

自己的源泉和开端。人可以原谅一切罪恶行为——残忍、暴力、杀人，但是任何时候他也不能原谅无私之爱和对死亡秘密的探求。在这一意义上，摆脱偏见的现代比中世纪走得稍许远一点。也许，差别只是在于我们忙于实际事务，对善恶的自然敏感性已丧失殆尽。我们在理论上坚信，魔法家、星相家在我们的时代已不复存在，也不能存在。我们在这方面的信念和漠不关心的态度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大家几乎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只看作是艺术家和政论家，并郑重其事地与其进行争论：俄国人民是否需要用树条赤身抽打，我们是否需要占领君士坦丁堡。

只有米哈伊洛夫斯基模糊猜测到这是怎么回事，称《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作者为寻宝之人。我说模糊地猜测到是因为我觉得，这一意见是已故的批评家用譬喻的口气来说的，甚至好像用开玩笑的口气作出的。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任何一个批评家就连偶然的比较中肯的话也没有提到过。契诃夫是寻宝之人、星相家、巫术师、念咒的人。这说明了他对死亡、败坏、腐朽、绝望有绝无仅有的嗜好。

当然，不只是契诃夫把死亡当作自己作品的主题。但是，问题不在于主题，而是在于怎样解释主题。契诃夫懂得这一点，他说："在我对一切事情所形成的思想、情感和概念中，没有一个可以把它们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共同东西。我的各种思想和情感都是单独存在的。凡是我对科学、文学、我的学生所抱的见解，凡是我的想象力所描绘的一切画面里，就连最巧妙的分析家也不能从中找到称之为普遍思想，即活人的上帝的东西来。既然如此贫乏，严重的疾病，死亡的恐惧，环境和人们的影响，就足以把我从前认为是

世界观的东西、我从中发现了生活的意义和生活乐趣的东西翻个底朝上，碾成齑粉。”这段话表达了契诃夫的一个最“新”思想，它决定了他后来的全部创作。它以一种质朴、忏悔的形式表现出来——人承认自己无法使自己的思想服从于最高思想，并把这种无能为力看作是自己的虚弱。这就足以在某种程度上使他避开了批评家的抨击和社会舆论的评判。我们对表示忏悔的罪犯总是乐意宽恕的。然而这种宽容完全是徒劳无益的：为了赎自己的罪，光承认自己有罪是远远不够的。当契诃夫痛悔不尽并公开承认自己“有罪”时，而他内心却依然故我的话，那又奈其如何呢？他在口头上承认普遍思想就是上帝（诚然，是小写的），同时却没有为它做些什么。他在口头上焚香叩拜于“上帝”面前，而实际上却在诅咒他。原先，在有病之前，“世界观”为他带来了快乐，现在却被打得粉碎！所以，人们会情不自禁地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世界观”果真为他带来过快乐吗？或许，快乐有自己独特的、自主的源泉；而世界观仅仅作为退职将军被请来装点门面，却起不到任何实际作用？契诃夫详细地叙述了科学工作、讲课、家庭、丰盛的宴会等给他带来了何等快乐。在所有这些场合都存在着世界观和思想，它们不仅不妨碍，而且好似在美化着生活。如此看来，你是为了思想而工作，建立家庭和吃饭。现在当你又必须为思想无所作为、苦恼、夜夜不寐，厌恶地咽下嫌弃的碎片时，世界观就被打得粉碎！结果是世界与宴会一起时才有用，宴会没有世界观仍旧有用（这不需要论证），而世界观自在自为（an und für sich）简直是分文不值……上面引用的契诃夫一段话的实质就在这里。他惊恐万状地承认自己有这种“新”思想。他觉得，只有他才是如此虚弱无力、毫无价值的

人，而其他一切人都不用给他们饮食，只要供给他们思想和世界观就行……假如相信人们在书里所说的，它本身导致的结果就是如此……尽管契诃夫千方百计地鞭挞、折磨和虐待自己，然而要改变问题是不可能的。更坏的是，许多人对世界观和思想抱以漠不关心的态度（实际上，这些无辜事物是不值得待以其他态度），对于契诃夫来说，他们却变成了冷酷无情和深仇大恨的对象。他不善于立刻就摆脱思想的统治，因此他就开始与奴役他的暴君进行长久的、顽强的、缓慢的，也可以说是游击的战争。他的斗争总的方面和在单个情节上都是扣人心弦的，正是由于迄今为止最有名的文学代表人物都坚信：思想固有神奇的魔力。大多数作家在干什么？他们在建立世界观——同时又以为在干一番不平常的重要而神圣的事业！契诃夫侮辱了为数甚多的文学家。如果说他终究得到了一定的宽恕，那么这是由于：第一，他是一个谨小慎微之人，他的作战方式就像是给对方表示充分重视；第二，人们对于天才是不求全责备的。

4

可见，《没有意思的故事》中心内容是：教授虽然阐述了自己的“新”思想，而实质上他却表明，他无法承认“思想”能对他自己发生权威的作用，并且表明，虽然大众把某种东西奉为最高目标，并如履行天职一样地去服务于斯，但他本人却缺乏这种虔诚。“让上帝审判我吧——我没有勇气去本着良心办事。”——这便是契诃夫在自己灵魂里所找到的对“世界观”全部要求的唯一答案。对世界观的这种态度变成了契诃夫的第二天性。世界观一提出要求，人则

承认其要求的正义性，但又巧妙地不履行其中任何要求，承认要求的正义性又日趋减少。在《没有意思的故事》里，思想还只是审判人，并以一切无灵性无生物固有的残忍来虐待人。正像扎入动物肉体并与有机体格格不入的木刺一样，思想在残酷无情地履行着其崇高使命，直到人臻至成熟并坚决地把它从自身中拔出，无论高难手术会有多么痛苦。在《伊凡诺夫》里，思想的作用就已发生了变化。已不是思想在使契诃夫不愉快，而是契诃夫在以不堪入耳的嘲笑和鄙视使思想不愉快。生物界的呼声优胜于偶然沾染的文化习惯。确实，斗争还在继续，也可以说，在与变幻无常的幸福进行斗争。但是，从前的俯首听命已没有了。契诃夫越来越摆脱过去的偏见，走向何方？他恐怕未必能回答这一问题。但是，他宁肯不回答，也不愿接受任何一种传统的答案。"我心里十分明白：我活不了半年了；似乎我目前应当关心的主要是坟墓里的黑暗生活问题，关心我在地下长眠后会梦见什么样的幻象的问题了。可是不知什么缘故，虽然我的智慧充分领会那些问题的重要性，我的灵魂却不肯承认。"与从前的情形相反，又被恭恭敬敬地推出门外，它的权利被转让给了"灵魂"，即交给了那模糊不清的意图。现在契诃夫正面临着把人类与永恒的秘密分开的死亡线，所以他本能地更加相信这种意图，胜过相信能预见死后前程的明晰的意识。科学的哲学在愤怒吗？契诃夫是企图动摇其坚不可摧的基石吗？不过，要知道契诃夫是一个健康受到损害的不正常的人。他的话可以不听，但是既然你们决定听听他的话，那就应当预先做好一切准备。正常人，甚至他是高谈阔论的形而上学家，也总是会使自己的理论适合于哪怕是片刻的需要，他若破坏，也只是为了然后仍用这

些材料重新建设。因此他从未存在材料不足的问题。他是听命于早已被贤哲发现和指出的人类根本规律的人，所以仅仅满足于形式追求者的微小角色。他用在自然界里得到的现成的铁来打制宝剑或犁、梭镖或镰刀。他未必想到了创作源自虚无之中的思想。而契诃夫的主人公，即极为(par excellence)反常的人们，则陷于反自然的，因而是可怕的创作源自虚无的必然之中。摆在他们面前的永远是绝望、走投无路、绝对不能干成任何事情。然而他们却在苟延残生，并未告别人世……

这里，出现了耐人寻味的、不同寻常的重要问题。我说过，源自虚无的创作是违反人类之天性。但是同时自然界常常剥夺人的现成材料，并且发号施令要求人进行创作。这是否意味着自然界自相矛盾呢？它在扭曲自己的造物吗？我们是否能将有关扭曲的概念视作纯粹的人类起源？也许，自然界比我们的贤哲要经济、英明得多，也许，假如我们未曾把人类分成无用的人和有用的人、有益的人和有害的人，善良的人和恶毒的人，我们就可能会懂得更多的东西；假如我们暂且压抑主观评价的嗜好，我们可能会试图更加相信自然界的造物？不然的话，现在“仇恨的火花”、“寻宝之人、巫术师、魔法家”就会在人们之间筑起一道不仅逻辑论据而且就连大炮也摧毁不了的墙。我不指望，循规蹈矩的人也会信服上述见解。是的，大概并不需要消除人们之间长期以来的善恶截然对立的概念，就像不需要让青年人一生下来就具有成年人的生活经验，让黑色卷发和绯红面色一起从地面上消失不见一样。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的。世界已经计有多少万年，有多少民族在地球上生存和死去，然而，我们根据保存下来的书籍和传说可以知道，善与

恶的争论从未停止过。永远都是这样：善不怕光天化日，善人是靠共同的、联合的生活过日子，而恶则隐匿于黑暗之中，恶人是永远孤独的。不可能是别的样子。

契诃夫的主人公都害怕光明，都是孤独的人。他们羞于自己的绝望，并且也明白，人们不可能帮助他们。他们也许在往某个地方走去，但是没有呼唤任何人跟自己走。他们被剥夺了一切，他们也应当创造一切。大概，由此就产生了他们用以看待通常人类创造的最有价值的产品时的那种毫不掩饰的轻蔑态度。不管你与契诃夫的主人公交谈什么，他都千篇一律地回答说：谁也不可能教会我任何东西。你们给他提供新的世界观，但他从你们一开口就已感到，新世界观只是企图堆砌旧砖石的新手法而已，因而急不可耐地、往往是粗鲁地回避你们。契诃夫是一个极为谨小慎微的作家。他害怕社会舆论，因而不敢等闲视之。但他还是对公认的思想和世界观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极大的嫌恶。他在《没有意思的故事》里，至少还保持着外表的恭敬口吻和姿态。后来他就肆无忌惮了，他非但不谴责自己对一般思想的背叛，而且公开地对它表示愤怒甚而嘲笑。在《伊凡诺夫》里，这一点表现得相当充分，无怪乎这一部戏剧在当时曾引起了极端的愤懑。伊凡诺夫，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艺术家可以为他做的事情，就是体面地把他埋葬，也就是说，称赞他的过去，悔恨他的现在，然后请一般思想来送葬以冲淡死亡产生的惨淡的印象。只要提一下人类的无数现成形式的世界使命，原来未解决的困难事情也就被消除了。在描写行将死去的伊凡诺夫的同时，还应该描绘光明的、朝气蓬勃的、富于希望的生活，死亡和破坏的印象就会不再强烈和痛苦。不

过，契诃夫的行为却背道而驰：他不是赋予青春和思想以支配破坏和死亡的权利，正如一切哲学体系和许多艺术作品所做的那样，而是故意地使伊凡诺夫在荒芜废墟上成为一切事件的中心。与伊凡诺夫一起的还有年轻的生命，思想也有自己的代表。但年轻的萨沙，一个可爱、诱人的姑娘，衷心钟情于身心受损伤的主人公，不仅没有挽救自己的情人，而且自己也死于力所不及的重担之下。那么思想呢？只要提一下里沃夫医生的形象就足够了，契诃夫认为他是万能主宰者的重要代表，你们立刻会明白，他认为自己不是思想的臣民和进贡者，而是它的死敌。里沃夫刚一开口，全部登场人物就不约而同地竞相以最无礼的方式打断他的话——或嘲笑、或威胁，就差没打他耳光。其实，这位年轻的医生在履行着自己强主代表的义务方面，就其胆量及诚意看，丝毫不逊于斯塔罗杜姆及从前戏剧中的其他可敬人物。他袒护受屈辱的人，想要恢复被践踏的权利、愤恨、谎言，等等。难道他能超越自己权能的界限吗？当然，不能。但是，在伊凡诺夫们和绝望占据统治地位的地方，没有也不可能有思想的位置。

与他一起生活是不可能的。读者习惯于认为，一切王国都可能倾覆和灭亡，只有思想王国的威力是永久无穷(in saeculu saeculorum)、不可摧毁的。现在他惊奇地看着面前出现了闻所未闻的场面：思想被孤立无援的、衰弱无力的、毫无用处的人从王位上推翻在地！伊凡诺夫简直是在胡言乱语！他从第一幕起就已说出一段冗长的话，他的话不是随便讲给某一个人，而是讲给思想的化身——斯塔罗杜姆们及里沃夫们：“我有权向你们进一点忠告。不要娶犹太女人，不要娶个有精神病的，也不要娶个女学究，而要

选择一个平凡的、暗淡的、没有鲜明色彩或者才华的姑娘。总之，要按照传统的模式建立你的整个生活。背景越暗淡，越单调，就越好，我亲爱的孩子。不要光凭自己一个人去和千万人对抗，不要向风车挑战，不要拿头往墙上撞……但愿上帝叫你避免各式各样的、合理经营的、惊人的学派、热衷的演讲吧……把自己关在你自己的壳里，尽上帝给你安排好的那一点点微小的职责……那要安乐得多、幸福得多，也正当得多。”里沃夫医生这位各种专制思想的代表感到，他的女王受辱于自己的大国权利，忍受这样的侮辱也就是事实上放弃了主权。本来伊凡诺夫曾经是也应当始终是臣民。他怎能这样劝告呢，又怎敢在他应当虔诚地听从，默不作声地、毫无抱怨地顺从时提高嗓门呢?！这岂不是造反吗！里沃夫试图挺直腰板，义正辞严地回答无礼的作乱者。不过，他没有成功。他用颤抖的、嘶哑的嗓子咕哝着习惯的、不久前还具有无坚不摧力量的字眼。不过，它们没有发生通常的作用。它们的力量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上何处去了？里沃夫甚至不敢老老实实地说：到伊凡诺夫那里去了。这对于任何人来说再也不是秘密。不管伊凡诺夫做任何卑鄙和丑陋之事——而契诃夫在这一方面毫不吝惜，他把各种罪行，直至几乎有意识地杀害忠实于他的女人都列入主人公的履历表——社会舆论毕竟是向他，而不是向里沃夫低头屈服。伊凡诺夫专事破坏、粗鲁、不顾情面、残酷无情、绝不在任何东西面前停步。医生咬牙切齿地对伊凡诺夫说出“下流东西”一词，但这个词对他并不贴切。在某种意义上，伊凡诺夫是正确的，有着自己特别的、无论谁也不明白的正确性，但是如果相信契诃夫所说的，又是无可争议的正确性。萨沙年轻、敏感、有才干，崇拜地、冷漠地从

诚实的斯塔罗杜姆及里沃夫身边走过。整个戏剧就是以这一点为根据的。诚然，伊凡诺夫最后自杀了，也可以说，这一点可以作为最终的胜利仍然属于里沃夫的形式根据。契诃夫如此结束剧本，做得棒极了，没有无限制地拖延下去。讲完伊凡诺夫的故事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契诃夫后来又写了15年，他只是讲述着没有讲完的东西，然而终究不得不中断下来，但并没有结束……

如果有人把伊凡诺夫说服里沃夫的话做这样的解释，并且把契诃夫与写《战争与和平》时的托尔斯泰相比，认为他将日常生活的安排看作是自己的"理想"，那么这个人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作者。契诃夫只是在保卫自己时才来反对"思想"，并对它说出了头脑里冒出的最使人难堪的话。因为，对于思想来说，还有什么能比听到对日常现象的称赞更难受的呢?！然而，契诃夫有时恰恰很无情地描写了日常现象。举《语文教师》的故事为例。教师完全按伊凡诺夫所教的方案生活：公务也好，妻子马纽霞也好(她既不是犹太人，又不是精神病患者，也不是女学究)，房子是贝壳也好[1]，等等，这一切都不妨碍契诃夫从容不迫地、慢慢地把可怜的教师赶进日常的圈套里，使他陷入这种状态，即"只是倒在地板上、哭喊着、并以头撞地板"。契诃夫未曾有过"理想"，甚至也未有过日常生活的理想，这理想曾被托尔斯泰伯爵以无与伦比的卓绝手法在自己早期作品里颂扬过。理想的前提是服从、自愿地放弃自己对独立、自由和力量的权利——这种要求，甚至对这种要求的暗示，都激起契诃夫只有他才可能有的全部嫌弃和厌恶……

---

[1] 此处是比喻一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译者注

5

总之，契诃夫的真正的、唯一的主人公是一个毫无希望的人。这种人在生活中是绝对没有什么事可“做”的——除了用脑袋撞石头。无怪乎这种人不为大家所容。他到处播散死亡和破坏。他自己虽然懂得这一点，但又没有能力回避人们。他衷心地希望摆脱自己可怕的处境，他最爱慕活泼的、年轻的、纯贞的人：他希望靠他们的帮助来恢复自己已丧失的生活权利。真是徒劳枉然的希望！破坏的原则永远是无坚不摧的，契诃夫的主人公归根到底是自行其是的人。他什么也没有，他自己应当创造一切。这就是“创造源自虚无”，更确切些说，创造源自虚无的可能性是唯一能吸引、鼓舞契诃夫的课题。当他把自己的主人公抢劫一空时，当契诃夫使主人公只能用脑袋撞墙时，他才开始感受某种满足，在他毫无生气的眼神里，燃烧起奇异的火花，难怪米哈伊洛夫斯基觉得它是仇恨的火花。创造源自虚无！这一命题不是超越人类力量和人类权利的界限了吗？显而易见，对于米哈伊洛夫斯基来说，对这个问题不能有两种答案……至于说到契诃夫本人，如果以这种故意的尖刻说法把这一问题提示给他，大概，他不会对它做出回答，尽管经常和它打交道。可以毫无顾忌地说，那些毫不犹豫地在某种意义上回答这个问题的人，从来都没有触及过这个问题，根本没有触及过所谓存在的终极问题。犹豫不决是人类见解里的必要组成要素，人的命运引向了劫运所致的使命。当契诃夫写完自己《没有意思的故事》的最后几行字时，他的手是多么颤抖啊！教授的女学生——他的最亲近、最亲爱，但又是健康受到损害，尽管还很年轻却已失

去希望的人——到哈尔科夫来向他讨教。下面就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她脸色苍白，双手按着胸口：“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我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看在上帝的面上赶快告诉我，立刻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呢？请您告诉我，我该怎么办才好！”

“我能说什么呢？”我困惑莫解地说：“我是无能为力的。”

“我求求您，请您告诉我！”她气喘吁吁地说，浑身都在颤抖：“说实话：我照这样子再也活不下去了。我支持不住啦！”

她往一把椅子上一坐，抽抽搭搭呜咽起来。她把头往后扬绞着手，脚顿着地板；她的帽子从头上掉下来，吊在帽带上，晃来晃去，她的头发散了。

“帮帮我！帮帮我吧！”她恳求我，“我活不下去啦！”

“我没有什么可跟你说的，卡嘉。”我说。

“帮帮我！”她抽抽搭搭地说，抓住我的手，吻我的手。“要知道，您是我的父亲，我唯一的朋友。您本来就聪明，又受过教育，您活了这么大岁数！您做过教师！请您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呢？”

“说真的，卡嘉，我不知道。”

我茫茫然，慌了手脚，给她哭得心乱了，站都站不住了。

“卡嘉，我们吃早饭去吧。”我说，勉强笑了一笑。“别哭了！”

但很快我又用有气无力的声音说：

“活不了多久了，卡嘉……”

“只说一句，只说一句吧！”她哭泣着，向我伸出手来……

但是，教授没有说出这句话。他把话题转到天气、哈尔科夫和

其他无关痛痒的事情上去。卡嘉站起来，没有瞧他，向他伸出手。他在结束故事时写道："我想问她：那么你不来参加我的葬礼啦？可是她的眼睛不看我，她的手冷冰冰，好像是生人的手一样……我默默地送她直到门口。她就这样离开了我，顺着长廊走了，头也不回。她知道，我在瞧她的背影，大概，走到转弯的地方，她会回头看一眼吧。不，她没有回过头来看。我最后看了她的黑衣服闪了一闪，她的脚步声就听不见了……再见吧，我亲爱的！"……"我不知道"，聪慧的、博学多识的、阅历丰富的、一生只以教师为职业的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只有用这样一句话才能回答卡嘉的问题！在他过去年代全部丰富经验里没有找到任何一个办法、准则或建议，哪怕多多少少适合于他个人和卡嘉极不合理的新生活条件。卡嘉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而他本人也不能再忍受自己的令人嫌弃和羞辱的孤独。他们两个人——他老态龙钟，而她却年纪轻轻——两人衷心希望互相支持，但两人却束手无策、毫无办法。他是用"我不久就要死了"来回答她的"我该怎么办"，而她对于他的"我不久就要死了"的问题，则用疯狂的痛哭、绞着手和荒谬地重复同样的话来回答。最好还是什么也不问，不做"倾诉衷肠"、开诚布公的促膝交谈为好。但是对此他们并未意识到。过去促膝谈心缓冲了他们的生活，坦率的自白曾经使他们亲密无间。现在却相反，在这种不期而遇之后，人们已经不能互相忍受了。卡嘉离开了老教授，离开了自己的教父，离开了自己亲爱的父亲和朋友，并且意识到，他对于她已经如同陌路。甚至在她离开而去时，也没有回过头来朝他看一眼。两人都感到，只有用脑袋去撞墙了。在这种事上，每个人都因自己的畏惧而行动，并且已经不可能幻想灵魂的统

一慰藉了……

6

契诃夫知道，他在《没有意思的故事》和《伊凡诺夫》里已经把话讲到了何种程度。某些评论家也知道并给他提出过警告。我不准备说，这是不是对社会舆论的畏惧，或者对被揭露的事情的惊惧，或者两者兼有，但是显而易见，契诃夫确实想过；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抛弃他曾经坚持的立场并决定后退。《第六病室》是这一决定的结果。这部小说里的登场人物仍是我们早已熟悉的那个人，契诃夫式的人——大夫。环境也依然如故，尽管有少许变化。在大夫的生活里没有发生任何特别的事情。他来到外省的一个偏僻的地方，渐渐地脱离了人和生活，陷于毫无意志的境地，而他把这看成人类生存的理想。他对一切都漠不关心，包括自己的医院，他几乎不在医院里待着，医院由一个醉汉和粗鲁的医务助理员主事，这儿盘剥病人，胡乱给病人治病。

在精神病科，是一个出身退伍兵的看守者在主事，他用拳头对付暴躁不安的患者。对这位大夫来说，一切都无所谓，他好像生活在遥远的地方，在另一个世界里，不理解他眼前所发生的事情。他一次偶然来到精神病科和一位病人交谈。病人向他诉说医院的秩序不好，准确些说，医院里的令人厌恶的杂乱无章。大夫心平气和地听完他的话，却不是用行动，而是用话语来搪塞他们。他试图向自己的疯子对话者证明，外部条件对我们不能有任何影响。疯子不同意，直言不讳、反唇相驳，如同许多精神不正常的人的思想一样，这之中除了荒诞不经的见解以外，不乏非常深刻的意见。也

许，极少有荒诞的见解，因为根据谈话你根本想不到是在与疯人打交道。大夫对于自己新的结交感到高兴，但是并未尽绵薄之力，以便他有轻松之感。现在，就像以前那样，不幸的人仍处于看守者的统治下。看守者稍不顺心就会揍人。病人，大夫，周围的人，医院的全部情况和大夫的住宅都是以令人惊叹的才干描写的。大家对绝不反抗和命中注定的冷漠态度都有精神准备：让人们狂饮无度、争闹打架、抢劫掠夺、横行不法——反正一样，很显然，都是根据大自然的最高主旨预先决定了的。大夫所信奉的无所为的哲学，恰恰是由人类生存的不变规律潜移默化所致。似乎，不能摆脱它的统治。直到这儿，一切大体上还是契诃夫的风格，但是，结尾却完全不同了。大夫本人由于自己同事的阴谋，作为患者来到医院的精神病科。他失去了自由，被禁锢在医院的厢房里，甚至挨揍，打他的那个人，就是他教诲疯了的交谈者应当容忍的看守者，事情就在这一交谈者的眼前发生。大夫刹那间果真从梦魇中惊醒。他出现了斗争和反抗的渴望。的确，他将在那里死去，但是思想终将胜利。对这篇小说的评论可以说是相当令人满意的：契诃夫公开地悔罪，并背弃了不反抗理论。《第六病室》当时似乎有许多同情者。我们顺便补充一点，大夫死得非常美：在最后的一瞬间看到一群鹿，等等。

事实上，故事的结构没有离开怀疑，契诃夫想要让步，并做了让步。他体验到绝望是不能忍受的，创作源自虚无是不可能的。用脑袋撞石头，永远是用脑袋撞石头，这太可怕了，还是回到唯心主义那里去为好。妙不可言的俄罗斯谚语说得对：谁也不能有把握说不会坐监，或不会讨饭。契诃夫成了俄国的著名作家，他开始

颂扬思想。但是为时不长！他最近的小说《决斗》已具有另一种性质。它的结局好像仍是唯心主义的，但也只是好像而已。主要人物拉耶甫斯基，正像所有契诃夫的主人公一样，是一个“寄生虫”。他什么也不做，并且什么也不会做，甚至也不想做，多半靠施舍度日，欠了一屁股债，勾引妇女，等等。他的情况令人厌恶，和别人的妻子偷情，尽管他觉得她像自己的情妇一样讨厌，但是，他不善于摆脱她，总是穷困潦倒，熟人都不喜欢和鄙视他。他总觉得自己在准备拼命地逃跑，去哪儿都可以，只要离开他现在生活的这个鬼地方。他情妇的处境，几乎也同样可怕。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爱情，甚至没有爱慕，她就委身于第一次遇到的鄙俗之徒。后来她觉得，她从头到脚都受到了污辱，这是她倾大海之水也不能洗净的污辱。这对情人生活在高加索的一个偏僻小镇上，自然吸引了契诃夫的注意力。主题倒饶有趣味，它说的是：两个被污辱的人，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其他人都感到厌烦……

为了对比，契诃夫使拉耶甫斯基与动物学家冯·科连相遇。冯·科连来到沿海城市从事重要的（大家公认为重要的）工作：研究水母的胚胎学。冯·科连，一看名字就知道，显然是一位德国人，看上去很健康、很正常，是一个纯洁的好人，冈察洛夫[①]的斯托尔兹的后代，同样也是把奥勃洛莫夫老头作为近亲的拉耶甫斯基的直接对立者。但冈察洛夫把斯托尔兹同奥勃洛莫夫对立与契诃夫的对比不同，具有另一种性质和意义。这位40年代的小说家希

① 冈察洛夫（1812—1891），俄国作家，代表作有《奥勃洛莫夫》《悬崖》等。斯托尔兹、奥勃洛莫夫都为《奥勃洛莫夫》中主人公。——译者注

望，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会振兴俄罗斯。奥勃洛莫夫并未被描绘成毫无希望之人。他只是懒惰成性、呆板成习、毫无进取心而已。仿佛他要是觉醒，他一人会胜过十个斯托尔兹。可拉耶甫斯基却是另一回事。这个人已经觉醒了，并且早就觉醒了，但是他的醒悟并未带来什么好处……“他不喜欢大自然，他也不信仰上帝，他生平交结的那些轻易信任别人的姑娘，被他以及他的同龄人毁掉了，他一生从没有在自己的花园里栽一棵树，也没种一株草，生活在充满活力的世界中，他没积过一件德，光是破坏、毁灭、说谎、说谎。”善良仁慈、离群索居的奥勃洛莫夫蜕变为令人嫌弃和可怕的败类。而纯洁正直的斯托尔兹却始终以一个纯洁正直的人活在其后代人的心目中！不过，他与新生的奥勃洛莫夫按另一种方式交谈。冯·科连称拉耶甫斯基为恶棍、坏蛋，并要求对他施行最严厉的制裁。调和科连同拉耶甫斯基是不可能的。他们之间的冲突越频繁，他们相互憎恨也就越深、越坚固、越无情。他们简直不共戴天。只有二者择一：或者是正常的冯·科连，或者是败类、颓废派拉耶甫斯基。当然，一切外部的物质力量都在冯·科连方面。他在自己的行动和理论上永远是一贯正确，他永远是征服者，永远是胜利者。异乎寻常的是，契诃夫是所有哲学的不可调和的死敌。他作品里的任何一个登场人物都不懂得哲学，即使懂点哲学，那么通常也是一知半解、滑稽可笑，不能让人信服。冯·科连是个例外，他是实证唯物主义学派的典型代表。他的话流露出力量和信心，甚至富于激情和最清晰明白的逻辑连贯性。在契诃夫的小说里，许多主人公都是唯物主义者，不过带有隐蔽的唯心主义色彩，不过是按照 60 年代的模式依样画葫芦而已。契诃夫对待他们太不公平，

并还加以嘲笑。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公开的和隐蔽的，都激发起契诃夫难以忍受的痛苦体验。他情愿直率的唯物主义的无情威胁，也不愿接受人道主义化的唯心主义存心不良的安慰。世上有一种压迫人、扭曲人的所向无敌的力量，这是极为明显的。稍有不慎，即使最伟大的人也会像区区小人一样成为它的牺牲品。欺骗自己仅仅是在你只凭道听途说而知道它的时候。但是，只要谁一旦陷入必然性的铁掌之中，那他就对自欺欺人的唯心主义永远失去了兴趣。他已不是在贬低，而是非常倾向于夸大敌人的力量。冯·科连鼓吹纯粹即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充分地表现出我们对自然界自发力量的依赖。冯·科连句句如锤击，他的每一次敲击不是打在拉耶甫斯基身上，而是打在契诃夫身上，打在他最要害的地方。契诃夫赋予冯·科连越来越多的力量，也就把自己放在挨打的位置上。这是干嘛？为什么？你看，怪不怪呢？也许，契诃夫怀有一个秘密的希望，通向新生活的唯一途径是自虐？他没有把这一点告诉我们，可能他本人也不知晓，或许是害怕侮辱如此独霸现代文坛的实证论唯心主义。他还不敢起来反对欧洲的社会舆论，要知道，我们的哲学世界观并非由我们创造，而是从欧洲传给我们的！为了不与人们争辩，他对于自己可怕的小说安排了千篇一律、皆大欢喜的结局。在小说的结尾，拉耶甫斯基终于“改邪归正了”，与自己的情人结婚，放弃了放荡不羁的生活，并且开始勤奋地抄写文件，以便支付债务。正常的人们或许会心满意足了，因为他们在寓言里看到的只是最后几行——道德，而《决斗》的道德是最健康的：拉耶甫斯基改邪归正了，开始抄写文件。确实，这种结尾也许更像是对道德的嘲弄，不过正常人并不是有敏锐洞察力的心理学

家，他们畏惧模棱两可，并以其固有的“真诚”把作家的全部语言都当作是真的。得了吧！

7

契诃夫真正重视，并严肃认真予以反对的唯一哲学是实证论唯物主义，也就是实证论的、即有局限的、不以完美理论自居的实证唯物主义。契诃夫切身体验到活人对看不见的、威风凛凛和无灵魂的自然规律的可怕依赖，而唯物主义，特别是科学的唯物主义，是矜持的、不追求最新成就和逻辑完整性的，可以完全把它归结为对我们存在的外部条件的描写。每天、每时、甚至每刻的经验都使我们信服：软弱无力的孤单之人，一旦要和自然规律发生冲突，就只有永远迁就和让步、让步、再让步。既不能使老教授返老还童，又不能让身体受伤的伊凡诺夫健壮起来，也不能让拉耶甫斯基洗去他遭受到的污垢浊泥，等等，乃至纯粹唯物主义的、斩钉截铁的无穷不可能（non possumus）。反对这种不可能，人类天才除了俯首听命或者遗忘脑后以外，也会束手无策。忍耐吧，我的心，愿你沉睡不醒。（Résigne-toi，mon cœur，dors ton sommeil de brute）——面对契诃夫的作品所展示的画面，我们只能说这句话，别无他言。俯首听命是表面的，它掩盖的是对不知道的敌人之内心的、痛苦的、恶毒的憎恨。梦魇、遗忘只是假装的，因为难道把自己的梦幻称为沉睡不醒（sommeil de brute）的人会呼呼大睡，能遗忘脑后？然而不这样该怎么办呢？《没有意思的故事》所充满的强烈抗议、内心的愤懑需要外泄，很快都成为不必要、甚至有损于人的尊严。《万尼亚舅舅》是契诃夫进行抗议的最后剧本。万尼亚舅

舅，既像老教授，又像伊凡诺夫，敲打着警钟，以自己惨淡清苦的生活敲打着前所未有的警钟。他也不用自己的声音在舞台上呼唤：生活完了，生活完了——仿佛他周围和全世界真有谁能回答他的不幸似的。他还不限于呼喊。他几次侮辱生母。他像一个疯子，毫无目的地，毫无必要地开始对自己想象的敌人即可怜不幸的老头，索尼娅的丑陋父亲开枪。他不仅用声音，而且诉之于手枪。他下定决心要放响世上所有的炮，擂响所有的鼓，摇响所有的铃。他似乎觉得，所有的人、全世界都在沉睡不醒，应当唤醒亲人。他决心干任何蠢事，因为他没有更好的出路。一下子就承认毫无出路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于是，契诃夫式的故事开始了：言归于好是不可能的，不言归于好也不可能，剩下的只有用脑袋撞墙了。万尼亚舅舅本人是公开地当着众人的面这样做的，不过，后来他却极其痛苦地回忆起自己这种不由自主的坦率！在毫无意义和折磨人的闹剧之后大家都散去时，万尼亚舅舅明白了，应当缄默不语，绝不能向任何人，甚至最亲的人说出已经知道的事情。局外人眼里容不得绝望的场面。“蹉跎了岁月”，只能埋怨自己：你不再是一个人，所有的人都与你格格不入。你的亲人已经不是亲人，而是陌生人。你既无权帮助别人，也不要指望得到别人的帮助。你的命运是绝对孤独的。契诃夫慢慢地深信这一“真理”：万尼亚舅舅是“权利宣言”所激起的喧闹的公开抗议之最后一次试验。甚至在这一剧本里也只有万尼亚舅舅一人发狂，虽然在登场人物中有阿斯特罗夫医生和可怜的索尼娅，他们也同样有权怒吼，甚至开炮。但是他们都缄默不语，甚至一味地重复有关人类幸福未来某种优雅的、天使般的辞句——换言之，他们加倍地沉默。因为在这些人的话

中,“优雅的辞句”表明完全脱离世界;他们离开了所有人,并且也不让任何人走近自己。他们使用优雅的语言,就像中国的万里长城把自己同亲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隔离开来。他们与所有人在外表上都一模一样——这就是说,任何人也不能触及他们的内心生活……

临终之人的这一紧张的内心生活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什么样的作用?大概,契诃夫会用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回答卡嘉的话“我不知道”来回答这一问题。仅此而已。但是,这一生活与其说像生活,不如说像死亡——只有这种生活吸引和攫住了他。因此他的话语逐年变得缓慢。在我们的作家中,契诃夫是最温和安详的作家。他的作品中的所有主人公的能量都是内向的,而不是外向的。他们都不能创造任何可见的东西,尤有甚者,他们以其外在的消极和毫无作为破坏着全部可见的东西。冯·科连一类的“积极思想家”毫不犹豫地用可怕的话语痛斥他们,他对自己和自己的正确越是满意,他对自己的言辞表达就越下功夫。“坏蛋、下流东西、堕落者、蛮猴”如此等等,对拉耶甫斯基,冯·科连真是什么话都说得出来!公开的积极思想家想要迫使拉耶甫斯基抄写文件。不公开的积极思想家即唯心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也没有使用骂人的脏话。但是,他们却活活地把契诃夫的主人公埋葬在其唯心主义的、名为世界观的坟地里,而契诃夫本人则坚决放弃“解决问题”。大概,大多数批评家都以这种坚决态度希望交好运,继续长期地、没完没了地讲自己关于人们和人们生活的故事。因为人们已身无它物,除了关心一件事,这就是生死之间的可怕悬案。它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生还是死?仍应回答说:不知道。这句话引起

了积极思想家的最大厌恶，但又奇妙地是契诃夫式人物见解的固定因素。因此，这句话和敌视它的唯物主义哲学何其相似乃尔。它在唯物主义哲学中没有要求愉快的俯首听命的答案。它在抽打和毁灭着人——但它不自称为理性的，也不要求鸣谢自己，它无所需求，因为它没有灵魂，不会说话。既可承认它，与此同时又可憎恨它。人能斗得过它——人就是正确的；人若斗不过它，则是败者必受大祸（vae victis）[①]。非灵性的、无个性的、冷冰冰的自然界的坦率无情的声音，要比人类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口蜜腹剑的小曲听起来欢快得多！可这一点是最主要的，与自然界斗争还是可能的！在与自然的斗争中，一切手段都可允许。在与自然的斗争中，人自始至终都是人，因而他不论用什么手段来自救，甚或拒绝承认宇宙的基本法则——物质和能量的不灭、惯性定律，等等，他也是正确的。因为即便再巨大的死的力量也应当为人类服务，谁会反对这一点呢？"世界观"则是另一回事！在不容反驳之前，世界观会提出不容争辩的要求：人应当为思想服务。这一要求不仅是不言自明的，而且应认为是极为高尚的。契诃夫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进行选择，他倾向于唯物主义——强劲有力然又诚实的对手一方，这有什么奇怪？只能用鄙视来同唯心主义做斗争。在这方面，契诃夫的作品无可厚非……但如何同唯物主义进行斗争？可能战胜它吗？或许读者会觉得契诃夫的手法怪诞不经。但是，显而易见，他坚信，只有一种斗争手段，这是古代预言家曾经使用过

① 此话为拉丁语，原是一个高卢人首领对被他打败的罗马人说的一句话，表示胜者绝不会体恤败者之意。——译者注

的手段，即用脑袋撞墙。没有雷霆，没有炮声，没有警钟，孤苦伶仃，沉默寡言，远离自己的亲人，也远离他人，为了毫无意义并早已被科学和健全理性指控过的企图而在集中绝望的全部力量。不过，难道你们有权去指望契诃夫得到科学方法论的批准吗？科学已剥夺他所有的一切，他命中注定了创作源自虚无，也就是说，他注定去干正常人只利用正常方法是绝对不能办到的事情。为了去做不可能的事，就应当首先摒弃因循守旧的手法。我们无论怎样顽强地继续科学探索，它仍然不能给予我们长命水[①]。要知道，科学就是从把追求人类万能作为根本达不到的东西加以抛弃开始：它的方法就是，一些领域里的成就排除了在其他领域里的探索。换言之，科学方法论是由科学给自己提出的任务的性质所决定的。确实，科学的任何一项任务都不可能用脑袋撞墙来完成。这尽管不是什么新方法（我再重复一遍，预言家已经知道这种方法并加以利用过），但是对于契诃夫和其主人公来说，它比一切归纳法和演绎法（顺便说说，这也不是科学所发明的，而是从世界创立时起就已经存在了的）许诺更多。它是以深奥莫测的本性暗示给人的，而且每当需要它出现时，它就出现在舞台上。所以科学就一味斥责它，这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它同样也在斥责科学。

8

现在，契诃夫创作的进一步发展和倾向也许是清晰可见了。在探索新的永远拐弯抹角、大有争议的道路上，他所特有的、唯他

① 古代炼金术士空想的一种使人长生不老、延年益寿的饮料。——译者注

独有的“清醒”唯物主义同狂热的顽强精神相结合，也一目了然。他像哈姆雷特一样，想要在自己的对手底下“挖很深的地道”，以便一下子就把工程师及其建筑物炸到九霄云外。在这一繁重艰辛的地下工作中，对于许多无法忍受的人来说，他的忍耐和坚忍不拔简直令人惊叹。这里到处是漆黑一团，没有一线光明，也没有一丝火花，而契诃夫却在缓慢推进，勉勉强强地移动。经验不足而又急不可耐的人也许根本不能发现运动。是的，大概就连契诃夫本人也并不知道，他是在向前运动呢，还是在原地徘徊不前。指望前进是不可能的，甚至连希望也没有。人类已进入了为预测前进和振作的理性也拒绝帮助自己的自我生存的地带。这样一来，对于所发生的事也就不可能得到一种鲜明、清晰的了解。一切都披上了神奇玄妙、毫无意义的色彩。这使你对一切都信疑参半。在《黑衣修士》里，契诃夫用好像就连自己也困惑莫解的语调，描绘了一个崭新的现实。这儿是现实已经结束、荒诞无稽业已开始的地方。黑衣修士引诱年轻的学者走向神秘的远方，那里应当存在着人类美好的幻想。周围的人称修道士为幻觉，并且与他的医疗手段——溴化物、增强营养、牛奶进行斗争。科弗林本人不知道，究竟谁正确。当他与修道士交谈时，他似乎觉得，修道士是正确的；可当他亲眼目睹痛哭流涕的妻子以及医生的严肃、惊惧不安的脸时，他承认，自己处在直接把他引向疯狂的固执思想的支配之下。归根到底，黑衣修士得到了胜利，科弗林无法忍受他周围的平庸、并且还离开了他认为是刽子手的妻子和亲人，走向某个地方。但我们看到，他什么地方也没去成。小说的结尾是他告别人世，这样作者就可以打上句号了。这已是司空见惯了：当作者也不知道如何安排

主人公时，他就无情地杀死他。大概，这一手法迟早终将被淘汰。大概，未来的作家会相信自己和大众，一切矫揉造作的圆滑——都毫无必要。素材使用完毕，那就中断叙述，即便用半句话也行。契诃夫有时就这样干——然而也仅仅是有时而已。他宁愿大部分为履行传统要求，给予读者一个结局。这一手法不像第一眼看去就能证实的那样无关宏旨，因为它会令人误解。就拿《黑衣修士》来说吧，主人公之死好像指明了，按契诃夫的看法，一切反常必须通过荒谬绝伦的生活引向荒谬绝伦的死亡。其实，契诃夫也未必坚定地深信这一点。大概，他从反常性那里期待某种东西，因此才对脱离常规的人们予以特别关注。的确，他并没有由此而得出经久不变的明确结论——尽管创作极为紧张。他深信不疑的是，错综复杂的迷宫没有出口，因为迷宫就是捉摸不定的迷路，永恒的犹豫不决和动摇不定、毫无缘由的痛苦、无缘无故的高兴，一句话，正常人极为害怕和逃避的一切，都成了他生活的本质。应该讲的是这一点，并且也只应当讲这一点。既不是我们捏造正常的生活，也不是我们捏造不正常的生活。为什么就只有认为正常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现实呢？……

对于契诃夫来说，应当认为他的《海鸥》一剧是其杰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在这部戏剧里，艺术家对生活的真实态度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这部戏剧的全部登台人物，或者是一走路就担心迷路的瞎子；或者是为某事疲于奔命、惶恐不安的半疯人。名孚众望的女演员阿尔卡基娜紧紧用牙咬住自己的七万卢布、自己的名誉和最后的一位情人。特里果林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作家，日夜不停地写着、写着、写着，他既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目

的要这样做。人们阅读并倍加称颂他的作品，可他却不属于自己；他像神话里的摆渡人马尔科一样，毫不懈怠地工作，从这边岸到那边岸地来回摆渡和运送旅客。对江河、小舟、旅客都厌烦至极——然而怎样才能摆脱它们呢？随便把桨扔给谁吧，——这一办法是如此简单，不过，就像在神话里一样，扔掉木桨之后就应当走向天堂。不只是特里果林，在契诃夫的作品里一切不太年轻的人们都像摆渡人马尔科。他们的工作是他们明显不需要的，但他们好像被施用了催眠术一样，不能从旁力支配下挣脱出来。生活的单调、平静、忧郁的节奏使他们的意识和意志昏昏欲睡。契诃夫到处强调人类生活中的这一奇异怪诞、难以猜测的特征。契诃夫的主人公总是在说着同样的事，总是在思索着同样的事，总是在做着同样的事。一个每次都按臆想的陈规旧矩去建造房子的人（《我的一生》），另一个从早到晚由于出访而蒐集卢布旅行的人（《姚内奇》），第三个是收卖房子的人（《三年》）。就连出场人物的语言都故意千篇一律地按俗谚——讨厌地说来说去老是那一套，在反复地说着各式各样的人。不管有机会还是没有机会，谁始终不变地反复念叨着"不坏"，谁就是"蛮横无理"，诸如此类。大家都千篇一律地直到痴呆，并且大家还畏惧打破这一痴呆的单调生活，好似在它之中隐藏着不寻常的高兴之原因。请看特里果林的独白：

"……我们谈谈也好吧……就谈谈我美好的生活吧……那么，从哪儿谈起呢？（思索了一会儿）有的时候，人常常被一种念念不忘的心思萦绕着，比如说，就像一个人日日夜夜梦想着月亮那样；我也有这种念念不忘的心思。一个令人厌烦的

思想，日日夜夜在折磨着我：我得写作，我得写作，我得……一篇小说几乎还没有写完，却又必须开始写一篇新的了，接着是第三篇，再接着是第四篇、第五篇。我接连不断地写，就像一个旅客马不停蹄那样。我没有别的办法。请问你，这里边可有什么美丽的和光明的呢？啊！这是一种荒谬的生活呀！你看我现在和你闲谈着，我的情感激动着，可其实我每一瞬间都惦记着我那篇还未完成的小说。我现在看见一片浮云，很像一架三角钢琴。[于是我心里就想：应该在我一篇小说的什么地方，描写出一条像三角钢琴的流云在徘徊。][1]这里不是有金钱草的味道吗？我赶快就在我的记忆里归了类：香得叫人头晕的味道，一种寡妇们欣赏的花，要用在一个夏夜的描写里。我要抓住自己和您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尽快地记住，赶快把它们藏在我的文学贮藏库里：一旦有了机会就好去利用。我等工作一完，就急忙跑去看戏，或者去钓鱼，为的是在那上边找到一点点休息和遗忘——可是呀，没有，我脑海里已经又觉得有一颗沉重的炮弹——一个新题目在翻滚了。它已把我推到桌子跟前，应该赶急赶忙写呀，又不停地写起来了。永远是这个样子。我永远没有让自己安逸无忧，我觉得我是在吞噬自己的生命，是在把自己最美丽的花朵里的花粉一起用尽，在把我的花朵一齐采摘下来，并且践踏着花根，为了向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人，供奉一刹那的花蜜啊。难道我不

---

① 这句话原文无。根据焦菊隐译的《契诃夫戏剧集》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27 页补上，供参考。——译者注

是疯子吗？难道我的亲人和熟人也真的拿我当一个正常的人吗？‘你正在写什么玩意儿啦？你要给我点什么读读呀？’听见的永远、永远是同样的话。我觉得仿佛所有这些关切，这些称赞和这种崇拜，全都是谎言，都不过是像对付病人似的拿来哄骗我。我有时候真害怕呀，怕他们会偷偷地从我身后走来，一把抓住我，把我像波普里辛①一样送进疯人院去。”

为什么大家竟是这样？扔掉桨就可以开始另外一种生活。不行，除非天上掉下答案来。特里果林没有扔掉桨，也没有开始新的生活。在契诃夫这里只是年轻、极为年轻和阅历不深的人才谈到新生活。大家都幻想着给他们带来幸福、革新、光明、欢乐。他们轻率地腾飞，为火花而精力衰竭，就像无知的蝴蝶一样。在《海鸥》里是妮娜·扎烈奇娜娅和特里波列夫，在其他作品中则是其他主人公，都是男人、女人。大家都在寻找着什么，渴求着什么，然而大家却不在做应该做的事情。人人各自为家，完全专注于自己的生活，对他人的生活都漠不关心。契诃夫主人公的命运都异常奇怪：他们尽最大可能把自己的内在力量绷得紧紧的，然而却又得不到任何外在成果。他们都可怜巴巴。女人嗅着鼻烟，不修边幅，头发蓬乱，枯燥乏味。男人则易动肝火，啰嗦唠叨，酗酒胡闹，厌烦周围的人。他们不仅说话不合时宜，而且行为也不甚得体。他们不善于——我宁愿说他们不愿意使外部世界适应自己。物质和能量根据自己的规律相结合——人也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就好像物质和

---

① 波普里辛——果戈理《狂人日记》中的人物。——译者注

能量完全不存在一样。在这方面，契诃夫式的知识分子无论如何都不同于不识字的乡下人和半文盲的小市民。他们住在庄园里，就像住在山沟里，像住在乡村里一样。任何人也不会相信，改变了外部条件，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四处弥漫着一种尽管是不自觉、然而却是根深蒂固的信念：意志应当以与人类制度毫无共同之处为鹄的。更坏的是，制度似乎是意志的敌人和人类的敌人。应该去毁坏、不断谴责、消灭、推翻它。平心静气地去深思熟虑，去预见未来，这是不可能的！应当用头去撞墙，没完没了地撞。这会得到什么？会有什么结果吗？这是终结还是开端呢？在这一超人创作的新处女地里可以看到，创作源自虚无吗？“我不知道”，老教授曾经这样回答痛哭的卡嘉。我不知道——这是契诃夫在回答所有痛哭哀号和备受折磨的人们。论述契诃夫的文章可以用这些话，并且只能以这些话来作为结束。忍耐吧，我的心，愿你沉睡不醒。

二　先知之才

——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25周年

1

弗·索洛维约夫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先知，甚至称他为上帝的先知。其实，其他许多人也追随索洛维约夫之后，经常这样看待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是在他面前摆着一本打开的人类命运之书的人一样。这不只是发生在他死后，早在他生前就已经如此了。大概，即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不认为自己是先知（对于这一点他是极为明智的），那么无论如何，他会认为所有人都应把他看作是先知。《作家日记》的口吻和他在那里通常涉及的一些问题证实了这一点。作家日记开始于1873年，也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国外回来那年，即正值传记作者称之为他生命的“最光明”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有幸福的家庭、吃穿不愁的人，著名作家——《死屋手记》《白痴》《群魔》等一系列尽人皆知小说的作者。大概，一切所需要的，即可从生活中得到的东西，他都得到了。还记得托尔斯泰在《忏悔录》里的看法吗？好啦，我将像普希金、果戈理、歌德、莎士

比亚那样卓越出众，最后——“然后呢?”事实上，成为比莎士比亚更著名的作家是困难的——是的，假如如愿以偿，那么，这个无法逃避的问题——“以后究竟会怎么办?”——无论如何是不能消除的。著名作家的创作生涯中迟早会有一天不能进一步完善的。要在文学事业上比自己更卓越出众该怎么办？假如想要继续前进，就必须乐意或不乐意地改换门庭。大概，作家中的先知总是这样开始的。一般认为，先知比作家更伟大，可社会舆论也远非能推出天才。甚至像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疑心重重，试图永远怀疑一切的人——也不止一次地成为偏见的祭品。人们从他们那里期待先知之言，他们也迎合了人们的希望。陀思妥耶夫斯基比托尔斯泰更乐于这样做。但是，他们两人的预言都糟糕透顶：他们预言的是一回事，而结果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例如，托尔斯泰早就做出预言，人们会立刻觉醒起来，放弃其自相残杀的战争并开始像履行爱的福音戒律的真正基督教徒那样生活。托尔斯泰曾预言并鼓吹说，人们将最爱看他的书，但自己原来的习惯和趣味依然如故。托尔斯泰在最后十年内看到了一系列骇人听闻、残酷无情的战争。现在是我们当前的革命[1905]——武装暴民发动暴乱，建立的绞刑架，被射倒的人群和炸弹——这是远东将恶取代血腥战争的革命！

这就是托尔斯泰所诞生、生活、学习和预言过的国家，即俄罗斯，这里也是成千上万的人坚定不移地认为他是最伟大天才的地方！可托尔斯泰就连在自己家庭里，也不善于进行合意的变革：他

的一个儿子当军官，另一个在《新时代》从事写作，仿佛他是苏沃林[1]的儿子，而不是托尔斯泰的儿子……先知之才究竟在哪里？为什么像托尔斯泰这样的杰出人物什么也猜不中，在生活里却如此近视？"明天会有什么？"——明天我将创造奇迹，术士向古俄罗斯大公夸耀。大公却抽出宝剑，砍下了术士的头来作为回答，那些相信先知术士群情激动的人们，终于平静下来，四散离去。历史总是砍去先知先觉的脑袋，然而，人们仍在追求先知。信念不坚的人们寻求着知识，因为他们想要奇迹。难道预言的能力能证明创造奇迹的力量吗？可以预言日食和彗星，不过要知道，只有愚昧之人才认为这是奇迹。开化智慧的人则坚信，可能有预言的地方，恰恰没有奇迹，因为预言预示的可能性必须以严格的规律性为前提。可见，先知既不是最有宗教天赋的人，又不是想要统治世界和控制规律的人，也不是术士、巫师、艺术家、不安宁的天才，而是一贯遵循现实及其规律，使自己从事机械的计算工作的人。俾斯麦善于预言普鲁士和日耳曼的鼎盛，是的，不只是俾斯麦，就是对于平庸的德国政治家来说，也可以把一切简化成："德国，德国高于一切"(Deutschland，Deutschland über alles)，可能会预测今后许多年，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什么也不会预测到的。在这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比托尔斯泰更为明显，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常试图去猜谜：他日记的一半就是由没有实现的预言构成的。因此他先知之才的名声已彻底扫地。

---

① 苏沃林(1834—1912)，俄国新闻记者和出版者，《新时代》主编。——译者注

2

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是不妥当的，即在一篇纪念作家逝世25周年的文章中，我来追忆他的错误和过失。然而这种非难未必正确。著名人物的明显不足同其长处同样有代表性，同样重要。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俾斯麦，难道这有什么不好，难道应为此惋惜吗？此外，对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类的作家来说，他们的社会政治思想也根本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他们懂得，谁也不会听从他们。无论他们说了些什么，历史和政治生活反正一样，仍然走自己的路，因为他们的书和文章，并不能预言历史事件。或许，这就是他们见解中不同寻常的果敢精神的原因。假如托尔斯泰能够想在文章中要求“军人、警士、法官、部长”和一切其他如此憎恨的社会安宁的保护者（顺便说说，有谁喜欢他们呢！）被解除公职，使凶手和暴徒涌出监狱——有谁知道，他是否能坚定不移地确信，自己能承担所提措施的后果。然而他也确实知道，人们不会听从他，因此心安理得地去鼓吹无政府状态。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说教则起着完全另外的一种作用，可以说是一种柏拉图式的作用。大概，他自己也意料不到自己不是“理想的”政治家的歌手，而是赞美那些只有少数人支配人民命运的国家政府提出的现实任务。假如听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会想到，他去发明政府应当付之于领导和实施的思想。然而，只要您稍加注意就会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根本没有发明任何一种独创的政治思想。在这方面他所拥有的一切皆不加检查地借鉴自斯拉夫主义者，而斯拉夫主义者

的独创性也只是在于不借助外国人的帮助，把德文（Russland，Russland über alles）[1]和法文的翻译过来而已，甚至诗句的长度在改换一个词之后仍保持不变。不过，尤其重要的是，斯拉夫主义者与其俄-德分子赞颂民族性，随声附和他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教给执政者任何东西。我们的政府懂得它应当知道的一切，无须借助斯拉夫主义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它走的正是自远古以来就由其理论家如痴如醉地赞颂的道路。这些理论家只能赞美执政者，捍卫俄国国家政策，反对敌对情绪的社会舆论。专制制度，东正教，民族性——这一切在俄国极为根深蒂固，以至于在7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鼓吹时，根本不需支持。众所周知，政权任何时候都不对文学的支持寄予厚望。其实它要求诗神献上其贡品，光明正大地用语言编织出自己的要求：祝福宝剑和诗艺结成联盟。诗神也不需拒绝政权——有时真挚虔诚，有时就像作家海涅所描写的一样，因为在俄国，严寒中戴铁镣是极为痛苦的。然而，无论如何，诗神享有的只是歌颂宝剑的权力，而绝不是去指挥宝剑（尽管有各种联盟！）。这样，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桀骜不驯，也终究是在扮演俄国政府御用歌手的角色。就是说，他猜中了政权的秘密希望，然后，对此倾注自己的长年流放里得以积存起来的一切“美好而高雅”的语言。例如，政府对东方虎视眈眈（那时只是近东）——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加以证明，君士坦丁堡是我们必须的，并且做出预言，君士坦丁堡不久会在我们之手。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证据”纯属“道德性质”，因为他是作家。他说：只有从君士

---

① 意为：“俄国，俄国高于一切”

坦丁堡出发，我们才可能实现纯俄罗斯的全人类思想。不用说，虽然我们没有俾斯麦分子，我们的政府仍未很好地理解道德证据及建基其上的预言的价值，宁愿以一些训练有素的师团和优良的武器来取代它们。对于现实的政治家，一个军人不是一门大炮，就是旧式枪支，比一个最好的哲学——道德理论更起作用。然而，他们也毕竟不会驱逐顺从的歌手，如果歌手们明白自己处境的话。陀思妥耶夫斯基甘愿扮演这一角色，因为这种角色毕竟赋予他在与自由主义文学的斗争中表现自己任性执拗性格的可能。他赞颂、抗议、胡言乱语，甚至更糟。例如，他提出一切斯拉夫民族在俄罗斯的庇护下进行联盟，鼓吹只有这样它们的完全独立和文化自决权利等才能得到保障。生活在俄国的成千上万的斯拉夫-波兰人都面临着这一问题。还有：《莫斯科新闻》认为，假如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迁居土耳其就棒极了，因为到那时能够把俄罗斯人迁居到克里米亚半岛去。

陀思妥耶夫斯基欣喜若狂地抓住了这一独创的思想。他说，确实，按照政治、国家和其他相似的理由（我不知道其他人会怎样，不过当我听到，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嘴里说出这样的话，诸如“国家”、“政治”等等，我就忍俊不禁），必须赶走鞑靼人并由俄罗斯人占领它。如果《莫斯科新闻》策划这种办法——事情就好理解了。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那个自封为基督教徒，曾如此狂热地鼓吹对亲人的爱、自暴自弃和弃绝自我，也曾“教诲”什么俄罗斯应当“为各民族服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怎么会阿谀奉迎这种强盗思想？！其实，他的几乎所有政治思想都是富于强盗意味的：攫取、攫取、还是攫取……按照需要，他一会儿希望与日耳曼和睦相处，

一会儿又威胁它；一会儿证明英国需要我们，一会儿坚决地主张我们没有英国也能生存——这完全像是诚实无欺的省城报纸的评论员。在所有这些滑稽可笑但总是自相矛盾的论断里只会让人感受到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懂，根本不懂政治，而且对他说来，他同政治毫不相干。他被迫去追随其他同自己相比毫无价值的人，并乐此不疲。甚至自尊心——就某一点说，他曾有过一个硕大无比而唯一的自尊心，就像适合于全人类似的——对此也心安理得。主要问题是，人们从他那里期待预言，因为追逐伟大作家头衔的人就具有先知的头衔，深信不疑的语调和雷鸣般的嗓音就是先知天赋的特征。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善于雷鸣般地呐喊，善于以了解执政者秘密的口吻说话，他这是在地下室学会的。现在这一切都派上了用场。人们把现存秩序的御用歌手错认为灵魂的鼓舞者和俄罗斯远大前途的主宰者。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这一点就已足矣。这一点甚至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必须的。当然，他懂得，他并不是先知，但是他也明白，尘世间不存在先知，即便有过，也不比他具有更大的权力。

3

允许我提一下 Л. Н. 托尔斯泰给他儿子 Л. Л. 托尔斯泰的信，它不久前由后者公诸报纸。它似乎饶有趣味——还是不从人们应当解决日常问题的实际观点出发——从这个观点出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流毫无用处——不过要知道，应允许有各种各样的人无所事事。

就是现在，在我们所经历可怕时代——大概可以说就是现在，

比任何时候更可怕——不能只凭几份报纸就去幻想我们明天所面临的、令人惊骇的意外之事。在阅读报纸和政党纲领之间每一个人都会有余暇，尽管不是在事件喧嚷和日常工作分心的白天，而是在可以做的一切都已做完，一切应当说的都已说完的深夜。那时候，一些原来为“事情”所震颤的思想和问题就会不断飞驰而来。你会第一千次回到人类天才之谜和人类伟大之谜的问题上。天才究竟在哪些方面可能比通常之人懂得多呢？

托尔斯泰的那封信，在白天唤起的只是愤懑和激怒——事实上要知道，这难道不令人遗憾，难道不岂有此理。因为他在俄国彼此敌对力量的巨大冲突里，不善于区分正义和非正义并对一切正在进行斗争的人一概打上了无神论者标记！——似乎不是这样。我曾经说过，在白天这真是令人遗憾！白天想要托尔斯泰与我们站在一起并保护我们，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只是一些寻求真理、知道真理的人，而我们的敌人却包藏祸心，或者根据错误来捍卫罪恶和谎言。不过这只是在白天发生的事。在夜晚，事情就会是另一番模样。回想一下，就是歌德也疏忽了或者简直就没有发现伟大的法国革命。诚然，他是德国人，又远离巴黎。可托尔斯泰住在莫斯科附近，那儿在枪杀、砍杀、焚烧男人、妇女和孩子。他怎么竟然会疏忽了这些惊世骇俗之事？可是，他毫无疑问地疏忽了莫斯科和莫斯科附近所发生的一切。他不觉得所发生的事件是具有重大意义的、非同寻常的事件。对于他，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只是他，托尔斯泰把手按在什么上而已：在他之外并且不通过他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不存在的。这就是伟人的一种伟大特权。知道吗，有时我觉得——或许，我想在这一特权里最好有一种深不可测、秘而

不宣的意义。

我们无心去继续听那种没完没了的故事——这是关于既成的、骇人听闻的惨无人道的故事，等待我们的就是回忆托尔斯泰及其漠不关心，我们作为人无权为孩子复活被打死的父母，或为父母复活被打死的孩子。我们也无权向杀人犯复仇——况且复仇并不能弥补所有人的创伤。你能不按照逻辑去思考吗？你能为骇人听闻的事件去寻找正当的理由，可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理由。也许你会问，说不定托尔斯泰和歌德之所以没有看见革命并没有与之同甘共苦，是因为或许他们看到的是某种别的更为必须、更为重要的事情吗？要知道这是人类最伟大的灵魂！也许，事实上天堂和尘世里真有着一些就连我们博学多识的学者也不曾梦见的事物呢？……

现在可以回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思想"上来了，可以毫无顾虑地给予恰如其分的评述。因为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天才作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忘怀我们的迫切需要。日夜的权利各有所别。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要成为先知，想要人们听从他并跟随他大声喊"和散那"(Ocahha)[①]，我再重复一遍，因为他认为，假如人们在某时候对某人大声喊和散那，那么，他，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毫无理由拒绝对他的尊敬。——这就是他为什么在70年代扮演了基督教——甚至不是基督教，而是东正教传教者的新角色的原因所在。

我再次提醒大家注意那种远非偶然的情况，即他说教恰巧正

① 和散那，祈祷的呼声。——译者注

逢他一生中的最“光明时期”。过去无家可归的漂泊者，无处栖身的穷人安家立业了，甚至有了钱财(妻子的积蓄)。失意者变成了大名鼎鼎之人。苦役犯人也摇身一变而成了享有充分权利的市民。不久前，命运把他驱入地下室并可能永久禁锢于此，现在好像是从来也不是现实存在的陈旧不堪的幻影而已。在那儿，即在苦役和地下室里，诞生了并长久地存在对上帝的强烈渴求，在那儿，也有过伟大的生与死的斗争，在那儿，第一次产生了那些新颖而可怕的体验，这就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尘世间的一切慌乱失措和焦虑不安亲近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生命的晚年所写的著作(不仅是《作家日记》，而且有《卡拉马佐夫兄弟》)只是在反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过去这方面尚有价值。他没有再前进一步，在伟大真理的前夜他仍然故我。不过，以前他并不满足于此，他渴求的是继续前进，而现在他却不想斗争，不能对自己和别人解释他所做的一切。他继续伪装斗争，而且他好像最终胜利了似的，并且要求这一胜利为社会舆论所公认。他想认为，前夜已经过去，真正的白天就要来临。而喻示白天不会来临的苦役和地下室已不复存在，存在的只是假想胜利的依据。鼓唇弄舌地开始说教吧！陀思妥耶夫斯基抓住了东正教。为什么不抓住基督教？这是因为基督教不为那些有房屋、家庭、财产、荣耀和祖国的人。基督说过，扔掉一切，随我来吧。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害怕过孤独生活，他想要成为同时代安居乐业的人们的先知，对于这些人，正统的基督教因不适应文化和国家的存在条件而不适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莫斯科新闻》的计划数不胜数，诸如让基督教徒夺取君士坦丁堡，把鞑靼人从克里米亚迁出，把一切斯拉夫人搬迁到波兰人的居住地，等等。

这样，在承认《福音书》之前，必须对它进行解释……

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在文学中我们还未遇到任何一个完整地、不加解释地接受《福音书》的人。根据《福音书》，由谁来夺取君士坦丁堡，由谁来认可现行制度，谁可以抬高自己，贬低敌人呢？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有权对《圣经》断章取义或添油加醋。自然，我这里只是指那些至少在口头上承认《新约》中的上帝起源的人。因为那些把《福音书》只看成许多优秀书籍中的一本的人，有权对它做任何批评、改动。

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弗·索洛维约夫就是这样。我们之中有一种观点，尤其是最新批评支持和扩展的观点，认为托尔斯泰使基督教合理化，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索洛维约夫则把它作为完全神秘的东西加以接受，并未赋予理性在《福音书》里区分真理与谎言的权力。我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索洛维约夫害怕承认《福音书》是知识的源泉，相信理性本身和日常经验远甚于信仰基督教的话。假如我们之中有谁在某种程度上是贸然接受福音戒律的神秘而有害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列夫·托尔斯泰。下面我将做出解释。

人们告诉我们，托尔斯泰试图在其国外著作里用人类理智能接受的方式来解释福音的奇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索洛维约夫[①]却乐于信仰无法解释的东西。不过，福音的奇迹通常只吸引最不信仰的人们。因为重演奇迹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所以外在的信念就足矣，也就是一个口头上的证明就足矣。人们会说，相信奇迹

① 在其著作《战争与基督教》中。

是为自己和他人树立信宗教的声望。但《福音书》的其他部分仍需“注释”。例如，关于勿抗恶。毋需赘言，关于勿抗恶学说是最可怕的，同时也是我们在《福音》里看到的一切中最非理性和最莫名其妙的。我们一切有理性的人，一想到把充分的物质自由遗留给恶棍实施恶毒之事，就感到愤恨不已。怎么允许强盗在你面前杀死无辜的孩子竟不拔刀相救?！谁有权利，谁能禁止这种愤怒的使命？索洛维约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重复了这一点，一个在同托尔斯泰的秘密论战中，另一个是在同托尔斯泰的公开论战中。因为《福音书》里毕竟直接说的是“勿抗恶”，那么相信奇迹的他们两人，突然想起了理性并寻求其作证，他们知道理性当然能推翻圣训中的任何意义。换言之，他们重复着怀疑基督的犹太人所说的话：他是什么人，作为有权的人，他说了些什么？上帝责成亚伯拉罕送来自己儿子作为祭品。亚伯拉罕尽管他的理性——人类的理性拒绝承认残酷命令里的明显意思，但仍然准备根据上帝的话行事，并不试图以圆滑的注释来解除自己沉重而又非人的义务。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索洛维约夫，一旦基督的要求没有得到他们理性的证明，就拒绝执行它们。却没谈相信拉撒路[①]的复活，相信治愈麻痹病患者，相信圣徒所讲述的一切其他东西。为什么他们的信念却恰好结束在信念开始要求的地方呢？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需要理性？而我们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求助《福音书》，正是为了摆脱理性的支配，不过，那是在地下室时期，而现在却发生在他一

① 拉撒路是《圣经·新约》中的一个满身为疮的乞丐。他是耶稣的朋友和学生，死后第四天耶稣使之复活。——译者注

生中的光明时期。索洛维约夫从来也不会清楚地了解地下室。只有托尔斯泰勇敢而坚定不移地不只是在思想里，而且某种程度上也是在生活里来试图体验基督教学说的真实性，从人类的观点看，勿抗恶就是疯狂，对此他十分清楚，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及其人数众多的一切其他论敌。不过，在《福音书》里他正好寻找宗教的疯狂——因为人类理性不能使他如愿以偿。托尔斯泰开始追随《福音书》是在自己一生的绝非光明时期，即当伊凡·伊里奇[①]和波兹德尼索夫[②]的形象萦迴在他脑际之时。那时他对奇迹的信念是抽象的、脱离生活的、微不足道的。应该为信念奉献一切，即便你有最宝贵的儿子作为牺牲品。他究竟是什么人，作为有权的人，他说了些什么？现在不能验证，他果真复活了拉撒路，并用不多的面包解除了成千上万人的饥饿。然而，毫不犹豫地执行他的戒律，就可以探明他是否给了我们真理……托尔斯泰就是如此，他求助于基督教的唯一而又真正的源泉——《福音书》。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诉之于斯拉夫主义者及其宗教国家学说。只是东正教，而不是天主教，不是路德新教，甚至也不是简朴的基督教。接着就是独创的思想：俄国，俄国高于一切（Russland，Russland über alles）。托尔斯泰不善于预言在历史里的任何事情，不过要知道，他几乎从不明显地干预历史生活。对于他，我们的现实是不存在的：他全神贯注于上帝指定给亚伯拉罕的谜。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伊凡·伊里奇是托尔斯泰晚期作品《伊凡·伊里奇之死》的主人公。——译者注

② 波兹德尼索夫是托尔斯泰晚期作品《克莱采奏鸣曲》的主人公。——译者注

却无论如何要预言，不断地预言，却不断地出错误。我们没有占领君士坦丁堡，斯拉夫人也并未联合，甚至鞑靼人至今还生活在克里米亚。他恐吓我们说，欧洲由于阶级斗争而血流成河，而在我们这里，多亏了我们俄罗斯的全人类思想，不仅和平地解决了我们的内部问题，而且还将出现崭新、空前未有的语言，我们可以用这种语言去拯救不幸的欧洲。25年过去了。欧洲暂时还太平无事。而我们却已不知所措，这是在血泊中的真正的不知所措。在我们这里，不仅是压迫非俄罗斯人、斯拉夫人和非斯拉夫人，而且折磨我们自己的饥寒交迫的不幸兄弟、完全不懂什么的俄罗斯平民百姓。在俄国的中心莫斯科，许多妇女、孩子和老人遭到枪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纪念普希金的演说里所预言的俄罗斯的全人类究竟在哪里？爱在何处？基督教的戒律又在哪里？我们只看到一个"国家组织"，西方人民由于它而战斗——不过，不像我们这样使用残酷无情和反文化的手段。俄罗斯又一次不得不向西方学习，就像曾经不止一次地学习一样……可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果不是试图预言的话，就会好多了。

其实，即使他做了预言，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现在我衷心感到高兴的是，他在生命的最后脱离了自己的苦役生活而休养生息。我深信，即使他直到自己的最终之日还待在地下室的话，他也不能解决那些曾经使他焦虑不安的问题。人无论怎样全心倾注于自己的事业，他仍然是停留在真理的"前夜"，并且也不能找到他所必需的谜底。人类的规律就是这样，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预言也不会带来危害。只有那些会向君士坦丁堡进军，摧残波兰人并且制造平民百姓的灵魂急需的苦难忧患的人，才会听从他。如果陀思妥

耶夫斯基赞许他们，那么实际上这完全不会给他们增添任何东西。他们不需要文学的赞许，因为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不是本本，而是武力和谎言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根本作用……

陀思妥耶夫斯基讲述的一切，都是在自己的小说里讲述的。这些小说在他逝世 27 年之后，仍然吸引着所有那些需要从他的生命里探究秘密的人。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追逐先知这一官衔，并认为自己有权拥有它，但它绝不适宜于他。俾斯麦们常常是先知，他们也常是大臣首相，也就是乡村里的第一等人，罗马的第一等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注定永远只有“前夜”吗?! 我们得重新试着鄙视逻辑，也许，这一次不仅要鄙视逻辑，而且要说:就让它这样吧……

三　愚蠢颂

——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1]的《在永恒的观念之下》一书

“我还想拥有你的玉体，
它是那样年轻、那样娇柔，
你的灵魂尽可埋葬，
有了我的灵魂就已足够。”
——亨·海涅

1

我不是嘲弄——像著名的伊拉斯谟[2]早先这样做的一样，而是真挚地衷心开始说自己赞美愚蠢的话。在这一点上，别尔嘉耶夫的新书在许多方面帮助了我。也可以说，他会称呼这本书——

---

① 尼古拉·别尔嘉耶夫（1874—1948），俄国宗教哲学家，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新康德主义结合，后来又从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转向寻神说，转向宗教生存主义和人格主义来解释个性哲学和自由哲学，转向基督的末世论，1922 年被驱逐出境，创办了宗教哲学杂志《路标》。——译者注

② 伊拉斯谟（Erasmus Roterodamusl，1469—1536），尼德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语文学家、作家，写有讽刺作品《愚人颂》，嘲讽他所处时代的社会风习和弊端。——译者注

像自己早已过世的同人那样——赞美愚蠢，因为它的使命是召唤健全理性。确实，此书收集了他近六年的文章，因而说实在的，不可能没有完全统一的课题。六年是个不短的时期，不仅像别尔嘉耶夫这样的作者，而且所有其他作者在如此长的时间内也会有或多或少的变化。第一篇文章是早已写完的《为唯心主义而奋斗》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仍然还严格坚持康德的观点，众所周知，这个观点认为应有健全理性和与之形影不离的一切美德。随后作者逐步发展，直至书末已经公开对健全理性宣战，但与它相对立的，不是愚蠢，正如通常所做的，而是大智。当然，可以这样表达，可以称愚蠢为大智；也可以说，这里有其深奥的意义，确切些说，是极为恶毒的。因为，对于健全理性来说，还有什么能比授予愚蠢——大智的光荣尊号更令人难堪和更侮辱人的吗？要知道，迄今为止健全的理性被认为是一切理性（包括大大小小）最亲近的朋友和父亲。现在别尔嘉耶夫竟然鄙视历史形成的繁复的家谱徽章，起来"反对健全理性"，也就是雄踞在大智之上的愚蠢。毫无疑问，这是极大的粗鲁无礼，但是，别尔嘉耶夫——多半是敢作敢为的作家，按我的看法，他在这一点上有最好的品质。我会说，在他的粗鲁无礼之中有其才干、哲学和文学天赋。一旦粗鲁无礼离开他，他的灵感源泉就干枯，他也就哑口无言了，也不再是自己。不过，以上我先说了几句。现在我们还是回溯他的发展，即回溯他的思想发展。

我已经指出，别尔嘉耶夫像一切思维之人一样，在六年内多次改变了自己的信仰或思想。当然，改变的是哲学。他的政治观点却无比的稳定和恒常。他曾经并仍然是民主主义者，甚至好像是

社会主义者，这的确不同寻常。为什么人们改变自己的哲学信仰比改变政治信仰容易得多？在其他像别尔嘉耶夫一样完成由马克思主义经唯心主义到神秘主义甚而到地道宗教的发展的其他作者那里，也会看到政治信仰的这种相对稳定性。就以布尔加科夫[1]为例吧。假如他在政治信仰的变更上也表现出这样神速，那么他现在就或是黑帮分子中的一员，或是与盲目冒进者为伍，即在政治立场的某个边缘之处。然而，像别尔嘉耶夫一样，过去和现在仍然不是民主主义者，就是社会主义者。确实，他已经不崇拜马克思了——但这也只是在理论方面。他在实际问题上始终忠实于自己，因而大众的印象里存在着东正教和反动分子之间密不可分的思想联系（nexus idearum），今后应当最终会认为它是支离破碎的[2]。现在布尔加科夫有许多门徒，甚至在青年中他们与其导师一起热衷于东正教教会，但对无论是手持树条抽打的地方长官，还是战地法庭，抑或部长的无限之权，都毕竟不会赞颂。人们在坚定和顽固的政治态度里具有的哲学信仰却变幻无穷，这究竟作何解释？显而易见，不能用性格来解释。因为人不能同时具有坚定不移和反复无常的性格。

暂时先不回答这个问题，请读者注意别尔嘉耶夫（还有布尔加科夫）思想发展的其他特点。他一旦为了新思想离弃了某个旧思

---

① 谢·尼·布尔加科夫（1871—1944），俄国经济学家、宗教哲学家、神学家。——译者注

② 参见布尔加科夫不久前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简明纲要》一书。在书中表达了一个真正自由主义的观点，它丝毫也不逊于其他自由主义的观点。在通常的政治经济学中，人道的观点（关于农奴制、后宫、放高利贷、剥削工人等等的可恨）建筑于道德之上，布尔加科夫却建基于宗教之上。全部差别就在这里。

想，他就会发现在自己过去的思想宝库中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注意。一切都是陈旧不堪、腐朽衰败的，都毫无用处。例如经济唯物主义。别尔嘉耶夫曾经有一个时期（在他的第一本书中）非常欣赏它。确实，不是它的纯形式，而是它与康德学说的杂交，并且认为一切真理就在这里。可现在他已经不再认为其中有任何真理。我提个问题：这种疯狂的滥用为哲学家所允许吗？后来，当必须毫不耽搁地重新脱离并抛弃康德老翁时，别尔嘉耶夫把一切都弃置不顾，也并未捡起任何东西，就好像所有的行李都会重压在身，轻装上阵才能驰向形而上学一样。他预先就坚信不疑，可以在那里发现一群肥壮的牲口，辽阔的田野——一句话，人为了生活糊口所需要的一切。然后，就又扔开形而上学，一拥而入宗教启示的深奥之处。在《生命问题》一书里，读者面前展开的是，别尔嘉耶夫从形而上学转入信仰基督教的历史。尤其令人惊异的是他转变的突发性。这对于别尔嘉耶夫也过于急速了。他在没有学会明确说出信念象征的一切劝说前，就成了基督教徒。蜕变明显发生在意识阀限之内。在其《论新宗教意识》一文里，他第一次开始说到基督、神人、人神，等等。他语不成句，结结巴巴，一句话，表现了陷于异己和陌生的处境时的一切特征。在那里，他不得不侥幸地试探着移动。顺便说说，应该指出一个令人惊异的事实，即我们的所有作家都通过发展来到了基督教，因此无论如何也没有学会真正使用神圣的语言。就连梅列日科夫斯基[①]已经从事神学主题多年，至今

---

① 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1866—1941)，俄国作家。有长篇小说《基督和反基督》，学术著作《л·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诗歌、评论等。——译者注

也没有任何精湛造诣，尽管他有无可争辩的文学天赋，言语不伦不类。这就像成人学会了一种新的语言，你总会认出他是外国人。布尔加科夫也一样。他独出心裁地解决了困难的任务，并从第一批文章起，就以说马克思的话语的语调开始申斥基督。尽管其以语调纯朴和自然见长，(因为它毫无改变)，但布尔加科夫依然如故，仍不能瞒过仔细的耳朵。在这方面，罗扎诺夫[1]远远超越了他们所有人，尽管众所周知，他既不信仰基督又不承认《福音书》。但他从童年就受宗教法规的熏陶，从不迷恋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保持着自己的纯真。我想，无论是梅列日科夫斯基，还是布尔加科夫，或是别尔嘉耶夫，任何时候也不能与罗扎诺夫相比。显然，布尔加科夫也感受到这一点，并从宗教探寻过渡到教会问题和教会政治。在这里，他也许适得其所。政治和社会制度问题是一件古老、而切身、本行的事情。

由上所述可以得出许多结论……首先，从前思想发展是如此艰难，并极为迟缓，而现在进行得如此容易和迅速，完全没有标志内部的深刻变化。当布尔加科夫还是马克思主义者时，就是像现在一样的出色之人。别尔嘉耶夫是康德派哲学家，还是形而上学者，梅列日科夫斯基是尼采主义者还是基督教徒，这没有内在的差别。披上袈裟并不就是和尚(Cuculus non facit monachum)。总之，当老头们认为，必须仔细地保护哲学思想，避免发锈生苔，始终把它放在干燥的地方就是变质，他们都错了。政治信仰则是另一回事。政治中，若改变了信仰，那就是变换敌友，去枪杀昨日还在

---

① 瓦·罗扎诺夫(1856—1919)，俄国著名思想家。——译者注

用胸膛保护自己的人吧，反之亦然。这就是思考。那么，从康德派哲学家转变为黑格尔派哲学家，转变为唯物主义者，难道这对谁也毫无影响吗(horribile dictu)？我不认为一个熟悉几个哲学体系的人，有任何理由必须从一个体系发展到另一个体系。可能他见风使舵时而信服这一体系，时而信服那一体系，甚至一天之间变更二三次。早上还是坚定不移的黑格尔主义者，白天已坚定地保卫柏拉图，而晚上……晚上已信仰斯宾诺莎，这样的变换似乎是我们的创造出来的自然(natura naturata)。困难只是在于心甘情愿地同意，美德不应该有任何奖赏。这是应该的真的甚至非常应该。但是既然上帝或是自然或是实体(Deus sive natura sive substantia)是如此安排，也就丝毫不能改变自己的天性，那么就毫无办法，不得不顺从，并尽力满足于在永恒的观念之下(sub specie aeternitatis)的世界观。

2

不过，别尔嘉耶夫虽然借用了斯宾诺莎的话作为自己的书的标题，但绝没有立足于斯宾诺莎的观点上，我现在(虽然现在是晚上，确切些说是深夜)也更迷恋于斯宾诺莎。我们两人有一共同点。我们都憎恨一切理性(ratio)并且反对它们——不过，别尔嘉耶夫用的是**大智**，而我用的是**愚蠢**。显然，我可以不为自己的术语做辩护。说实话，这样更好，因为我还没有辩护的论据，我没有任何特别的理由。我根本不喜欢像大智、形而上学、超感觉、神秘主义这样的大字眼。如果这是缺点——那么宽容的读者大概会原谅的。何况，本文不准备涉及大字眼。与我相反，别尔嘉耶夫非常欣

赏它们，在他的书之引文中可以屡见不鲜。因此，我们来看一看别尔嘉耶夫本人在**愚蠢**一词（以大写字母写**愚蠢**是按别尔嘉耶夫的惯例，**大智**这样写也是如此）里能干些什么并说些什么。《反动浪漫主义哲学家 K. 列昂季耶夫》[①]一文是他在这方面及其他方面最出色的文章。对列昂季耶夫，我们从未听说过，而知道他的人可以三言二语概括之：《莫斯科新闻》和《俄罗斯通报》的撰稿人——因而是反动分子。其实，别尔嘉耶夫在自己文章扉页上的题词的引语中就可以立刻看到，我们是在同与众不同的、卓越的人打交道，让你们自己去判断吧！列昂季耶夫说："认为摩西[②]进入了西奈，希腊人建起了自己优雅的卫城，罗马人在进行布匿战争[③]，天生美男子亚历山大戴上某种首领权标的头盔来到格拉尼库斯河[④]，并在阿拉别尔城下奋战，圣徒在布道，蒙难者在受苦，诗人在吟诵，画家在素描，豪杰在竞技场上大显身手，只是为了使法国、德国或者俄国资产阶级穿着自己不成样子和滑稽可笑的衣服，单个人或群体地悠闲自在踱步于这一切过去伟大的遗址上，这不令人畏惧，不令人遗憾吗？"还有"应该冰冻一下俄罗斯，以便不让她腐烂。"我们根据上引之言立刻可以见到，这是勇敢无畏、别具一格、独立自主

---

① 康·尼·列昂季耶夫（1831—1891），俄国作家、政论家、文学批评家。——译者注

② 摩西是《圣经·旧约》中古代埃及人的首领，先知，利未部落人，亚伦的弟弟。后来他在西奈山上受十诫，并颁布犹太教的教义。——译者注

③ 公元前264—前146年间，罗马人与迦太基人因争夺地中海霸权而发生的几次战争。——译者注

④ 土耳其科贾巴什河的古希腊名称。公元前344年，马其顿亚历山大在此战胜波斯军队后，开始征服波斯帝国。——译者注

的精神。还有一例:“运动之后的静寂时代,严峻守纪之后的淫逸放荡时代,都正好与某种审美相宜;与艺术家相应的是奴隶制统治之下的自由主义,根据倾向他应该是带有蛊惑煽动的贵族,带有假仁假义伪君子的一点点自由的思想家(libre penseur)(‘一点点’大概是为了书刊检查机关和编辑),带有无神论的笃信宗教者”。当今,在从前的内部检查官几乎完全被取缔之后,这类直言不讳也极少见到。为俄国读者揭示了列昂季耶夫并满怀欣喜和崇敬之情发现了他思想的独立自主性的别尔嘉耶夫本人,归根到底使他的见解遭到教条式的批评。传说和传统笼罩着他,列昂季耶夫的榜样,尽管十分迷人,但似乎仍过于冒险了。因此无论是在这篇文章里,还是在其他文章中,他总是表现了奇怪的两重性。他极为同情列昂季耶夫,为他灵魂的强大自由、他思维的深刻和机智而高兴,然而智慧,莫如说智慧们,即小的、中等的和大的,都以自己的绝对命令反对不幸的心灵。“你在自己的见解里不应当重视任何东西,除了唯一和永恒的真理”,他们发号施令,大喊大叫。不久前,别尔嘉耶夫和列昂季耶夫一起充分享受了与轻举妄动、想入非非而又优雅精致和令人神往的**愚蠢**交往的美好时刻,又顺从地回到自己的位置,既弃绝了自己,又弃绝了列昂季耶夫。开篇精美的文章却不可思议地结束于**愚蠢**和健全理性间的缔结和约的草案之中,这个和约的全部好处都在健全理性一边。别尔嘉耶夫无论如何也不能彻底相信,**愚蠢**具有合法权利,不应受到检查或是限制。毋庸置疑,**愚蠢**美妙无比,而健全理性就像一个惯于虚情假意的伪君子至死都令人厌烦和郁闷。不过,终究仍须服从它,而列昂季耶夫也应当驯服。别尔嘉耶夫的几乎所有文章都是按照论述列昂季耶夫的

文章的计划写成的。这里是否有综合(最确切地说,是综合),或者是什么别的东西——我也说不准。通常,别尔嘉耶夫一开始就抨击健全理性,呐喊着,咒骂它,诋毁着,践踏着。完全不习惯于这种态度的(我觉得,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作家也不会像别尔嘉耶夫这样如此傲慢并蔑视地与健全理性交谈)、可怜巴巴的健全理性战战兢兢,惊慌失措,吓得不知道为自己辩护。它不能忍受对自己的这种态度。迄今为止当人们与**愚蠢**对话时,通常是呐喊和跺脚。然而在文章的结尾处,别尔嘉耶夫必定温和下来,并还给健全理性,如果不是全部,那至少也是部分历史地承认它的权利。因而他的书对于各种不同趣味的人们或许都会有趣和有益。谁倾心于健全理性,他就会更注意文章的末尾;谁喜欢**愚蠢**,那就让他主要去看开端,谁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遗憾。正如我已经承认过的,我更喜欢**愚蠢**。也许并非我坚信它最终会战胜健全理性。我还没有这样的信念。不过要知道,有时也会允许把生活理想化,也就是说,既相信不存在的东西,又不相信存在的东西,甚至还有唯心主义的哲学流派。许多人经常一贯地深信非现存的东西,从来也不相信现实。我有时竟甘愿迷误,并以真正的喜悦反复阅读了别尔嘉耶夫之书的表现他自己或者他人的**愚蠢**所陷之处的那些地方,虽然他们成千上百次反对一切显明性和自明性,却仍然相信它们。例如他说:“神秘主义的实在论不是引向静态的教条主义,而是引向永恒运动、无穷创造、领悟和变化的、动态的教条主义(重点为我所加)。富于活力的、真实的神秘主义总是应当启示什么,肯定什么,应当进行实验,叙述所体验到的和所见所闻,它是为运动而教条的,为了使运动现实地存在,为了在运动里发生些什么。”也就是非教条

主义的教条主义或者教条主义的非教条主义，就是所谓对立矛盾的形容法（Contradictio in adjecto）：动的静，木的铁，等等。我要问一下，还有什么样的作家具有大无畏精神敢于如此公开反对逻辑规律，如此不甚关心逻辑（也就是那一健全理性）?！而这已在书的开首即绪论中谈到！我只是觉得非常遗憾，因为别尔嘉耶夫对于读者使用如此之多的生僻外国术语。因此，他话语的意思对于大多数人才隐晦难解。看来，一定有许多读者对上引片断一掠而过，完全不重视它们。人们会想，这才是通常的渊博学识，它难于理解正是因为它严格遵循逻辑，唯恐违反矛盾律。现在，我从后记中摘录片段："任何科学也不能证明，世界上不可能出现奇迹，即基督不会复活，实验不可能揭示神灵的天性——这一切都超乎科学之外。科学没有任何肯定这方面的语言，也没有任何否定的语言。真正的科学仅仅会说：按照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和其他学科所揭示的自然规律，基督不会复活。不过只在这一点上它与宗教相符，因为宗教也认为基督复活不是按照自然规律，而是克服必然性、战胜潜在的规律。基督的复活是隐蔽的神秘事实，我们只有在宗教生活中去适应它。"或许假设科学不这样说，但我们现在不拟谈论科学。别尔嘉耶夫得到的结论是：自然规律既存在又不存在。因为奇迹不仅可能，而且甚至在人们眼皮底下现实地出现。别尔嘉耶夫只是提到了基督的复活、拉撒路的复活，盲人和麻痹患者的治愈，而五千人群会以两个面包和五条鱼所饱足呢？如此等等。对这一切的了解同对基督复活的了解应同出一源。可见，违反自然规律曾是如此普通的现象，就像在现今时代它们不可违反一样。因此，或者自然规律不能违反的自然科学原理，违反逻辑的与对立

的原理——自然规律也许会与违反相并存，或者这种科学原理就是虚假的。这一结论令我觉得特别珍惜，同样也为别尔嘉耶夫所珍惜。他把它表达成下面的话："或许，逻辑规律钳制着我们，这仅仅是存在的病态和存在本身的瑕疵。"为什么只是"或许"呢？简直就是教义：逻辑规律就只是存在的病态，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因为逻辑对于我们是非必然的，那么所以，自然规律同时既存在又不存在。这样也许更好。

自然规律既存在又不存在的思想第一次出现了，它贯穿于别尔嘉耶夫一书的整个后半部，并极其鲜明地表现在献给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论新宗教意识》一文中。

大概，他的这个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影响。看来，别尔嘉耶夫认为自己的许多东西都应归功于梅列日科夫斯基，他并没有掩饰这一点。他认为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主题是天才的，并且不仅学会了它，而且还喜欢上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语言和表达他用大写"H"来写"位格"（hypostasis）一词。别尔嘉耶夫说道："梅列日科夫斯基懂得，要走出宗教的两重性，走出对立的二极——天堂和尘世、灵魂和肉体，多神教的迷人世界和基督教的弃绝世界，这一出路不是在二者之中，而是在第三方面，即第三者。他对于现代宗教发展的巨大功绩和伟大意义也就在此。他的痛苦也就是我们的痛苦。在混淆不清的永恒危险中，在基督和非基督双重面目的暗中偷摸中，在总是恐惧人们不崇拜真正的上帝中，他拒绝了神灵多面孔中的一副，多极中的一极，这不是反对上帝，而只是一种对立，同样也是宗教意识的神灵之极。"无论是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见解，还是别尔嘉耶夫的见解，我个人都不赞同。我甚

至不认为这种关于天堂和尘世的问题会有多大意思。我发现，主要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儿借用了问题的提法和解决的梅列日科夫斯基，是错误地理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个观点。由此可见，人类的根本问题绝不是道德问题。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在这一方面不甚明确，并可能有各种不同解释的话，那么，这只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像所有说新语言干新事业的一切人一样，只是不善于也不敢于永远保持自己的本色。他使用的是众多的陈旧之词。由于旧词比新语更清楚明白，那么也就掌握了旧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学是他所接受的现成遗产。因而梅列日科夫斯基实质上是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聪明，才获得了他之前保存在欧洲文化的古老宝库中的财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东西，梅列日科夫斯基只承认了一丁点儿，然后就置诸脑后。别尔嘉耶夫在这一点上仿效了梅列日科夫斯基。的确，别尔嘉耶夫不总是也不完全同意梅列日科夫斯基，常常与之争论不休，有时甚至对他做出不公正的责难。例如，他说："他（梅列日科夫斯基）常常缺乏创造形象的艺术才干，缺乏创造哲学概念的思维才干。"假如我正确地理解了别尔嘉耶夫，那么在这些话里，他说出了有关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普遍意见。大家谈论梅列日科夫斯基（也就是谈论明斯基[①]），说他是冷漠无情的领头作家。也就是说，大家想要让梅列日科夫斯基和明斯基在谈谈十字架的苦难之前，自己先在十字架上吊一会儿。否则，仿佛就不能

---

① 尼·马·明斯基（1855—1937），俄国象征派诗人，宗教神秘主义，哲学家、寻神派。——译者注

相信他们是博学多识之士。多么怪诞，多么粗野啊！为了新的形象、为了新的概念而自愿走向十字架！别尔嘉耶夫及其同类作家对此喋喋不休！

其实，我这只是顺便说说，但是无论是梅列日科夫斯基，还是明斯基，全都不会受诱惑。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要进行选择，那么与其让书的作者受苦受难，不如让书去受苦受难。后来，编制哲学概念所需的一切都可能用更简易而又极少冒险的方法获得。别尔嘉耶夫本人写过梅列日科夫斯基："他认为，生活及其意义在于希腊悲剧，在于多神教的神祇之死和基督教的上帝之生，在于文艺复兴时代及其伟大艺术，在于古代神灵的复活，在于背教者尤利安①和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神秘莫测的个性，在于彼得大帝、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梅列日科夫斯基富有这种浪漫主义的特征——极为厌恶现代生活的狭窄范围，并虔敬地尊重世界过去的广阔领域。梅列日科夫斯基体验了昔时伟大的时代，想要识透某种秘密，展示像尤利安、列奥纳多和彼得一样巨人的心灵，因为他觉得他们的秘密是全宇宙共有的。这一切都是对的，梅列日科夫斯基确实是博览群书的人，并在自己的事业中灌注了艰辛的劳动和精力。然而关于灵魂和肉体、天堂和尘世的问题，像梅列日科夫斯基提出并解答了它的那样，绝不是极为重要的问题。也不应当产生极度的紧张，写了并看了如此之多的

① 背教者尤利安(Julianus Apostats, 331—363)，自361年起为罗马皇帝，受过基督教教育，成为皇帝后，宣布拥护多神教，在新柏拉图的基础上对多神教进行改革，发布反对基督教的敕令。基督教会为他取了"背教者"的绰号。——译者注

书，以便证实肉体和灵魂、天堂和尘世的神圣性。因为即使成功地证明以后，即按别尔嘉耶夫的说法，像梅列日科夫斯基那样证明之后，主要根本问题始终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灵魂是神圣的，肉体也是神圣的，——然而从哪儿可以保证我们阐明的东西在永恒面前也同样神圣？如果那个毕其一生都在寻求永恒的斯宾诺莎是对的，既是一个说上帝或是自然或是实体（Deus sive natura sive substantia）的人，又是一个无论美德、罪恶，无论高兴、痛苦，还是神圣性、恶劣性，都茫然不懂的人，一句话，超出人类目的之外——假如他这个神是生命的基础和源泉的话，会怎样呢？假如在永恒的观念之下（sub specie aeternitatis）洞察生命，就意味着像不幸的荷兰隐士一样看待生活呢？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一题目谈得够多了。

3

别尔嘉耶夫从来也没有给自己提出并且也不想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他的根本前提（甚至不是前提，而是某种更为经久不变的东西，正像在本文下面所见到的）、推测的出发点：即他总能得到他所必需的东西。他多次谈到自己的怀疑，也谈到他是怎样克服自己的怀疑。不过，他全书通篇都在说，他的怀疑从来也不能使他心灵深处坚如磐石的信念移动一步。他犹豫不定，究竟谁对，是费希特还是黑格尔，是康德还是马克思，是米哈伊洛夫斯基还是梅列日科夫斯基。但是他也总是深信不疑：无论公正的结果是在谁手，它终究会具有镇静的并符合人类愿望的性质。在这方面他保持着俄罗

斯文学中的古老悲剧。在“H. K. 米哈依洛夫斯基和 Ъ. H. 契切林”[①]一文中他写道：“我们知识分子历史中的整整一个时代与米哈伊洛夫斯基的逝世一起好像从舞台上消失了，这使我们失去了回忆起来备感亲切的我们的本质和我们知识分子天性的宝贵部分。每一个俄国知识分子都应当切身体验这种死，都应当在 H. K. 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墓前对自己过去的历史和对未来的义务做一番反思。早先，我们的所有青年迷恋于米哈伊洛夫斯基的著作，他唤醒了我们青年的思想，提出了问题，指引我们觉醒了的对社会真理渴求的方向。后来我们就离开了我们的启蒙老师，超越了他，不过我们迄今为止仍然在努力于他所提出的使哲学和生活紧密接近的问题。这一点是非常典型的：米哈依洛夫斯基就解决各种不同问题的方式和哲学不够博学方面来说，从来不是哲学家，但是他整个一生忧心忡忡的正是哲学问题，他的意识中已经开始反对实证主义的局限性。在这一点上，他是充满哲学思想、并与哲学流派无缘、但又受实证主义偏见束缚的典型的俄国知识分子。我们过去热爱并且现在仍然热爱米哈伊洛夫斯基的精神渴求，因为这种渴求是如此鲜明地把俄国知识界与欧洲知识界的庸俗习气区别开来。”我想，别尔嘉耶夫和其他同时代俄国作家（所有那群决定《唯心主义问题》和《生活问题》的调子和方向的人）与米哈伊洛夫斯基的精神联系和亲缘关系要紧密得多，牢固得多。米哈伊洛夫斯基不懂德国哲学，他把超验与先验混为一谈。他不喜欢形而上学。

---

① Ъ. H. 契切林（1828—1904），俄国法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著有《回忆录》四卷。——译者注

这当然就会如此。不过要知道，这确实是兴趣问题，在其他情况下，90 年代的一代绝无必要反对原来的导师。大概“我们超越了他”的话很不合适。正是在年龄上，年轻作家不能超过米哈伊洛夫斯基，他们开始研究欧洲文化，研究柏拉图，迷恋于列奥纳多-达·芬奇、波提切利[①]，注视着神圣的写作，不过，他们的事业和意图上的一切都铭刻着青春、年轻的信念。这就是任何风暴和怀疑也不能够移动一步的磐石——它存在于米哈伊洛夫斯基之中，也存在于别尔嘉耶夫和他的所有文学同事之中。假如别尔嘉耶夫想要充分表现自己与米哈伊洛夫斯基精神近似的意义和使命，那他就应该引证《米哈伊洛夫斯基全集》前言中的著名的一段文字。尽管它已人人皆知，但我引用它全然不是为了评述米哈伊洛夫斯基，而是别尔嘉耶夫。“每一次当‘真理’一词浮现于我的脑际时，我不能不赞叹它的令人惊叹的内在美。似乎任何一种欧洲语言都没有这样的词。看来，只有俄语中的真理和公正才可由同一个词表达，并好像融合为一个伟大整体。如此伟大意义的真理永远是我探寻的目的……我从来也不相信找不到这样一种观点，在这种观点之中真理和公正是齐心协力、相互补充的。”真理生存在世界上并与公正和睦相亲，换言之，存在着一种精神上的世界秩序，完全符合人类关于应当和不应当、适宜和不适宜的概念。在此，别尔嘉耶夫像米哈伊洛夫斯基一样，也像俄罗斯文学界的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先驱们一样，不满意唯心主义者的立场。众所周知，德国的唯心主义者在确立了有关应当的概念之后，就洗手不干了。这种应当在世界

① 波提切利(1445—1510)，意大利佛罗伦萨艺术派的画家。——译者注

上是否能实现,或者仅是始终活在他们的头脑里,这在他们看来是无所谓的。米哈伊洛夫斯基和步他们后尘的别尔嘉耶夫都不以这种形式的高谈阔论为满足。他们要的东西应当正在实现着,假如不是此时此刻在眼前,在尘世上,那么虽然晚一些和远一些,也一定会实现。事实上,我们可不是德国人,让任何一个人都去试一试吧!尽管是在一瞬间,尽管是从米哈伊洛夫斯基或者别尔嘉耶夫那里讨得一点点假定,即假定客观真理就是自成一体,而公正也是自成一体。我要预先说明,这是白白浪费时间。因此我要继续坚持,就像梅列日科夫斯基一样,别尔嘉耶夫和布尔加科夫只是误解,才认为自己是在继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业。当陀思妥耶夫斯基悬吊在十字架上,他怀疑起一切并且一直怀疑至终。他的小说由此而赢得以紧张性见长——然而他的"哲学概念"却失去了所谓综合所特有的全部魅力。不用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灵魂拷问之下弃绝了魅力,但由此完全不能得出结论,别尔嘉耶夫、梅列日科夫斯基或者布尔加科夫会吃混合着胆汁的醋。我只是想要确定事实,怀疑从未能动摇别尔嘉耶夫对美德必胜的坚如磐石的信念。在这方面他毫不逊色于米哈伊洛夫斯基,并超过了没有经受住考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不是心理学的猜测,而是事实。我从哪里得出来的——我不想说,但是为了使好疑的读者放心,我透露一点,得到它绝不是借助神秘的启示,而是借助于大家公认的经验。

尽管如此,别尔嘉耶夫(同米哈伊洛夫斯基相反)仍然对**愚蠢**怀有兴趣,这一情形使我觉得特别高兴。假如就连这些顽固不化、带着花岗岩脑袋的人们也厌烦了健全理性,虽然是为了排忧遣怀

开始寻求**愚蠢**的社会，但这意味着还能有所指望。确实，根据是不牢靠的。但是对现今时代来说，这就足矣。

4

法国人说真理产生于不同观点的交锋（Du choc des opinions jaillit la vérité），我不敢苟同。按我的看法，各种意见可以随便冲突，但这骗不了真理。真理极其聪明，大声喧哗不能把它轰出来，用再狡诈的计谋也抓不住它。各种意见冲撞的通常结果就是人们相互冲撞。不过，因为收在别尔嘉耶夫的书里（我评述的这本书）的《悲剧和日常性》一文是献给我的，那么，我认为自己有义务来回答他所提出的反驳。其实，与其说是我不得不反驳，还不如说是弄清了误会。别尔嘉耶夫在赞同我的意见时，就通常引用我的话并且以自己的理由充实了它们。在他想要争论时，他就不援引我的话，甚至也不是反驳我本人，而是变成反对某种哲学世界观。他认为我是这种哲学世界观的信徒，其原因我就不得而解了。根据我的《无根据颂》一书，他认为我是怀疑主义者，根据《悲剧的哲学》又认为我是悲观主义者，然后开始证明怀疑论和悲观主义是毫无关系的。顺便说说，其他评论家都把同样的过错归咎于我。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声明（要知道，没有必要在这里进行争论）。当我第一次荣幸地被称为怀疑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时，我简直是目瞪口呆。确实，我没有表示拥护现存的哲学体系，并嘲笑它们胜利时的自鸣得意。不过，先生们，难道这就是怀疑主义者吗？的确，我不认为我们的世界就是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确实，我觉得应该更好些。说实在话，我非常喜爱外部世界。我喜欢白昼、清晨、黄昏和

深夜。高耸的雪山和绿色苍茫的山谷十分迷人。而荒凉无人、山石峻峭的阿尔卑斯山脉多么美好啊！甚至冬天的暴风雪和绵绵不尽的秋雨都可爱迷人！……一句话，我喜爱外部世界的一切或者几乎一切（我现在甚至想不出，在它之中会有什么令人不快的）。只是自然界往往欺负人。人应该更聪明、更姣美、更富于才干、更富裕……难道希望这样就得冒给你扣上悲观主义者帽子的风险?!或者，如果不相信现存的任何一个伟大哲学体系，就是怀疑主义者吗？要知道，迄今为止真理并未发现，但并不能由此说，永远不能发现真理，甚至根本没有真理。难道那期待真理并不把第一次遇到的错误名为真理的人就是怀疑主义者吗？我认为与此完全相反。按照我的看法，怀疑主义者恰恰是那些深深坚信没有必要去探索的人。因为反正什么也找不到，这些人更乐于狂热地拥护一次就会的体系。假如别尔嘉耶夫可以每半年变更一次信念，假如按上述灵活的教条主义定义判断，他就会准备开始每半个月变更一次，那么，为什么我就不能更经常改变它们呢？这已经可以说是气质问题了。别尔嘉耶夫是急性子人，而我更急躁。他已信仰了许多种哲学，而我也已信仰了全部哲学并且已习以为常地变更它们。正如我已经说过的，现在有时一天之内要变更它们多少次啊！这不是怀疑主义，而是灵活善变的非教条的教条主义。正如读者看到的，这种表达正合我的口味。前面我只是提到教条主义，现在将一直说非教条的教条主义在追求其他的**愚蠢**时，我疏忽了这个**愚蠢**，真是感谢别尔嘉耶夫。我不会忘记这个教训。

其次，别尔嘉耶夫抓住了我的话反驳我，他说："在这一处，我抓住了《无根据颂》一书的作者。什么是自由的思想，什么是思想？

这已经是某种前提。要知道，任何思想都是用我们称为理性的致命手段来加工体验和经验的结果，在思想之中必定合乎逻辑性。”对的总是对的，他抓住了。只是为什么要抓住？难道就这样看书的吗？应当忘却的不只是所谈之书的所有的话，而且还有作者的一切思想，仅仅只是记住他的面目。因为语言和思想只是交流的不完善的手段。对心理既不能照相，也不能描绘，这样就要求助于语言吧，人们早就知道，说出的思想就是谎言。可别尔嘉耶夫却抓住我。他没有意识到，寻求完全适合的表达是多么不可能，他不仅未像人那样给我以帮助和领悟，反而跟我捣乱。这绝不是一视同仁的方式。

似乎，别尔嘉耶夫的所有反驳限于这一点。据实说，他还有一点，尽管是偶一为之，然而也是举足轻重的。不过，我将不涉及它，因为我不会回答它，也不想在这一点上不打自招。还是让人任何事都不知道更好。

最后，我衷心地欢迎别尔嘉耶夫的书并且赞美他的**愚蠢**。别尔嘉耶夫毫无疑问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这在我们文学界也寥若晨星，他们擅长于损害健全理性的名誉并且推崇**愚蠢**。只有一点不太好，那就是别尔嘉耶夫常常在重复家喻户晓、普遍常见、习惯熟悉的**愚蠢**。按我的看法，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习惯熟悉的**愚蠢**酷似智慧。与它们瞎折腾值得吗？总应该力求去杜撰一些完全新式的**愚蠢**吧。要是办不到，那么，就开掘过去适用、然而又少为人知或者为人遗忘的，一个陌生的词**赞颂**。

还有一个意见。别尔嘉耶夫在自己的后记中已经越过了界线辱骂了经验世界。他称之为疮疤。人在醉心于争辩时常常会像两

个下国际象棋的少女。她们拿走了对方的王并继续玩下去。别尔嘉耶夫攻击实证论者，放弃了经验世界。难道只是为了灵魂操心吗？那肉体呢？我不知道，列昂季耶夫是否使我感染上矛盾的心情，但是我想要与海涅一起说：你的灵魂尽可埋葬，有了我的灵魂就已足够(die Seele könnt ihr begraben, hab'selber Seele genug)。

结　语

1

关于各种疑虑(De omnibus dubitandum)。如今,哲学家已经很少有人属于正统的黑格尔学派,但黑格尔始终还在继续支配我们同时代人的思想。现在他的某些思想,大概比黑格尔主义者的兴盛时代传播更广、影响更深。例如,历史是理念在现实中的展开,或者简单明了,用更接近现代思想的术语表达,是进步的思想。如果想让受过教育的人在这方面回心转意:想必会徒劳无功。不过——关于各种疑虑——换言之,当信念极其牢固、坚定不移时,怀疑就负有履行自己伟大天职的使命。因此,不论愿意与否,都必须做出假设,所谓进步——人类在时间里的发展——只是一种虚构而已。尽管我们已经有了无线电报、镭和其他一切,但是我们仍然并不比古罗马人或者古希腊人站得高。可以这样认为吗?还可更进一步:虽然我们有无线电报和一切其他文明财富,可我们仍然不比红种人和黑种人站得高。您会提出抗议,但是原则要求是:既然开始怀疑了,就不能倒退。

我照样也应当承认,我的关于野蛮人的心灵尽善尽美的思想是在不久前才出现的。那时,我在多年以后第一次偶然地重新阅

读泰勒[1]、卢博克和斯宾塞的著作。他们是这样深信不疑地谈到了我们的精神组织的优点，并如此坚决地蔑视野蛮人的简陋道德。我不禁沉思道：谬误的起源不正是隐藏在这里吗？在这儿，一切人都是如此深信不疑，任何人无论何时也不会去验证。现在需要(Es ist höchste Zeit)提一下笛卡儿和他的定理！我刚一开始怀疑——我过去就是这样对一切都深信不疑的(当然，要知道我完全赞同英国人类学家的意见)……我便开始觉得，事实上野蛮人比我们的渊博学者不只是像包尔生[2]教授所想到的唯物论者，而且也有唯心主义者、形而上学论者、神秘主义者，甚而还有信仰的传教士(是真诚的信仰，而不是横财暴利和冒险猎奇的探险家)——欧洲的这些人是为了教育落后的民族而派遣到世界的其他地区——都更高明、更出色。我觉得野蛮人的日常债务交易与其在冥间的偿还具有最深奥的意义。我不是在谈人类的祭祀！斯宾塞把这看成了野蛮性，是对有教养的欧洲人来说的。我同样也看到野蛮性，因为我同样是欧洲人，同样学习科学。但我却极为艳羡他们的野蛮性，并诅咒自己的文明。它使我与信仰的传教士、唯心主义哲学家、实证论者和唯物主义者一起，禁锢于令人厌恶、可以了解的世界的狭小圈子里。我们可能撰书立说来论述灵魂不朽，然而我们的妻子却不会跟随我们去另一个世界，宁愿在人世间过寡妇的生活。我们的精神奠基在宗教之上，禁止我们去追逐永恒性。一切不过如此

---

① 泰勒(Edwara Burnett Tylor，1832—1917)，英国民族学家，研究原始文化。——译者注

② 包尔生(Friedrich Poulseu，1846—1908)，德国哲学家，主张泛神论，拥护唯意志论。——译者注

而已。我们至多推测，充其量也只是按照马尼洛夫[1]式去痴心梦想，然而我们的生命却在我们的推测和幻想之外流逝。有人会接受宗教的义务——无论这些义务多么怪诞，并一本正经去想象。这样一来，他就在与另一世界交往。任何人都很难在宗教仪式上向前迈进一步。康德死于 80 岁，假如不是霍乱的话，黑格尔可能要活 100 岁，而野蛮人中——青年杀死老人并且……我不说下去，以免刺激多情善感的人。我重新想起了笛卡儿及其原理，我要问，谁对，是野蛮人还是我们？如果野蛮人正确，那么历史是理念的发展吗？时代的进步（即从过去到现在和未来的发展）不是存在最纯粹的错误吗？也许，甚至极有可能的是发展，但是这一发展的倾向是对时间线的垂直线。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一个垂直的基础。是的，上帝和读者会宽恕我最后这些模糊不清的话。我希望它在某种程度上会由上述说明的明晰性得以补偿。

2

弃绝自我和伟大狂（mania grandiosa）。应该想到，不会有任何关于弃绝自我的信念，任何有关伟大天命的正确说法，尽管我们每人根据个人体验什么懂得多少第一啦，第二啦。不过，众所周知，解决问题的不可能性从来也不会阻止人们去沉思。更多的却是事与愿违，对于我们最诱人的问题，是那些没有真正为大家所必须遵循的答案的问题。我希望，与科学不同，哲学迟早总会得到这种定义：哲学是关于无论对谁都不是必然的真理的学说。哲学本

---

① 果戈理《死魂灵》中的一个痴心妄想式的人物。——译者注

身归结于一系列互相驳斥的意见这样一种经常的责难，将会由此而一劳永逸地被消除。这是对的，为此应称赞它，而不应该去责难，这没有什么不好，而有许多好的东西，多多益善。而科学具有普遍必然的判断是不好的，极其不好的。要知道任何必然只会限制自由。暂且可以赞同限制自由，穿着紧身，负重，暂且可能乐于同意。不过，谁乐意承认永恒规律在自己之上？就连在安详和清醒的斯宾诺莎那儿，我也听到了不时的长叹。我想，这是他在为自由而伤感——他在颂扬必然性中把自己的整个生命、自己的全部才华都消耗殆尽……在这种前言之后就可以读任何东西了。

我觉得，弃绝自我和伟大狂不仅彼此极像，而且能一贯地，甚至同时表现在同一个人身上。舍弃生活，服从一切和疯狂的禁欲者（如同尼采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确言自己是一盏明灯，最卓越超群者和全世界或者全宇宙的第一人，而两者在大部分相同的条件下都将导向自己的疯狂（我希望，没有必要证明，弃绝自我就像伟大狂一样是疯狂的一种形式）。世界不会使人类满足，于是人类开始寻求更好的世界。任何认真的探求都把人引向孤独之路。这就产生了一个任务：反抗命运，无论如何要克服不可穿越的规律，或者是战胜不可克服的引力律。换言之，或者变成无限小，或者变为无限大。第一种方式是弃绝自我：我什么也不需要，我自己毫无价值，我无限渺小，所以能够穿过无限小的墙孔。

第二种方式——伟大狂。我无限强大，无限伟大，无所不能，超越它，即便它是雄踞于地球上的一切高山之巅，迄今为止仍能骇退那些甚至最强有力和最勇猛无畏的人。大概，这就是两种最神秘莫测和最伟大的精神变形的开端。没有一种宗教，不多多少少

鲜明地铭刻着人类与其有限的力量进行上面所描述的斗争方法的痕迹。在禁欲主义的宗教里，主要倾向是弃绝自我。佛教赞颂完全毁灭个性并把涅槃当作理想。古代希腊人幻想泰坦[1]和英雄。犹太人认为自己是特等民族，期待着救世主。至于《福音书》就很难说它是倾向哪种斗争方法。一方面是伟大的奇迹：复活死人、治愈病人、驾驭狂风和大海，另一方面是怡然自得的谦卑之人，上帝之子将无暇固守右边的力量，现在却生活在压迫者、乞丐、荡妇的社会里，并为他们服务。谁不支持我们，谁就是反对我们，许诺要把敌人推翻压在山脚下和火焰地狱之中，永远试图辱骂**圣灵**——与此同时，却是对敌人最温柔和爱的圣训：打了左脸还应该伸出右脸。整个《福音书》都隐含着矛盾。这矛盾不是外表的，也不是历史和实在的，而是内在的，即心境和“理想”里的矛盾，就像现代人所表达的那样。在一个章节里得到像最高使命一样吹捧的东西，在另一章节里却像卑鄙龌龊之事得到了贬斥。这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极端对立的学说都可以在这一不大、半为重复的书里找到辩护。宗教裁判者、耶稣会教徒、古代的禁欲苦修者称自己为基督徒，现代的新教徒和我们俄国的教派分子也称自己为基督徒。在某种程度上大家都是对的，大概，就连新教徒也是对的。在《福音书》里相互融汇着如此对立的流派，人们，尤其是那些长途跋涉仅仅只擅长于一个方向里运动并处在一个人人可见的旗帜下的人，那些迷恋于理性和逻辑规律的无可争议的统一的人，从来也不能

---

① 泰坦，希腊神话里的巨神，共十二名，为天神和地神的子女，转义指巨人。——译者注

把握住整个合乎福音的学说，总是渴求赋予基督的语言和事业单调划一、不相矛盾并多少符合生活的事业和使命的普通概念的诠释。他们在神秘难解的书里看到了"信仰吧，你的话会移山倒海"时，会做这样的理解：永远并时时刻刻都应思考着和希望着同一个预先指示和完全清晰明白的东西。同时，《福音书》在这些话里的解答和施恩赐福是最疯狂的、也是冒险的体验。那么，对于基督，不存在和存在的只是虚无的东西。

例如古罗马人彼拉多①大概是有教养的、聪明的好人，虽然他性情软弱，不明白也不能清楚地认识，为什么这里要进行如此奇怪的斗争。他极为惋惜，不幸并显然是无辜的年轻犹太人被带到他跟前。他问基督："什么是真理?"基督没回答，也不能解答。像多神教徒认为的那样他并非"无知"，而是因为不能用语言来回答这一问题。应该借喻地说，把彼拉多的脑袋拧向另一面，以便让他看到从来也不能看到的那些东西。或者更好的是求助于神话中驼背马运用的那种方式，以使睡眼惺忪的伊凡鲁什克变得聪明而漂亮：先把他扔进沸腾的牛奶锅，然后再扔进另一只开水锅，随后扔进第三只冰水锅。有充足理由认为，彼拉多经过这种教养之后会开始换另一种方式去询问。我觉得驼背马会同意，弃绝自我和伟大狂完全能代替神话中的锅。极度的贫困和伟大的梦想使人的本性改变到如此程度：似乎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把无法实现的变成了可实现的。

---

① 彼拉多，《圣经》中《新约》里的人物。按《新约》说法，他是罗马帝国驻犹太的总督，耶稣即由他判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译者注

3

永恒的真理。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里叙述了苏格拉底与著名的诡辩家希匹阿斯[1]的相遇。当希匹阿斯来到苏格拉底那里，后者像通常那样对话，并像通常那样惊讶不已，即当人们必须去学习木工或者锻铁业时，会知道向谁求教，但如果愿意去学习德行，就不能找到任何老师。希匹阿斯已多次从苏格拉底那里听到这些说法，讽刺地说："苏格拉底，莫非你现在所说的一切，还是我很久前就从你那里听到的那些吗?"苏格拉底明白了他的用意并接受了挑战，就像一般总是乐于接受这种挑战一样。争辩开始了，结果表明，这一次(就像在柏拉图和色诺芬那里一样)和他的对手相比，苏格拉底更是强有力的辩证法家，是他成功地证明，他的正义概念具有如此坚固的基础，就像一切为他的推理所证明的原因并由此所编织成的信念一样，假如它们是真的，就会很少受时间的作用，仿佛贵金属很少受铁锈的作用一样。

苏格拉底活了70年，曾经经历了青年、丈夫和老年三个阶段。但是假如他活140岁，第二次试图全部经历生命的三过程，再重逢希匹阿斯呢？或者，更妙的是——正如苏格拉底所教诲的，如果灵魂可以不朽的话，那么现在苏格拉底就会生活在月亮、天狼星的某个地方，或者在另一个为不朽灵魂准备的地方，那他迄今为止还在那儿为自己的对话者谈论的正义、木匠和铁匠所烦扰吗？现在仍

---

① 希匹阿斯(约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诡辩学派哲学家。——译者注

像以前是同希匹阿斯和其他人争辩的胜利者吗？那些人断定：一切都会并且也应当听命于时间规律，其中就包括人类的信仰，即人从这种听命中不仅会毫无所失，而且会赢得许多。

4

尘世和天堂。大家都在高谈阔论正义一词。但事实上人们真的是像他们口头上谈论过或正在谈论的那样重视正义吗？它的最忠实的保卫者、受赞扬的诗人、哲学家、道德家、神学家——甚至他们之中最出类拔萃、最真挚坦率和最有才华的人，也这样重视它吗？我极为怀疑这一点。请看看古代和新世界任何一个贤明之人的创作吧。正义——假如把它理解成在创造的规律面前一切活人都是平等的——还能有另外的理解吗？这是从来也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的问题。柏拉图一次也没有询问命运，为什么它使忒耳西忒斯[①]遭人鄙视，而使帕特克罗斯[②]成为崇高的人。柏拉图忠告人们做正义的人，但是从来不敢诘问神祇是否正义。假如仔细听他的演讲，有时就会对他疑心重重：正义是凡人的美德，而神祇的美德则与凡人的正义毫不相同。这就是美德对人世间最终的诱惑。我们不知道，人类的灵魂是必死还是不朽。但尽人皆知，一些人信仰不朽，另一些人则嘲笑这种信仰。假如这两种人都不对，人的命

---

① 忒耳西忒斯，希腊神话中人物。特洛伊战争期间希腊联军中最丑的人。他胆子小、多嘴多舌，辱骂一切，遭到奥德修斯的斥责。后来被阿喀琉斯一拳打死。——译者注

② 帕特克罗斯，希腊神话中人物，阿喀琉斯的好友。特洛伊战争中，他身穿阿喀琉斯的盔甲冲到特洛伊城下，被赫克托耳杀死。——译者注

运在人死以后就如在生一样，其差别不啻霄壤：成功者、胜利者升入天堂，其余的人则埋入坟墓，与自己凡俗的躯壳一起毁灭。顺便说说，我们俄国的先知、爱和正义的祭司——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宗教大法官》里确实做出过这种假设。这样，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真的不朽，而信仰他的无以计数的弟子和崇拜者，《宗教大法官》里所说的那些愚昧无知（在一切方面）的广大群众，都与死亡一起结束自己的生命，正如与生一起开始一样——人会调和吗？不是随便什么人，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我在这里不是偶然地提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是故意地作为正义思想的最狂热保卫者（在尘世间还存在着更狂热、更迷恋、也更著名的正义保护者，或许也应该提一下他们，不过，这一次我不想亵渎，谁要是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还不算最狂热，就让他去提出另外一个人），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同那种非正义调和，即他在冥间是否起来反对谎言，或者在那儿占据了为他预备的位子，就忘记了自己的不幸的兄弟们呢？而做先验（a priori）的判断是很难的，不过，应后验（a posteriori）地认为，他会遗忘的。要知道，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微不足道的老憨作家之间，在尘世间的第一等人和最后一等人之间，终究还是有巨大差别的，这种不平等的非正义性在大声向天堂呼求。然而没关系，我们仍生活在这里，并未大声哀号，假如我们大声哀号那也是极为罕见的，并且，说实话，很难深信不疑地说，为什么我们要大声哀号：因为是想要招引无动于衷的天堂的注意，或者是因为在我们的近人中有着许多爱好大声哀号（文学才华）的人。犹如《暴风雨》中的女香客，极喜欢听人悲痛哀号。所有这些理由可能会是特别重要的，就像我在目前这一时刻（不敢保证明

天)赞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判断,即如果存在不朽,那么自然,这不是对一切人而言的。并且,我赞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见,假设那些按照现在的推测期待着死后会有更好的人复活。这里的第一等人将在那里也是第一等人,可就连回忆也没留给最末一等人。没人会去袒护死人,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以及所有其他的"第一等人"都已升入天堂,他们将从事无与伦比的更重要的事业……

现在,如果愿意的话,请继续关注尘世间的正义体制问题,并且像柏拉图那样,把正义的学说作为哲学的基础。

5

证据的力量。叔本华从反面解决灵魂不朽的问题。根据他的意见,人作为自在之物(Ding an sich)是不朽的,但是作为一种现象却是必死的。换言之,我们个体所具有的一切只是介乎于生与死之间。按照叔本华的学说,每一个体都是"意志"或者"自在之物"的表现,是那个在纷繁复杂的现象里从自身中提供了统一的客观化的世界本质的永恒不变的基础,那么,这一基础就表现于人类之中,就是永恒的。我认为,这就是叔本华的观点,它显然是他的一般哲学学说中的始终一贯的逻辑结论。无论是在与自在之物有关的部分,还是在与个体有关的部分里都是如此。第一部分我们暂且不研究:因为归根到底,如果叔本华错了并且自在之物也是必死的,那么也没什么了不起,正如它的不朽也没有理由可以高兴一样。但重要的是个体:他被取消了享有不朽的权力并以初看起来完全不容置辩的理由作为证据。叔本华说过,一切有始的亦有终。

个体都有开端（出生），因此等待他的却是终结（死亡）。叔本华甚至觉得，这一原理和结论是这样显而易见，以致他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犯错误。但是，这次我们碰到的却是无可争议的，并由错误的先决条件导致而来的错误结论。因为第一，为什么具有开端的一切就应当也有终结呢？经验主义的观察会导致这种推测，——但是，经验主义的观察难道足以建立先决条件吗？难道我们有权运用先决条件作为解决至高无上的哲学问题的不可动摇的原理吗？又，我们甚至假定前提是正确的，但叔本华推导得到的结论却终究是不正确的。也许，具有开端的一切确确实实都有终结，也许个体或早或晚都命中注定会命归西天，然而为什么灵魂毁灭维系于肉体的死亡呢？也许肉体死亡了，可灵魂——也就是以后那一命运期待的灵魂，仍生存着，尽管时间不长，不像极端乐观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永恒的，并在某个遥远的还可能为我们无从知晓的星球上找到了或多或少合适的物质躯壳。对不幸的人类来说，怀抱这种希望是多么重要！尤其是当人们在谈论灵魂不朽时，我们未必一定知道人们希望的是什么。他们果真一定应当永恒生存吗，或者他们满足于一、二次生命，特别是假如后来的生命是无足轻重的，正如我们的尘世存在一样。在我们的尘世中就连十四品官也是许多人望尘莫及的理想。我似乎觉得，远非任何人都同意永远活着。如果一切都有可能耗尽用竭，并开始无穷无尽的重复，会怎样呢？……

当然，由上所述并不能得到我们具有希冀冥间生存的权利：在反驳叔本华的证据之后，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不过，毫无疑问应该是，最好证据也经不住仔细推敲，往往是毫无用处的。经此阐述，

便一清二楚(Quod demonstrandum erat)——自然,一直到找到能推翻我反驳叔本华的证据之证据之时。作出这一保留声明,为的是不让批评家玩弄语言并乐此不疲。

6

绝笔。毫无疑问,《当我们凡人苏醒时》是易卜生最富于自传性的剧本之一。不仅他的几乎全部剧本都带有个人体验的显著痕迹,而且它们的最高价值显然也在于提供探察作者内心斗争史的可能。不过,较之其他剧本,《当我们凡人苏醒时》有特殊意义,因为这是作者在垂暮之年深思熟虑写就的作品。对于那些有兴趣偷偷了解人在生命的临终一刻谈了些什么和做了些什么的人,与垂暮老者、行将就木之人的交流极有价值。总之,与处在特殊条件里的人们,尤其是在这些人不怕说出真理并且用过去的体验培养正视现实的艺术和胆量(两者都是需要的)的时候,易卜生原本是比托尔斯泰更富趣味的人。托尔斯泰直到如今仍禀赋超群,不过,托尔斯泰首先是个道德家。现在对于他,就像在青年时期一样,统治人们的权力比一切都宝贵,似乎这比世界的其他一切幸福都更令人心醉神迷。他仍然继续发号施令,要求并且希望人们都得服从他。大概,可以甚至应当关注和尊敬地看待托尔斯泰天性中的这一特点。要知道不是一个托尔斯泰,而是许多威严的苦行僧思想家直到自己的生命终结前,都向人类提出过绝对服从的要求。苏格拉底在临终之前一小时还谆谆教导人们:只有一个真理,正是他揭示了它。柏拉图在垂暮的晚年还来到锡腊库扎宣扬自己的贤明。大概,伟人的这种坚韧不拔精神有着自己的解释和深奥含义。

托尔斯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欧洲先知们，在这方面就像在许多其他人那里一样，非常相似于贤明的导师。大概，应当把自己的力量完全集中于一个伟大的内在使命，全世界以至全宇宙都在与他们的齐唱里和谐一致的这种幻想，是使之得以成功的条件。我已在评托尔斯泰时指出，他目前的世界观是处于唯我论之中。托尔斯泰和全世界是两个同样重要的概念：没有他本质上的暂时迷误（不是理性、大脑的错误：大脑清楚地知道，世界是世界，托尔斯泰也是托尔斯泰），他就只得弃绝自己最重要的事业。这正如我们大家在哥白尼之后才知道，地球绕太阳而运转，也知道每一个星体都不是光洁、清晰的金环，而是各种成分组成的庞然大物，我们头上也没有浅蓝色的坚硬圆顶。然而我们也知道不可能并且不想成为瞎子，不去观赏可见世界视力错觉的不真实。对于我们，所谓真理仅仅只有有限的价值。伽利略的牺牲绝不是反驳我的话。它简直像是在运动（pur si muove），假如他说了这一句话，可能完全与地球运转无关，尽管这是在谈论地球。伽利略不想背叛自己一生的事业。但是，谁担保不只是伽利略有这种牺牲自我的精神，而且还有他的门生，尽管是最忠实和最勇敢无畏的门生是从老师的嘴里听到的，而不是以自己的斗争获取新真理呢？彼得[①]使徒一夜之内曾三次拒绝基督。大概现在，我们在全世界也不能找到任何人会同意为证明和捍卫伽利略的思想去死。显然，伟大人物极少愿意让外人知道自己伟大事业的秘密。大概，甚至连他们本人也不总是善于一清二楚地看到他们为自己所提出的使命里的特点

---

① 彼得，耶稣的十二个名徒之一，原名西门，后来耶稣为他改名彼得。——译者注

和意义。苏格拉底本人如此坚定不移地以整个一生去寻求自己的明晰性，为了这一目的，他创造出辩证法并引申出普遍适用的定义，用于确定流动不居的现实。苏格拉底死前一连 30 天都在使自己的门徒坚信，他是为了真理和正义去死的——可我认为，或许就连苏格拉底本人也同样就像自然死亡的人和刚涉人世的孺子一样，不比普通人更清楚地知道，他为什么去死，谁和什么样的权力——敌意的或善意的——来唤起他们从不存在走向存在。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无论是贤明之士还是糊涂蠢人，是老人还是婴儿，在生活之中都碰运气地走向目的。迄今为止，这些目的无论世俗还是宗教，无论在日常、还是神圣的书籍里都未公开发现。我说出所有这些意见绝不是为了再一次羞辱教条主义。我总是相信并到如今仍然深信不疑，教条主义不能遮百丑，他们用任何方式也不能得逞于世。最近，我除了做出这个结论外，还有一个结论即教条主义者顽固不化情有可原。信念、信仰需要坚定有力、既像爱又像死。目前对于每个教条主义者来说，我认为自己的神圣义务是做出一切让步，直至坦承他的信念和信仰是最微细、最无足轻重的意义。唯一的限制是极不易察觉、几乎不可见的：他的信仰不应当是普遍必须的，也就是说，对一切人都毫无例外。我情愿把许许多多的人——千百万，甚至亿万人们，让给他，只要他们自己愿意，或者他是相当巧妙的，以便把他们吸引到自己一边。（要知道在信仰事业中不容许暴力操纵）一句话，我几乎让给他一切人，但是他应当赞同，对于其他的一人或十人，他的信仰不是内在必须的（可以在外表上俯首听命）。因此教条主义在这些胜利之后——要知道我的承认是他的完全胜利——应当认为自己心满意足了。

苏格拉底是对的，柏拉图、托尔斯泰、先知们都是正确的。只有一个真理，一个上帝，真理有权消灭谎言，光明消除黑暗，全知、至善、全能的上帝，正像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一样，征服了他所知道的几乎全部世界，在臣民的胜利欢呼声下，从自己的领土驱逐魔鬼和一切不听从上帝的人。但是聚集在遥远的、为亿万人看不到的岛屿上的一些背教者拒绝统治，将继续自己自由特殊的生活。这就是为了回归开端——在这一小撮不驯服分子中有易卜生，即晚年的、最后的剧本里描写的易卜生。大概，我们在这里会遇到果戈理，因为在《当我们凡人苏醒时》里易卜生赞同和颂扬了 50 年前果戈理所做过的事情，他弃绝了自己的艺术，以满腔仇恨和嘲笑回想起他生活的一件事，1866 年 4 月 15 日易卜生写信给卡尔国王说："我不为无忧无虑的生活奋斗，我为自己的生活使命奋斗，我坚信不疑地信仰这一使命，我知道，这是上帝赋予我的使命。"顺便指出，你们几乎找不出任何一个伟大的活动家，他不是在某种形式里重复易卜生所引出的主张。大概没有这种瞬时易逝或者经久不衰的梦幻，就不可能有那种紧张斗争和以换取伟大事业的牺牲。就连为了鸡毛蒜皮的细微末事的成功也必须有各种各样的幻想。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为了区区小事，他也常常不得不使自己的微薄之力紧张已极。谁知道呢？——阿卡基雅·阿卡基耶维奇①不是以为，上帝赋予他的使命是仔细抄写公文，并且缝制新大衣吗？当然，他任何时候也不敢这样做，也不敢说，首先是由于自己胆怯，然

① 阿卡基雅·阿卡基耶维奇为果戈理小说《外套》中主人公，是一个抄文件的小官吏。——译者注

后还由于不擅长能说会辩。诗神不会青睐不幸而软弱的穷人，它们只逢迎财主和帝王。但是毫无疑问，乡村里的第一等人认为自己像罗马的第一等人一样命运不凡。恺撒感受到这一点，当他说出自己的名言时，其中不仅仅是虚荣心。人们总不相信自己，总是渴求占据能产生正确或错误的信念之位置，他们才会被上帝所注意。不过，逐年逐月一切幻想都会烟消云散，有关上帝为了自己特殊的目的而选择某些人并寄托他们以特殊使命的黄粱美梦也消逝而去。果戈理长久以来正是如此理解了作家使命，在死前把自己最好的作品付诸一炬。易卜生几乎也是这样。通过鲁贝克教授[①]，他弃绝了自己的文学活动并嘲笑它，尽管它曾给他带来过他能指望的一切：名誉、荣耀、财富……请想一想，这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为了去做艺术家而不做男子汉，离别了他爱恋的伊列娜，娶了一位他根本不爱的女人为妻。或者还是在生命终结之时，易卜生明白了，上帝赋予他的使命是去当男人吗？然而要知道男人不计其数，艺术家们则是一小部分人。假如不是易卜生说出这一点，而是一个普通平凡的垂死之人，我们会称为庸俗不堪。不过，由一位 70 岁的老人，《布兰德》——欧洲的神甫从《布兰德》之中为传经布道获得话题和材料——《皇帝和盖利利恩人》的作者易卜生说出，这一自白获得了出人意料和神秘莫测的意义。这里已经不是摇头否定和嗤之以鼻的冷笑可以敷衍了事的，这不是其他任何人，而是易卜生本人所说的。不是乡村里的第一等人，也不是罗马的

---

① 鲁贝克教授，为《当我们凡人苏醒时》一剧的男主人公，是一位艺术家。——译者注

第一等人，而是全世界的第一等人。他大声而坚信地说，在罗马城内以及全世界(urbi et orbi)。这就已经是真正的人类规律：不要发誓，不会坐牢和讨饭。也许，在这里回想一下屠格涅夫的绝笔是适宜的。屠格涅夫具有高尚的理想，显然，他觉得这些理想是从上帝那儿直接托付而来。他在结束名作《哈姆雷特和唐·吉诃德》时所说的一句话，大可适用于布兰德[①]："一切都会消逝，只有美好的事业永恒长存。"——在这句话里蕴含着屠格涅夫的一切，最好是说——写作该文时完全自觉的屠格涅夫。其实，不仅如此，直至生命的最终时刻自觉的屠格涅夫仍恪守这句话。然而，他在《散文诗》里却完全鸣响着另一种调子。他在那里所述说的一切，就像易卜生在自己的最后一部剧本里所述说的一切一样，对徒劳无益地滥耗生命——在"善"的说教中消逝的生命，渗透着一种永无止境、难以克制的忧思。无论是青春、健康，还是原来的力量都不吝惜！也许死并不可怕……屠老不可能从自身中根本消除对《俄罗斯姑娘》的回忆。他描绘并歌颂她，是他之前在俄国文学里其他任何人都从未这样描绘过的。但是她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模特儿，他并没有抚摸她，宛如易卜生的鲁贝克对待伊列娜，就到维亚尔多[②]那里去了。这是一种可怕的罪恶，是不可救赎的弥天大罪——就是那种在《圣经》里所说的大罪。一切都可原谅，一切都将消逝，一切都将遗忘，但这一罪恶却将永远留存。这就是屠格涅夫"年事已高"(Senilia)的意义，也就是易卜生"Senilia"的意义。我说 Senilia

---

① 布兰德，为《布兰德》一剧的主人公，是一虔诚信仰上帝的牧师。——译者注

② 维亚尔多-加西亚(1821—1910)，法国女歌手。——译者注

这个词,是为了能谈论绝笔,并尽可能正确地谈论绝笔。柏拉图曾说过:“当天鹅感觉到死亡临近,这一天它就会比任何一天都啼鸣得更好,它们兴高采烈,因为就要找到它们为之效力的上帝了。”易卜生和屠格涅夫也是为同一个上帝服务。按照希腊人的信仰,就是光明的歌之神阿波罗。他们的临终之曲,他们的 Senilia 是比一切原先的歌声更优美。其中包含了多么深奥、触目惊心、奇妙的东西！那里的一切与我们这里所处的表面相比也是不啻霄壤。是否信任诱惑,是否走向伟大老人的召唤,或者使自己眷恋于经受大家必须遵循的经验考验的信仰之梦并且捂住耳朵,就像聪明的奥德修斯当时所作所为,以便摆脱塞壬一样？有瓦解魔力的出路和词,我已称之为 Senilia。屠格涅夫就是这样给自己的《散文诗》加标题的。它表现出了疾病、虚弱、年迈,这都是可怕的东西,应当逃避它们！形而上学哲学家叔本华害怕在晚年改写自己年轻时的著作。他觉得,他稍一触摸就会损坏它们。大家都不相信老年,大家也共同感受到叔本华的担忧。如果是大家错了,这将会怎样呢？假如 Senilia 使我们更接近真理又会怎样呢？也许,阿波罗的能预言的鸟为另一种存在烦恼苦闷。它们很可能不是畏惧死,而是畏惧生,也许在屠格涅夫的诗里和在易卜生的最后剧本里已经能谛听到如果不是最新成果,那么至少也是较新成果的人类语言。

7

什么是哲学？在这个问题上,你们可以在哲学教科书里找到五花八门的答案。两千五百年来,人们对定义哲学的本质做了无数次尝试。但是迄今为止,在贤明和爱好者的宠儿公认代表之间

还未达成协议。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他们都认为自己的判定是唯一正确的——不过,这里还不能幻想会明智地同意(Consensus sapientium)。然而,正是在这一争论点上,学者和贤人间的协议的不可能,完全是用奇怪的方式达到了世俗地同意(Consensus profanorum)。只有那些从未研习哲学、任何时候完全不看学术之书甚至任何书籍的人,才会以罕见的一致回答我们的问题。确实,不能直接评判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完全不会说科学加工了的语言,从来也不会提出这种形式的问题,更不善于用现成的语言来回答它。不过,我们有一个重要的间接指示,它赋予我们做出结论的权利。毫无疑问,那些为解答折磨他们的问题而求助于哲学的人,假如他们只是为了没有足够卓越的天才而归附于职业哲学家的话,都会大失所望、扫兴而归。是的,由此毫不犹豫地可以做出暂时是否定的结论:哲学所研习的只是对某些人有意思和重要的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是枯燥乏味而又不必要的。

这无论对于无知之徒,还是对于贤明之士,结论都极为令人欣慰。因为每一个贤明之士,甚至声名显赫的人同时也是无知之徒,即抛开科学用语,也就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会产生的那些普普通通之人向他提出的折磨人的问题,例如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或契诃夫的教授(出自《没有意思的故事》)。当然,那时他会不得不承认,尽管他对那些鸿篇巨著游刃有余,也没有找到应有的答案。这一点令人高兴。因为对于人类来说,有什么比在生活艰难的时刻承认任何一种哲学学说的必要性更为惊骇可怖呢?例如,可与柏拉图、斯宾诺莎或叔本华一样认为,生活的主要使命是道德上的完善,换言之,就是弃绝自我。柏拉图绝妙地宣扬了正义,这

丝毫不妨碍他成为自己时代的儿子，即在允许的范围里破坏他补偿的圣训。显而易见，斯宾诺莎比柏拉图更坚定不移和更合乎逻辑性，实际上他极其热衷于服从。不过，这是他个人的爱好。合乎逻辑性不仅是他智慧的固有性质，而且是他的全部天性。表现出它，就是他表现出自己。至于叔本华，众所周知，他只是在自己的书里颂赞美德而已。在生活里就宛如所有独立自主的聪明人，奉行着各种各样的见解。

然而，这一切都是发明体系和命令的人——导师。寻求自己问题的哲学答案的门生，不可能容忍自作主张，违背一般原理，因为每一学说的本质和根本使命都是为了不仅使人们的品行，而且使全宇宙的全部生命都服从于统一原则的调度。有些哲学家找到了这些原则。不过，迄今为止哲学家们之间还没有最终统一意见，这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那些不幸之人的境遇，他们失去了寻求帮助和指南希望之后，才开始求助哲学。既然这里没有普遍的、为大家所公认的、必须的原则，这就意味着至少暂时允许每人按自己的方式去决定思考和体验甚至自行其是。可以听从斯宾诺莎，也可以不听从他。可以崇拜柏拉图的永恒理念，然而也可以偏重于变化无常、流动不居的现实。最后，还可以接受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不过，任何人和任何东西都不能以叔本华曾对爱情做了致命的嘲笑为由强迫你独身。为了争得这种自由，毫无必要用古希腊哲学家的简朴辩证法、贫穷的荷兰犹太人的晦涩难懂的逻辑，或者深谋远虑的德国人的敏锐聪明来武装自己。完全不应当去争论它们，甚而可以赞同一切。世界的空间漫无边际，不仅包容任何时候一切生存过和现有的人，而且赋予他们每人以他所热爱的一切：给柏

拉图以理念世界，给斯宾诺莎以统一、永恒而又始终不变的本质，给叔本华以佛教的涅槃。他们中的每个人和所有其他人（在这里没有提到的世俗和精神的哲学家），在整个宇宙里都将找到他们需要的东西，直到信念，甚至把他们的学说当作是唯一正确和包罗万象的学说去信仰。不过同时，无知之徒也在为自己探求合适的世界。尘世间的人已拥挤不堪，在这里不得不用难以置信的努力去争夺每一寸土地甚至我们的虚幻自由，但无论怎样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应当把贫穷、愚昧、专制视为永恒的开端，并把经济联合视为人类的最终庇护所。辽阔无际的宇宙的无限空间中的大千世界，茫茫众生和神祇——要知道这就是（是的，原谅我的话）理想！的确，也不是由唯心主义论证的理由。但是，由此会推导出什么样的结论啊！既然谈到了神灵，我们就搁下争辩和论证的哲学家不提。根据现存的信仰和假设，神灵彼此之间永远争吵不休和争斗着。就连在一神教宗教里，人们也总是逼迫自己的上帝参与斗争，甚至为他故意臆想出敌手——魔鬼。人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的思想是，天堂里一切完全像在尘世间一样，并把自己的一切无论是丑恶，还是优秀品质都归咎为天人[1]。其实，根据我们的想象，与生活完全不可分离的许多东西，在天堂中就完全可能没有。顺便说说，斗争就不存在，这真太棒了。因为任何斗争都不可避免。或早或晚地导致流血斗殴。当逻辑学和伦理学的根据耗尽用竭，未和解的敌手唯有采用通常解决事情的办法——斗殴。逻辑和伦理思考的价值是主观任意的，而物质力量的计量是普特——英尺，甚

---

① 天人，希腊神话中的神仙。——译者注

至还可能对它进行预算。因而可见，根据一般的假定，没有拳脚相加，斗争结局就悬而未决。莱蒙托夫的恶魔前往塔玛拉[1]独居的闺房，与天使在路上不期而遇。恶魔认为，塔玛拉属于他，天使则要求把她给自己。不能用语言和理由说服恶魔：他并非可以轻易应付。对天使也没什么可说，他总是认为自己百分之二百的正确。争端怎样解决？归根结底，莱蒙托夫不善于或者不敢发明新的解决方式并且让物质力量进行干预：从恶魔手中夺走的塔玛拉，完全像尘世间的弱肉强食一样。大概，诗人采取这种结局，为的是尊重传统的笃信宗教之惯例。按我的看法，这种解决不仅不是笃信宗教，而且相反是一种直接的亵渎行为。因为在解决中明显可见的不是消除了偶像崇拜和野蛮痕迹。尘世暴君梦寐以求的特性和趣味都归咎于上帝。他一定是应当和仿佛想要成为老子天下第一、唯我独尊，诸如此类——这完全像青年时期的裘利斯·恺撒一样。他极为害怕竞争，从不宽恕不屈服的对手。看来，这大错特错了。上帝完全不应该是老子天下第一、唯我独尊。大概，上帝不愿意弱于他人，以便不遭受暴力，他对此是一清二楚的，并且赞同健全理性。不过，毫无理由把虚荣心或个人英雄主义归于他。这意味着，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他不能忍受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他者存在。想要成为一切人的主宰，并且无论如何都要消灭恶魔。最有可能的是，他会同那些至少虚与委蛇地应付他的趣味和习惯的人和睦相处。也许，甚至还高兴大家都能像他那样，自愿同撒旦分享权力。更何况任何人从这种分享中也不会失去什么，因为无限（上帝的统

---

① 塔玛拉为莱蒙托夫著名长诗《恶魔》中的一位年轻貌美的公主。——译者注

治也不可穷尽，我承认这一点）被划分为二甚至划分为任何巨大的有限之数，其结果仍然是无限。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最初的问题上。似乎，可以给它答案，甚至是两个答案，一个是明智的（sapitntium），另一个是世俗的（profanorum）。对于前者来说，哲学是为艺术的艺术。每个哲学家都竭尽全力去建立严谨、样式纷繁、饶有趣味和漂亮的结构体系，正如为建筑而使用材料那样，使用独特的内在体验以及个人和别人对外部生活的观察。哲学家本身就是艺术家。对艺术家来说，他的作品比世界上的一切都要宝贵，有时甚至贵于生命。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哲学家为了自己的事业会毫不犹豫地自愿做出牺牲，甚至牺牲真理。无知之徒却是另一回事。对于他们来说，哲学——更确切地说，他们把哲学称之为玄论，假如他们通晓科学术语，哲学就是最终的庇护所。当物质力量告罄，没什么可再用来做斗争时，他们就到过去最畏惧的地方去寻求帮助来支持。例如，圣赫勒拿岛[①]上的拿破仑，他整个一生都在招募自己的士兵和大炮，但当他身陷缧绁时，也开始研究哲学。当然，他在这方面刚刚起步，涉猎不深，甚至开句玩笑，宛如胆怯的生手。

他不害怕任何鼠疫病人，也不害怕任何敌人的子弹，但众人皆知，他却害怕漆黑一团的房间。习惯于哲学的人们，即便是叔本华都能勇敢而坚定地在漆黑一团的房间里踱步，尽管他仍躲避射击甚至危险更少的东西，我要说，这就是伟大的统帅，是多年全欧洲的皇帝拿破仑。他现在在圣赫勒拿岛研究哲学，甚至开始巴结道

① 圣赫勒拿岛，大西洋南部的大山岛，拿破仑一世在流放中死于该岛。——译者注

义。显然，他认为他的未来命运要依赖于道义。他劝说道义相信，为了它并且只有为了它他才策划了自己的全部恶毒事业。而当他还在称帝时，当他还手握所向无敌之军时，未必知道道义的存在。但这是不言而喻的事。45岁才涉猎完全是新的、陌生的领域，当然会觉得一切都是可怕的，甚至会把无形体的道义当作命运的主宰。你会想到，可以像对待贵妇人那样用甜言蜜语和虚伪的许诺来迷惑它，但这是生手入门的第一步。拿破仑如此艰难地去掌握哲学，就像查理曼大帝垂暮之年学会写作一样。不过拿破仑知道，为什么要来到新地方，无论是柏拉图，还是斯宾诺莎，或是康德都不能说服他。起初在不习惯黑暗时，他为了掩饰真相同意公认的权威，以为在这里就像他从前生活过的别处一样，上层人物不容许人反驳。也不允许他会对他们撒谎，就像对道义撒谎一样——然而他没有忘却自己的事业。他对哲学有要求，不达目的绝不甘心。他看到了一个科西嘉的中尉成了法兰西皇帝。为什么战败的皇帝不能参加最终的斗争？……屈服于弃绝自我吗？哲学会让步的，只要不是内心投降。拿破仑之流就是这样求助于哲学，并且他们也是这样理解它的。就是对立的证据也不能妨碍我们认为拿破仑们是正确的，因而经院哲学不是最新的，甚至不是较新的成果。因为不善谈论自己、但勇敢顽强、不屈不挠的人也可能会有最新成果。

8

亨利·海涅。这个著名人物诞辰已过了100多年，逝世也已50年。可文学史迄今为止还没有对他盖棺论定。就连德国

人——他的同胞们（大概，尤其是德国人），无论如何不能一致地评价他的才华。一些人认为他是天才，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并无才华，而是一个鄙陋角色。此外，他的敌人至今还像在当年一样，不遗余力地攻击他，就像他们不是与过世之人，而是在与活生生的敌手厮杀一样。仇恨他是由于他的同时代人仇视他。众所周知，海涅最不宽恕虚伪。谁都不知道他的喜怒哀乐，也没有任何弄清的可能，海涅是否信仰上帝。应当承认，德国人对他横加指责大都是正确的。我非常赏识海涅，按我的看法，他是最伟大的德国诗人之一，然而，我也不敢满怀信心地说，他喜欢什么，信仰什么，也不能判断他在表示某种看法时有几分认真。但是，我无论如何不能在他的文集里发现不诚实。相反，德国人对之极为恼火并视之为毫无疑问的虚伪的特征，在我的眼里则是他惊人、唯一的诚实性的证据。我认为，假如德国人犯了错误并曲解了海涅，那么，其原因就是自卑心过甚和偏见的支配。海涅的通常风格就是，说话开始于严肃认真，结束于辛辣的嘲笑和讥讽。评论家和读者在开始时不能领会到，结尾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以为出乎意料的嘲笑是针对自己的，这就极大地侮辱了他们。被螫痛的自尊心从不会宽恕，德国人也不能宽恕海涅嘲弄他们。其实，海涅极少侮辱他人，他的大部分嘲弄主要是针对他自己，尤其是在他创作的晚期作品里，即当他生活在 Matrazengruft（西班牙文：褥垫坟墓）时期①。要知道我们仍然有许多人抱怨果戈理，认为他嘲弄了他们。后来他承认，这是他

① 1848 年后，海涅已卧床不起，一动也不能动，濒临死亡，禁锢在“褥垫坟墓”里。有人称海涅此时为“褥垫坟墓时期”。——译者注

描写自我。海涅变幻莫测的见解完全不证明他的不诚实。他远非总是具有戏弄庸夫俗子的意图。实际上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相信什么。他事实上改变了自己的趣味和眷恋，甚至也不总是确切知道，他目前关注的是什么。当然，假如他乐意的话，他可以伪装成始终不渝和固定不变的。或者，假如他不太敏锐，他可能就像发生在绝大多数人身上一样，一劳永逸地掌握装门面和有名无实的思想，并始终不变地鼓吹它们，丝毫也不把它们与自己的现实体验和情绪相对比。许多人都认为，正是应当这样做，应当只表达（特别是在文学里）装模作样，漂亮外表、高尚，还有自古以来的高尚贤明的思想，完全不去探询，它是否符合它们自己的本性。冷酷无情、仇念深重、报复心强、自私自利、谨小慎微的人们常常善意地（bona fide）在自己的著作里颂赞善良仁爱，宽容一切，对敌之爱，慷慨好施，宽宏大量，而绝口不提自己的趣味和情欲。他们确信，情欲存在只是为了被抑制、被掩饰、被表现，而炫耀的应当只是信仰。抑制情欲是难上加难，可掩饰它却易如反掌，尤其是在书本里。这种掩饰不仅不会暴露，而且如尽人皆知那样，应受到颂扬。还会呈现出如此平常而又熟悉的情景：生活中情欲审讯“信念”，而书本里“信念”却审讯情欲，或像通常所说的那样，理想审判情欲。我要着重强调指出，大部分作家坚信他们的使命不是述说自己而是颂赞理想。确实，海涅的真诚与众不同。他述说自己的一切或者几乎一切。这一点被认为是极为可恶的，连习俗、道德的卫道士们都认为自己最高尚的感情受到了侮辱。他们觉得，假如海涅能在文学里有其巨大影响并统治着同代人的思想，那将是最大的不幸。数百年间如此艰难地由民族的优秀代表创立的基础崩溃了。这大概

是正确的:保存生命的崇高、宏伟必定以口是心非为条件。为了美,应当把许多东西隐蔽藏匿得远不可及和深不可达。病人和疯子应当驱逐入医院,贫困穷苦应当安放在地下室里,不俯首听命的情感应藏人心底。真理和自由允许表现,只是因为这与布置稳妥的生活利益内外相符。基督教理解这一点不是比天主教更坏,而是更好。严格的禁欲主义把精神纪律奉为最高的道德准则,这一准则是与铁面无情的专政一起统治生活。婚姻、家庭,而不是爱情,才应当是人类的目的,可不幸的甘泪卿献身于浮士德就没有遵守规定的仪式,被迫把自己永远当作有罪之人。内在律令远甚于以爪牙和刽子手为代表的外在纪律,它保护着基础,并使国家和人民强大起来。绝不宽恕人,也不重视人。成百上千的男女甘泪卿一生献身并直到现在还毫无希望地一生献身于"最高级的精神利益"。对所描写的事物秩序的承认和尊重,在德国人的灵魂(我说德国人,是因为在地球上未必还有一个如此严守纪律的民族)中如此根深蒂固,以致最桀骜不驯的性格也会屈服于它。最可怕的罪,不是违背法律(所有的违背正像甘泪卿一样,都被解释为软弱无力并且只是软弱无力,虽然未得到饶恕,但指责还不够严峻),而是反对法律的造反,公开而大胆的无意服从,它们即使在表现于无足轻重的行为中也同样如此。因此,一切人通常首先力求从这方面证明,正是自己的忠诚。在某种程度上大家都对法律退避三舍,但是在行为举止中违背法律愈多,那么在语言上赞美它就认为愈是必须的。这种现实不会引起任何人的嫌疑和不满。它像是自然而又有高尚的道义。人们在它之中谛视到对精神高于肉体、理性高于情欲的承认。精神果真应当战胜肉体,理性果真应当战胜情欲吗?

从来没有任何人提出过这个问题。当海涅提出了这一问题，并按自己的方式去进行解决时，满腔愤怒的德国人都全力以赴地攻击他。首先怀疑他的诚实和真挚。笃信宗教的人们说："他不可能真的不承认法律，他只是装出来的而已。"由于海涅的言语远非总是表达坚定的信仰，便使这种推测更为自然。他一首诗这样结尾："我还想拥有你的玉体，它是那样年轻，那样娇柔，你的灵魂尽可埋葬，有了我的灵魂就已足够。"诗极其勇猛激昂，但在它之中正如在海涅的一切勇猛激昂的诗中一样，可以听到爽朗的笑声，哈哈大笑声，应当把这些笑理解成双重性的表达，理解成对自己的嘲笑。他还叙述了自己与两个女人——母亲和女儿的相遇。两人各有千秋，母亲老练世故，而女儿却天真纯朴。诗人就处在她们之间，用他自己的话说，宛如布里丹笔下的两捆干草之间的驴子①。这又是勇敢无畏，又是哈哈大笑——稳健的德国人也又一次被激怒。他宁愿，任何人永远不会描述这样的心境。但是假如要描述，那么至少也要有一种自怨自艾的忏悔口吻。尽管海涅不合时宜的笑有失体统，也毫无必要慌乱不堪。重复一遍，海涅本人远非总是坚信：他的"诚实"是合情合理的。他还在青年时期就说到，沿着他的灵魂，宛如沿着全世界的一条裂痕，把过去统一的心境一分为二。当犹太大卫王②赞美上帝和善时，他没有回想起自己的肮脏勾当（他有不少这种勾当），即使回想起来了，那也只是为了忏悔。他具

① 喻指极端优柔寡断的人，源自 14 世纪法国哲学家布里丹的譬喻：一头驴子在两堆草料之间，因不能决定吃哪一堆好，以致饿死。——译者注

② 大卫，《圣经·旧约》中的以色列国王。——译者注

有双重人格，不过善于注意保持一致性而已。当他哭泣流泪之时，他不可能也不愿意兴高采烈；当他忏悔悟过之时，他也不会从事罪恶；当他祈祷恳求之时，他不会亵渎侮辱；当他相信之时，他就毫不怀疑。从伟大皇帝的赞美诗里所培育出来的德国人，已习惯于认为，只能也应当这样。他们还允许各种不同的甚至对立的精神状态先后相继。但不同的精神状态同时并存，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令人嫌弃的，并与上帝的圣训和逻辑规律矛盾的人。好像从前单独存在的一切都混合掺杂起来了，好像荒谬绝伦的杂乱无章取代了严格的和谐，好像这种境况以无以计数的灾难相威胁。他们不容设想，海涅不能理解这一点，把他的创作看成虚伪和恶意的表现，并吁求人类和上帝的审判。当弄清海涅甚至在死亡面前也没妥协时，庸夫俗子的恼怒已至极点。患瘫痪病的海涅在其“褥垫坟墓”里，四肢无力挪动，体验了最大的肉体痛苦，不仅毫无希望痊愈，而且就连稍微轻松一点都不可能，却仍然在继续亵渎一切。更有甚者，他的冷嘲热讽日益残酷无情、辛辣犀利、精巧细微。似乎，被消灭和蹂躏的人只能自认战败，并且把自己完全出卖给胜利者的宽宏大量。不过，软弱无力的肉体里却坚守着一个强健有力的精神。他的全部意志都向往上帝，就像一切濒临死亡的人一样，他也不能不感觉到上帝的权力和沉重的右手放在自己身上。然而，他关于上帝的思想，他对上帝的态度是这样与众不同，以致使认真的局外人只是耸耸肩而已。没有人同上帝这样说话，无论是在口头上还是在心里。通常关于上帝使凡人暗示着死亡，或者震颤，或者感悟，因此他们或者叩拜于上帝面前并祈求他宽恕，或者唱赞美歌。海涅既不祈祷，又不高歌赞美上帝。他的诗充满了特别的、为

他独有的，令人神往和优美的厚颜无耻。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孽，就连现在当他即将进入另一种生活时，他仍像年轻时那样。无论是极乐世界，还是天堂的幸福，他都不愿要——他请求上帝让他恢复健康并振兴其富有的事业。他在晚期的一首诗里写道："我知道，尘世里有许多罪孽和恶习。不过，我已惯于这一切，是的，况且我很少离开自己的房间。上帝啊，把我留在这里吧，不过只要治愈疾病和摆脱贫困。"他嘲弄了有关无罪灵魂在极乐世界里的幸福生活的奇闻轶事。他解释道："在云彩里唱赞美诗，这对于我是完全不合适的消遣。"他回想起卢浮宫的美丽仙女（米洛的维纳斯）并且仍像青春时期那样赞美她。他的诗《歌之歌》（*Das Hohelied*）是最大的厚颜无耻、高尚、绝望和绝无仅有的冷嘲热讽的综合物。我不知道，濒临死亡的人是否会有这一诗里所说的思想，但我深信，类似的东西在文学中从未有人说过。在歌德的《普罗米修斯》一诗里，远没有鼓舞《歌之歌》的作者表现出坚定、心平气和的自尊心和对自己的权意识。上帝创造了天堂、尘世和尘世之人，他乐意随便怎样蹂躏我的肉体和我的灵魂。不过，我自己知道，我应该去想要什么，我本人去决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就是这首诗的思想，也就是海涅在他生命的暮年写作的全部思想。他像大家一样知道，遵循哲学、伦理学和宗教学说，灵魂的拯救的条件是悔悟和顺从，即便是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要决心弃绝"罪恶的愿望"。但是，他在最后一刻不想承认几千年世界权威的权力对自己的统治。他嘲弄了道德、哲学以及现存的宗教。贤哲就是这样想的，他们想要按自己的方式生活——让他们沉思，让他们生活。但是谁赋予他们要求我俯首听命之权利呢？他们可能有必要的力量把我引向俯

首听命吗？谛听临终之言，我们不是步海涅之后尘而重复了他的问题吗？我们不能再前进一步吗？如果相信（全部理由相信）他在其《歌之歌》所谈的那么痛苦的沉疴，就是他生活方式的直接后果和结局，这是否意味着，往后（如果将有某种"往后"的话）直到他自愿不虚与委蛇地应付所宣告和遗赠的道德时，新的追求会等待他吗？总之，我们有权推测在宇宙某地忧虑的人们想方设法把所有的人都改为一种姿势吗？或许，海涅坚定不移地证明了命运主宰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意图。在这里为抗拒羁绊和呆板僵死（经验的观察足以毫无疑问地确立一种事实，即任何摆脱规范与康庄大道的人，都不可避免引起痛苦和死亡）所准备好的疾病和苦难，可能仅仅是对人类的精神考验。谁经受住它们，谁能捍卫自己，不畏惧上帝、恶魔及其奴仆，他就会以胜利者的身份进入另一世界。有时我甚至觉得，与现存意见相反，"在那里"，人们特别喜欢和重视坚韧不拔和顽强不屈——这一秘密对凡人仍未揭开，为的是让软弱无力和谦让随和不要装扮成坚韧不拔，以便赢得神灵的好感。与此相反，谁没有经受住考验，谁没有弃绝自己，形而上学哲学家通常幻想的命运就会等待着他：他会融合于原初的统一之中，与众多相似个体的群我一起消解在存在的本质里。我以为，形而上学理论似乎是一种以爱的名义来鼓吹弃绝自我，又以弃绝自我的名义来鼓吹爱的理论，这绝不是无聊的废话，就像实证论者的断言一样。在它之中有深刻、玄妙和神秘的意义，在它之中隐藏着伟大的真理。它的错误只是在于它自命为绝对性。人们不知为什么认为，经验主义的真理有许多，而形而上学的真理只有一个。形而上学的真理也有许多，它们彼此互不相似，但这丝毫也不妨碍它们彼

此之间友好地和睦相处。经验主义的真理，宛如尘世的一切东西，永远在争吵不休，并且没有最高长官就不行。但是形而上学的真理是按另一种方式建立起来并完全没有我们这种竞争。毫无疑问，人们为自己的个性所苦恼并渴求弃绝自我是绝对正确的。他们极可能归根到底会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与他们应当融合的东西融为一体，与他们的近人或远人，或者也许像泛神论所愿望的那样，甚至与无生命的自然界融为一体。不过，大概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珍视自己的个性，并且无论是为了自己的近人还是为了高尚的思想，都不赞同弃绝自我的人，把持着自我并且始终依然故我，如果不是永远，那也或多或少是一个很长的时期，直到他们还没有腻烦至极为止。因而德国人，至少是那些不是从功利观（从这一观点出发就连我也完全会斥责海涅，也不会为他找任何辩解理由），而是像当今通行的那样，从高尚、宗教或者形而上学的观点来评价海涅的那些德国人，不应该对他怒气冲冲。海涅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妨碍他们。大概他们最终会全部融为一个思想——自在之物（Ding an sich），本体或另一种诱人的统一体，海涅不能以其冷嘲热讽阻碍了他们的高尚意图。假如他本人和在其他地方顽强存在的人继续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并且甚至嘲笑思想——这难道能是极大忧虑的对象吗？

9

什么是真理？怀疑派断言，没有并且也不可能存在真理。这一断言一直渗透到现代思想界，使我们时代唯一普及的哲学，只有以怀疑主义为出发点的康德哲学。但是你们只要认真读了《纯粹

理性批判》第一版序，就会确信，康德对什么是真理这一问题完全不感兴趣。他应该解决的问题只是，当人确信不可能探寻到客观真理时，人将怎么办？旧形而上学随意而毫无证据做出断言，实际上经受不住任何批判。它激怒了康德，他决定哪怕用对怀疑主义的相对正确的承认来摆脱他按照哲学导师的原理不得不提出的不科学的学科。但是怀疑派的确信和康德的谦让态度根本使我们一事无成。况且，康德本人归根结底没有履行通常的义务。因为，既然不知道什么是真理，灵魂的不朽和上帝的公设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又怎么能证明和解释现存的任何一种宗教、甚至基督教？虽然《福音书》完全不容忍我们关于自然规律的科学概念，但它不包含反对理性的任何东西。不相信奇迹，不是因为奇迹是不可思议的。恰恰相反，甚至具有最朴素的健全理性的人也十分清楚，世界的基础，生活是奇迹中之奇迹，假如哲学的使命只是为了证明奇迹的可能性，那么它的事业早已光辉灿烂了。一切不幸就在于人们可以亲眼目睹的奇迹少得可怜。曾有过许多奇迹，但由此无论怎样也不能推论还会有别的奇迹，没有它们就不能生活。毫无疑问，人类的诞生是一桩伟大的奇迹，美好世界的存在也是奇迹中之奇迹。但是难道由此能推出人类死后会复活，他们将有极乐世界？在我们的时代甚至崇拜《福音书》的人也不太相信拉撒路的复活。我重复一遍，不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奇迹的可能性，而是因为无论如何也不能先验(a priori)地决定什么样的奇迹可能，什么样的奇迹不可能，因而被迫勉强后验(a posteriori)地判断：乐意承认过去的奇迹，怀疑没有过的奇迹，奇迹愈多，对它的希望就愈深沉，也愈充满热情。根本不值得相信善在尘世间的最终胜利(即便这是

不容怀疑的奇迹），进步和教皇的绝对正确（这也是非同一般的奇迹！），因为不论怎样（aprés tout），人们对善、进步和罗马教皇的美德仍然漠不关心。更为困难的是，在亲近和敬爱之人的死尸面前，简直不能相信，天使会从天堂飞下来使死者复活，尽管尘世充满了比死者复活更为奇妙的现象。因此，怀疑派断言没有真理是不对的。真理是有的，只是我们还不完全了解它而已，而我们已知的东西又无法加以证明，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一切为什么正是这样产生，而不是那样；发生了的事情真的应当是如此发生，正如曾经发生过的一样，还是可能发生的别的什么。曾几何时人们认为，现实服从于必然性规律，然而，休谟解释说，必然性概念是主观的，因此应该把它作为骗局加以消除。康德支持（只是没有结论）和概括了休谟的思想。我们的一切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判断，只是由于我们的精神组织才获得这样的性质，即在我们确信判断的客观意义的情况下，我们正与纯主观的，尽管对于可见世界是始终不渝和坚定不移的信念打交道。众所周知，康德没有接受休谟的结论，也就是说，他不仅没有试图根除来自我们日常理性的虚伪前提（正如休谟对待必然性概念那样），而且相反，他宣称这种事情完全不可能实现。实践理性暗示康德，尽管我们判断的基础生性是假的，并始终不变，但是它们的始终不变性能够在现象世界里亦即在人的生与死之间的空间里予以巨大帮助。如果人在诞生之前就已生存了（正如柏拉图所认为的）并且在死后仍将生存，那么他在那里，另一个世界里不需要，也不将需要他的“真理”，但是在这里，他的真理却是有用的。可是在那里有什么样的真理，并且那里是否有真理，康德对此只是做了猜测，因为他决心在结论里弃绝合乎逻辑性。

他突然给信仰以极大的评判可理解世界的权利。这是信仰从来也不敢奢求的，假如它没有得到这位哲学家特别关照的话。为什么可以信仰的东西，却是理性认为不可以的东西呢？还有一个更滑头的问题：在第一《批判》里失去了权力并在形式改变之下后来又得到恢复原状(restitutio in integrum)的同一理性，就没有发明全部公设吗？这后一假定是最有可能的。既然如此，那么，在如此细心地被康德从现象世界分离出来的可理解的世界里，我们不仅会发现许多新东西，而且也有不少陈旧的东西。

看来，假定我们的世界只是瞬息、刹那梦景的世界，只是黄粱一梦，绝不与现实生活相似。这一假定，尽管第一次由柏拉图说出，然后又由哲学和宗教思想的难以计数的代表所发展和支持，却根本没有任何根据。柏拉图希望把生活从某些令人烦恼的不完善中解救出来，这真是再好不过了。但是事实却常是，希望刚刚体现于语词里，它就过分鲜明和最直率地表现出来，因而也就不再与自我相似。柏拉图觉得，原初、彼岸和真正生活的本质是从一切混合物里分离出来的绝对的善，是美德之精华。要知道归根到底，柏拉图本人无力去经受有思想的存在的纯粹真空，并且经常为它添加绝不是理想的要素，这使他的对话增添了趣味和紧张。如果你们从来都没有读柏拉图本人著作的机会，那就根据其任何一个崇拜者和赏识者的学说来了解他的哲学，你们将会对他的内容空洞感到震惊。你们要是读了那托尔普[①]的著名厚书就会确信，柏拉图

① 那托尔普(Paul Natorp，1854—1924)，德国哲学家，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领袖之一。——译者注

“净化”学说的价值。顺便说说，我建议考察著名哲学家思想的方法是：熟谙它们不仅要根据原著作，而且还要在其弟子的说明里，尤其是那些深信不疑和诚心诚意的弟子们。一旦个性和才华的诱惑隐匿消失了，就留下了赤裸裸的、无所掩饰的“真理”（弟子们总是相信，导师知道“真理”，并会毫无掩饰地保留它，甚至毫无遮丑布）。这时就一清二楚了，甚至最著名哲学家的“思想”都很少有意义。一旦深信不疑的弟子们开始从导师的原则里做出结论，这一点就显而易见：他的结论越是合乎逻辑，诚心诚意，他就越是不可避免地败坏自己导师的名声。上面提到的那托尔普的著作就是如此，他是研究柏拉图的著名专家，是后者思想的归谬证法（reductio ad absurdum）。柏拉图原来是合乎逻辑的新康德主义者，是在费赖堡或海德堡受过很好训练的眼光狭小的学者。同时也要看到，柏拉图的思想在其纯形式里绝不表现出他对世界和生活的现实关系。应当把整个柏拉图与其矛盾和不合逻辑性与其缺陷和美德及其不足的一切加以研究，至少也要像珍视尊严一样。要不，给他增加一两个缺陷会忽略了他的某个美德。因为显然，他作为与一切并非特别的人，也许尽力给自己增加他还没有的美德以隐蔽某一不足。也应当这样对待贤明的其他导师及其学说。那时“另一世界”就将不与我们的尘世生活如此绝望地分离开来。也许违背康德的学说会找到某些经验主义为两个世界共有的真理。因而那时，彼拉多的问题就失去了自己无往不胜的信心。他就应当摆脱责任，他询问，什么是真理。在他之后和他之前的许多不想斗争的人找出了许多聪明问题，并依赖于怀疑主义。其实，大家都知道有真理甚至可以再一次确定和形成有关真理的概念，且可以有笛卡

儿要求的明确性和明晰性。奇迹的极限限于我们已经在尘世中看到的那些奇迹,或者它更宽广得多?如果更宽广,那么宽多少呢?

10

再论真理。也许,真理按其本性就是这样,由于它与人们之间的交往不可能存在于人们之间,至少,习惯借助于语言的交流。每一个人都可以暗自了解真理,但是为了参与邻人们的交往,他就应当放弃真理和接受某种约定的谎言。但是,真理的重要性和意义完全不会由于它不能是市场估价的对象而减少。甚至相反,会因此而身价倍增。当人们问什么是真理,你们会不善于给予这个问题以答案,即使你们终其一生都埋头于哲学理论的研究。对于自我,当你们不需任何回答时,你们会清楚地懂得什么是真理。因此,真理按其本性与经验主义真理一丁点儿也不相似,在涉足于哲学领域之前,应当放弃以科学方法来寻求和以习惯方式来评价知识。一句话,应当准备接受某种绝对新颖、与传统的旧东西完全不相似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糟踏科学知识名誉的意图完全不是毫无益处的,就像无经验的人的肤浅见识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讥笑和冷嘲会成为研究家的必要武器。根深蒂固的习惯曾经并永远将是新知识的最危险的敌人。从实际观点看,人更重要的是要懂得,帮助他适应于其存在的暂时条件的东西,而不是具有超时间意义的东西。自我保存的本能永远比认识的最真诚的渴求更强大。并且还应当记住,本能拥有无以计数和最敏锐机灵的自卫武器,人类的一切才能都听从本能的指挥,从无意识的反射直到至高无上的理性和良心——对此人们已不止一次

而是三番五次地谈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明智地同意(consensus sapientium)。确实，人们谈到这一点就像谈人类本性不好的曲解一样——我应当在这儿提出抗议。我认为，在这里没有任何不好。我们的理性和良心应当为了自己敬重可能处于本能条件下的名誉——即便是自我保存本能。它们不应该目中无人，事实上，它们也没有骄傲自大，并且还要甘愿履行自己的公务委任。它们只是在书本里觊觎着首位的宝座，并一想到生活里的优越地位就颤抖不已。假如偶然给它以行动的自由，它们就会惊慌失措，就像深夜在森林里迷路的孩子们一样。每当良心和理性开始独立自主地判断，它们就会毁于一旦。到那时它们就会惊讶地深信，它们即使这一次行动也并非自由，而仍按照那个本能指令，并且是另一性质的本能。人类的灵魂需要破坏性工作，它把奴隶从镣铐上解脱出来，奴隶在粗野的狂喜中开始以伟大的破坏事业庆贺自己的自由，丝毫也不怀疑他们仍然是，正像过去曾经是为他人工作的奴隶一样。

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已指出，人类灵魂的破坏本能毕竟是生来固有，就像是创造本能一样。面对这两种本能，我们的全部能力只是在某种偶然条件下需要的次等灵魂本性。现在不仅粗笨的实证论者们，而且就连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老手们都承认，真理除了关于标准的思想，一无所长。用更生动、易解的话说，真理只是为了被时间和空间所分离的人们能够彼此之间建立某种交往而存在着。一方面，人不得不在绝对孤寂和真理之间进行选择，另一方面，人又在同亲人的交往和谎言中进行选择。人们将会问：哪个更好？我回答说，这是一个形同虚设的问题。可能还有第三种结局，

两者都接受，尽管初看这可能是完全不合情理的，特别是对于抱定信念认为逻辑像数学一样，其指令是精确无误的。其实，事实上是可能的，但只是可能则远远不够——我们不会满足于可能性（这只有德国唯心主义者能满足于善，而他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也没有实现过），可常常同时共存最矛盾的心理状态。所有的人刚学会说话就在撒谎。我们的话语是这样不完全的组织，以致在自己的结构原则本身里就必须以准备说出谎言为前提。对象愈是抽象，我们的谎言程度就愈高。因此，当我们涉足于最复杂的问题，我们几乎毫不间断地撒谎。谎言越是粗笨和令人厌恶，人就越是诚实真挚。因为诚挚之人深信不疑的是，不矛盾才保障诚实性，为了不成为撒谎者，力求合乎逻辑地协调自己的判断，也就是使自己的虚伪性直到赫拉克利斯的两大石柱[①]为止。同样，在领会了别人的判断时，他会运用同一准则来衡量它们，只要稍微发现破绽，就会开始淳朴忠厚地叫嚷别人破坏了规规矩矩的基本原则。尤其有意思的是，要知道研究哲学的一切人（而我在这里主要讲他们，读者大概早已发现），所有学识渊博的学者都清楚地懂得，迄今为止任何最伟大的哲学家也无法最终驱逐自己体系中的矛盾。斯宾诺莎是用什么来武装自己的，要知道人绝不会宽恕任何东西，也绝不会屈服于任何东西，其实，他的著名体系经不起逻辑批判，这已是尽人皆知了。或许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合乎逻辑性对我们有什么

① 古代传说在地中海两头的直布罗陀海峡两岸的两座山是赫拉克利斯建立的两大石柱，表示那地方是陆地的尽头。现用来指世界的尽头、极限。赫拉克利斯为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译者注

用，矛盾莫不是世界观真理性的条件？康德死后，他的弟子及其继承者能心平气和地回答，合乎逻辑性是绝不会有任何真正的用处的，真理是生活在矛盾之中。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只有黑格尔和叔本华各不相同，试着做出这种假设，不过由此他们得到的利益极小……

试从上述之中做出结论。要知道，只要逻辑是有益的，拒绝它的效劳就是毫无理由的浪费。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结论不无意义、十分有趣。首先，当你自己在说话时，不要拘泥于你过去所说的东西，这是毫无必要地限制自己的自由，它本来就固定在词和语法句式中。当倾听对话或阅读书籍时，不要咬文嚼字、钻牛角尖。要忘掉个别思想，不要重视合乎逻辑地阐述思想。请牢牢记住，你的交谈者想要的东西，可他不能表现自己，只能采用现成的话语形式，别无他法。注意他脸上的表情，倾听他声音的语调——这都能帮助你穿过语言透视他的灵魂。不仅口头交谈，而且就连书里也能听到作者的声音甚至音色，都能发现他脸上和眼睛表现出来的最细小的差别。不要专门找茬，不要进行争辩，也不要要求证据，仅仅只是聚精会神地倾听。然而，一旦你开始说话，人们也不会同你争论，也不会要求你拿出所有的证据，而你很清楚，你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证据。但是，人们不会用指出你的矛盾的办法来搅扰你，你也知道，你过去有并且永远将有矛盾，并且你同它们难舍难分。可是，这是最主要的——最终，你会深信不疑，真理不依赖逻辑，逻辑真理是绝对没有的。因而你有权去寻求你需要的东西、方法，而不是去推理。因此，如果在探寻的结果里将会有什么，无论怎样也不是公式，不是定理，不是原则，不是思想！只是请想一想，

像现在人们所理解的那样，只要“真理”是寻求的宗旨，那就对一切都要有所准备。比如要准备唯物主义者是正确的，因为他们认为物质的能量是世界的基础，我们毫无必要立刻就去击破唯物主义者及其论据。思想史上有许多被遗忘和被辱骂的判断完全恢复名誉的情况。昨日的错误可能是明天公认的真理，甚至自明的真理。难道不依赖于自己的内容，唯物主义体系就反而有什么缺点？这是一种严格、合乎逻辑、信守不移的体系。我已经指出，唯物主义世界观能够不亚于所有其他——泛神论、唯心主义等世界观使人们兴奋若狂。假如真是这样，我再一次承认，在我看来没有十分坏的自在(an sich)思想：我直到如今仍能与工厂、铁路、气球等一起满意地注视进步思想的发展。但是我认为，希望这一玩物(我谈的是思想)能够成为人类认真寻求的对象是幼稚的。假如人与世界、人与神话和历史所叙述的神灵进行那种殊死斗争是可能的——就以普罗米修斯为例——那么当然，这既不是为了真理，也不是为了思想。人想要的是强健有力、幸福和自由，人希望成为世界的主宰——这就是悲惨可怜、毫不足道、由泥巴捏成的人。人在你们眼里，就像偶然一碰便会丧命的小虫，如果他谈到思想，那只是因为他对自己真正的使命的成功感到绝望而已。他感觉到自己是虫子，害怕重新必须化为灰烬，他从灰烬之中创造出来，撒谎、伪装、肢体残缺不全也不怕——只要懂得真理。我们原谅他的谎言，因为只有他才说出了真理。让他想说就说什么，想怎样说就怎样说吧！只要我们在他的话里听到了吁求斗争的熟悉声音，在他的双眼里炽燃着百折不回、殊死决心的火焰——我们就能理解他。我

们习惯于分析象形文字[1]。但是，即使他像现代德国人那样，把真理和常规作为人类渴求的最终目的——我们也会知道，我们在同谁打交道，哪怕命运赋予他以西塞罗的能言善辩也罢。就是完全孤独也比与这种人交往更好。其实，这种形式的交往不排除完全孤独，也许，这会使艰难困苦的使命变得轻松自如。

11

我与你。“看一看别人的灵魂”是极为普遍的表述。由于习以为常初眼乍看好像是极为明显的，可在近处精审细察原来却是模糊不清的，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它究竟具有什么意义呢？请试着想象观察别人的灵魂，你们会什么也看不见，除了空虚，就是巨大而幽暗的深渊，结果只是体验了晕眩。因而说实在话，“看一看别人的灵魂”的表述——只是一个不成功的隐喻而已。我们能够做到的一切，就是根据外部情况去推断内在体验。我们可以从眼泪推断出痛苦，由苍白推断出惊惧，由微笑推断出高兴等。但是，这难道就意味着看到了别人的灵魂吗？这只是意味着使自己的大脑代做一系列的纯粹逻辑推理过程。别人的灵魂始终仍然是不可见的，只能正确或错误地去领悟它而已。这种结论引起了我们的本能激怒：这世界有多卑鄙龌龊！这里没有可能看到的那些东西恰好正是最应当看见的。不过，对于思维和寻求的人来说，激怒几乎是心灵的正常状态。对于他来说，尤其重要的是在证明某

---

① 分析象形文字，此种观点认为人的感觉和概念是一些符号、记号和象形文字。——译者注

种什么事——在一系列的绝望企图之后，他每一次仍然深信不疑。他的求知欲不可能得到满足。这一次爱嘲笑的理性还迸发了一个新问题，你干嘛要找别人的心灵，你连你自己的心灵都从未看到？灵魂存在吗？要知道，许多人曾经信仰并且迄今为止还在信仰，灵魂是完全没有的，只是存在着关于灵魂的科学，称之为心理学。众所周知，心理学也没说灵魂是什么，它认为它的任务只是限于研究心灵状态，顺便说说，就是它也还完全没有研究这一状态……由此可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可以用嘲笑或者诅咒来回敬嘲笑，可以剥夺心理学称为科学的权利，或像通常那样称唯物主义者为白痴。毋庸置辩，愤怒也有自己的权利。但是，当你在芸芸众生之中让大家听从你，一切就都美好并具有了意义，就是对自己而愤懑，甚至不想为文学目的来利用愤懑（要知道，就连作家也不总是在著述，并且暂时的思想常常比手头的书更少忧虑）——谁也不乐意如此愤懑。你宁愿一千零一次以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走近迷津。别人的灵魂只是在旁人的接近下变为不可见的东西，如果出其不意地遇见它，它也来不及隐匿不见。因此，晦涩的心理学正如一切科学一样，总是在采取任何办法之前，就大声疾呼宣布自己的计划和实现它们的方式，完全不适用于为了捕捉这种灵活善变的实体——人类的灵魂。我们理应为心理学留下科学这一荣誉称号，甚至仍将尊重唯物主义者，可我们尝试用另一种方式来探察灵魂。过去大概有人谈到，在幽暗的深渊深处，可能看清什么，只有晕眩才会妨碍。因而与其说去发明新方法，不如说使自己习惯于毫无畏惧去看在不习惯的目光看来好像觉得是深不可测的深渊。是的，深不可测最终远非一定对人就没什么用处。从孩童开始，我们就已

铭记在心，人类理性只可能战胜局限性。不过，由此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我们有太多的偏见，因而应当竭力摆脱，假如必须放弃斥责唯物主义者和学习心理学的权利以及其他什么东西，将会怎样呢？要知道我们并非要习惯！不过，马上就会看到，最终还是难以猜测的“你”。大概还有“我”将确是有争议的。忍耐是最令人憎恶的东西，但想一想奇术家和其他同类贤明，只有靠忍耐。显然，已经得到了什么，不是人所共遵的真理——我几乎准备担保这一点，人所共遵的真理已经早就使大家腻烦已极。至少，我不能漠不关心地听到它。就连“真理”也没告诉我任何东西。应当寻找摆脱任何形式真理支配的方式。在这方面，人们追求奇术家。他们不能提出自己正确的论据，因为明显的胜利从来也不在他们方面。胜利是靠刺刀、大炮、显微镜、逻辑论据获得的。不过，显微镜和逻辑结束了局限性。还有：局限性常常得到加强，但是，它也常常扼杀了什么。